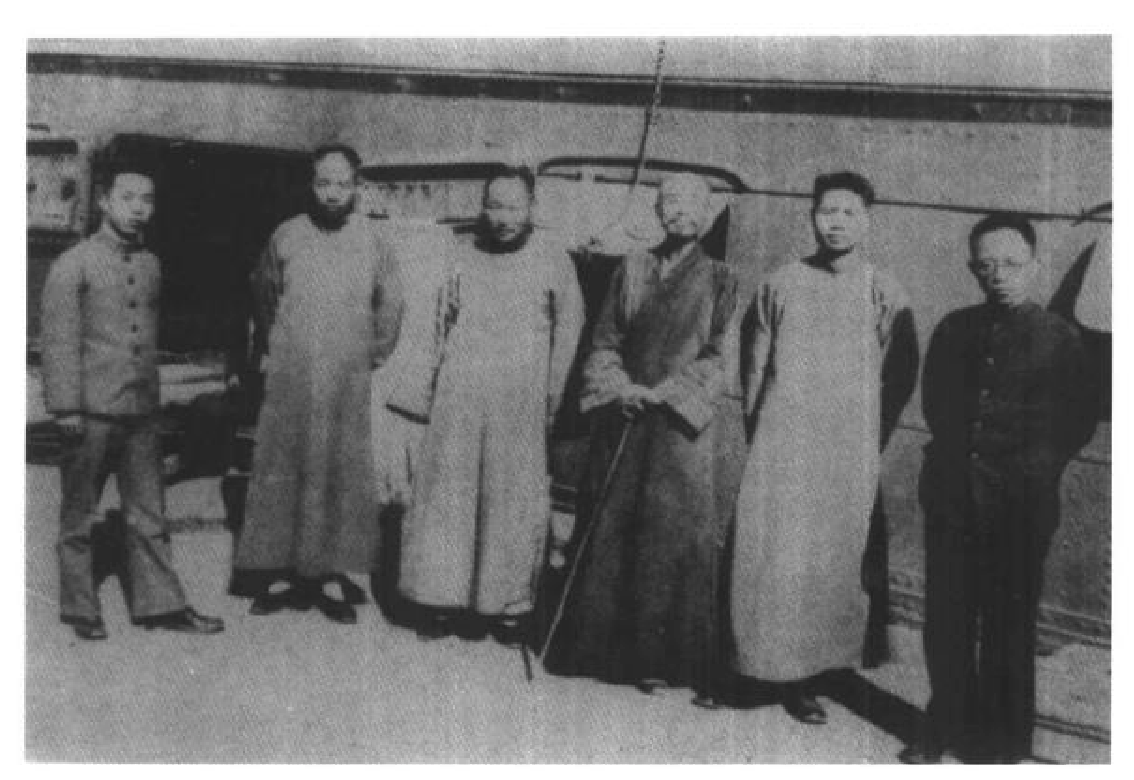
弘一大师与在家好友合影。后排右一为马一浮，前排右一为弘一大师。此为目前仅见的一张弘一大师与马一浮在一起的照片





弘一大师（右三）与夏丏尊（右四）在上海(1929年)

马一浮（左）与丰子恺在杭州蒋庄合影



李叔同（右）与夏丏尊在杭州的祭孔仪式上

马一浮（左）、广洽法师（中）和丰子恺在一起



一九六五年深秋廣洽上人自星洲返國偕余同赴杭州謁馬一浮先生於西湖濱合攝此影留念 豐子愷識



李叔同出家前与弟子刘质平（左）、丰子恺（右）合影留念



弘一法师涅槃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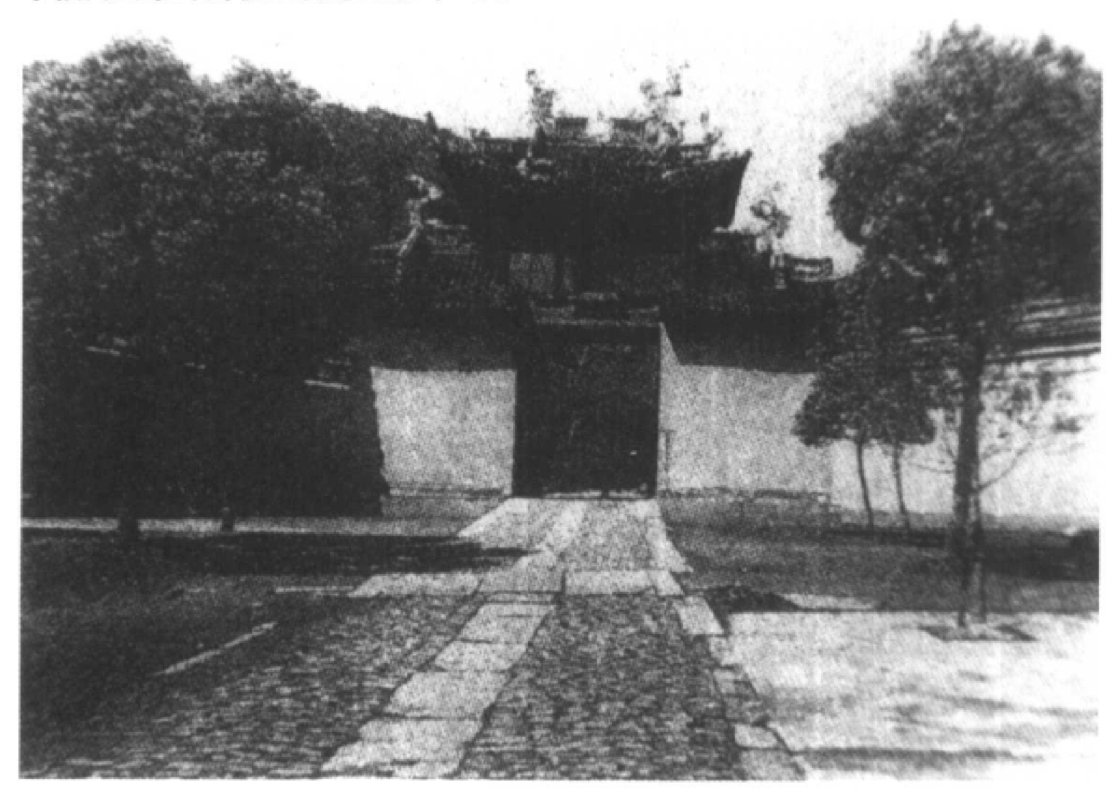


丰子恺绘《弘一大师遗像》

丰子恺绘《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李叔同出家时的杭州虎跑定慧寺山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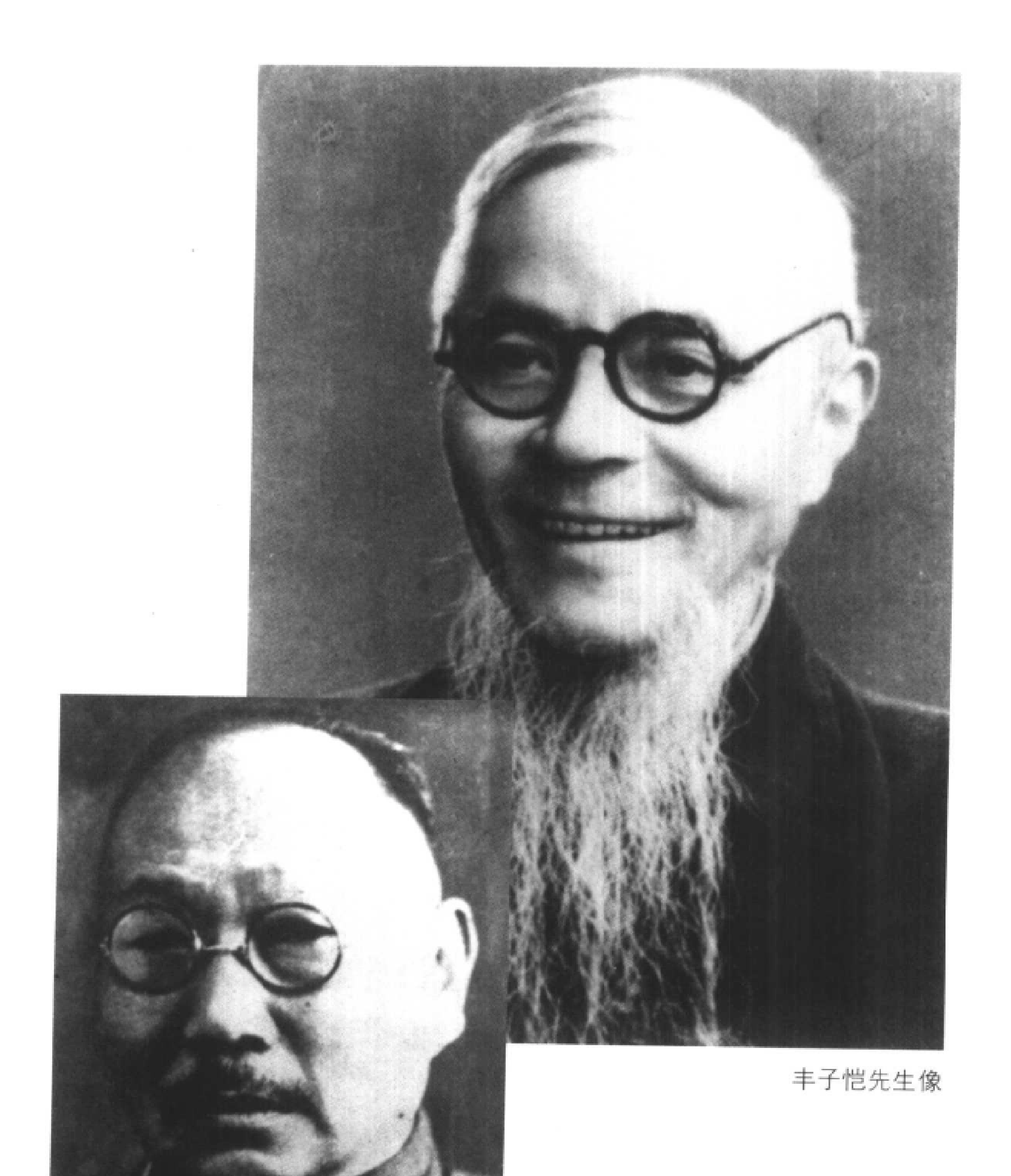


重建后的丰子恺故居缘缘堂

杭州虎跑弘一大师舍利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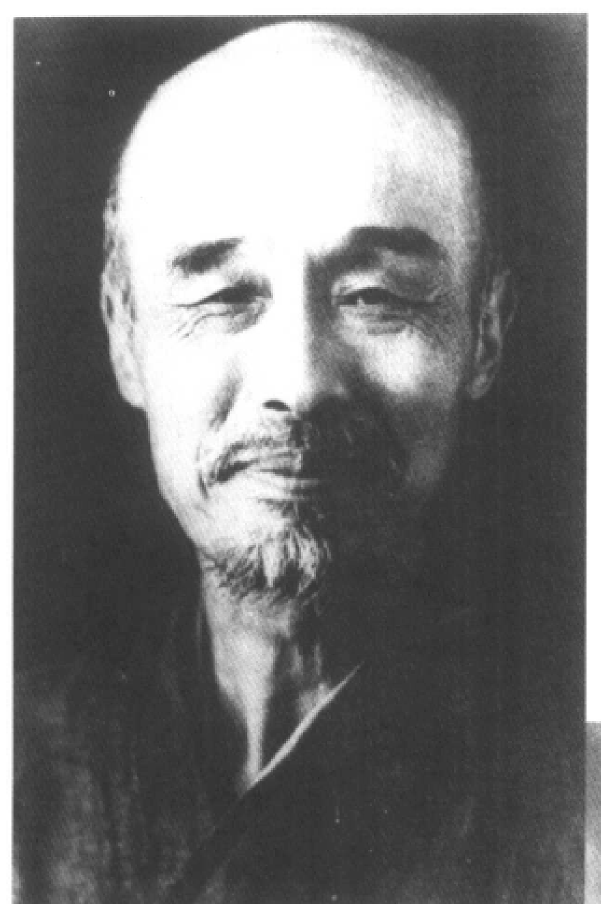


泉州清源山弘一大师舍利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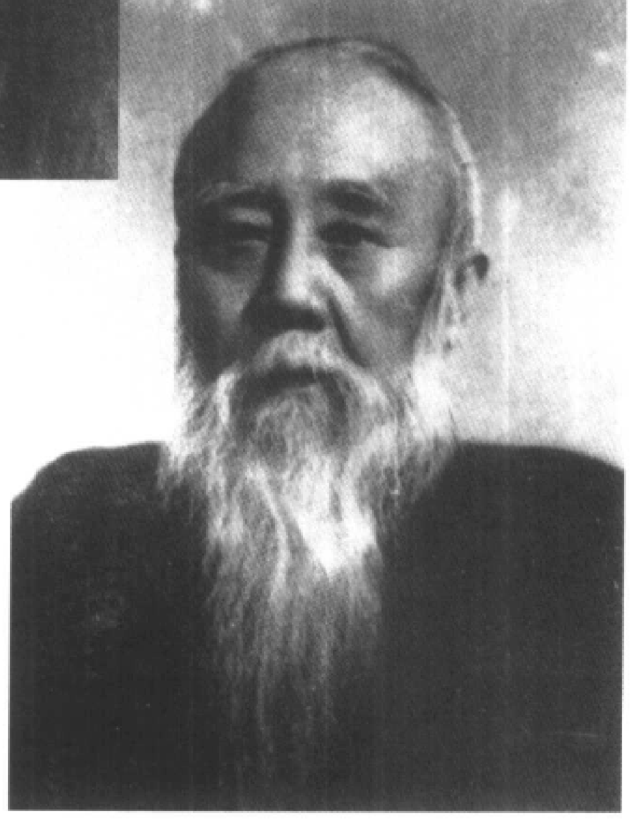


丰子恺先生像

夏丏尊先生像



弘一大师像



马一浮先生像

篇 首 语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人被誉为“学术四杰”；清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等六人在戊戌政变中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因“七君子事件”而被时人誉称“七君子”。像这样的称谓，文化界、史学界早已熟知。而本书提及的“四君子”，是笔者自拟，读者或许感到陌生，然一旦具体到弘一大师李叔同、马一浮、夏丏尊、丰子恺四位先贤的尊姓大名，读者又或许会赞同笔者的这一提法。

明清“学术四杰”，他们虽有相近的哲学主张，即矫道统、斥宗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实学实行实用之天

下”的朴实学风，但他们彼此之间，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往还交游；而“戊戌六君子”、“抗日七君子”，又是着眼于其舍身为国的政治立场，而为世人所称道。本书所记的“四君子”，则全然不同了，一方面他们个个道德高尚、学问高深、成就卓著，另一方面他们以文化和友情相互往还、彼此影响，每一个人的生平经历、事业建树几乎都有其他三个人的影子。而更为突出的特点是，他们之间的交游，没有政治色彩和功利目的，全然是君子之交。这是一个别具特色，甚至是带有传奇和悲壮色彩的文化现象。正是有鉴于此，笔者将他们称为“四君子”，并就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游、影响做一实录。

在本书中，笔者把四位先贤的交游实况分作三个阶段在上篇、中篇、下篇中分别记述。其起讫时间分别为：1912年至1918年；1919年至1937年；1938年至1946年。事实上，随着弘一大师和夏丏尊分别于1942年和1946年谢世，四君子之间的实际交往已不复存在。然而此后丰子恺与马一浮间的交游依然密切，基于有其始，亦应有其终的考量，笔者对此仍做概要的介绍。

本书附有《四君子交游年表》一份，为的是目前存世的各种有关“四君子”的单人年谱、年表失误过多而编撰的。交游年表中特设“文化大事记略”一栏，以供读者对四君子“现象”与中国的文化大背景做一个比对。这样做，既可以理出一份四君子交游线索的年谱资料，同时又可以在此中对以往年谱、年表中的失误做尽可能准确的

订正。

以上即是笔者对本书写作动机、内容大要的基本介绍。话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就该进入主题了。就让我们的话题，从1908年的杭州开始……



陈星，1957年9月生于杭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浙江省期刊协会副会长、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理事长。主要著作有《白马湖作家群》、《弘一大师传》、《丰子恺新传》、《清凉世界——丰子恺艺术研究》、《隐士儒宗马一浮》、《广陵绝响》、《孤云野鹤苏曼殊》等三十余部。1994年、1997年分别以《护生画集研究》、《重访散文的家园》蝉联第一、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并被列为全国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杰出青年和杭州市青年英才。

责任编辑：訾杰
封面设计：林军

目录

上 篇

中 篇

下 篇

上篇





幸　会

一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春,在杭州旧贡院的废墟上耸立起了七进崭新的教学大楼,连带其附属建筑——健身房、附属小学、音乐与手工教室、食堂宿舍等,使这里一时成了浙江省最大的一所学府。这便是浙江省官立两级师范学堂——一所在向西方学习声浪中诞生的新式学校。

在这所学校里,教师绝大部分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同时也聘用日籍教员多名。其中,教育学科的日籍教师叫中桐确太郎,而他的翻译即是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夏

丏尊先生。

夏丏尊生于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6月15日,浙江省上虞县松厦乡人,小名钊,名铸,字勉旃,1912年改字丏尊。夏丏尊祖上一度经商,其父寿恒倒是一位秀才。丏尊有兄妹六人,行三,是兄妹中唯一的读书人。丏尊十五岁那年中秀才,十六岁奉父命赴上海东吴大学的前身中西书院深造,半年后返乡,十七岁入绍兴府学堂读书。1905年,十九岁的夏丏尊负笈东瀛,入东京宏文学院,两年后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因未领到官费,遂于1907年辍学回国。

夏丏尊在浙江省官立两级师范学堂任日文翻译后不久,先后还任舍监、司训育,并兼授国文、日文。1912年,对于两级师范和夏丏尊本人来说都是历史性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注重"人格教育",力主以"勤、慎、诚、恕"为校训,提倡"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经亨颐先生接任了两级师范的校长,而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经亨颐为了加强学校的艺术教育,从上海请来了赫赫有名的李叔同先生来校执教。经亨颐的确是一位有眼力的校长。因为这位"二十文章惊海内"、最早出洋研习并实践话剧,同时攻读音乐、美术的李叔同实在是一位中国近代艺术开风气之先的前卫人物。谁又知道,他来到浙江两级师范后还会创造出多少个中国第一呢?

李叔同的到来,无疑给夏丏尊的生活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活力。

有人说，夏丏尊与李叔同原本在日本时就已相识。例如他俩共同的同事，教手工艺术的姜丹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元年秋，李先生叔同亦来任教习。李与夏，故为留日学友，相交尤契。"然而姜丹书此言未必确当。因为夏丏尊本人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明确讲过："我和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字屡易，为世熟知者名曰息，字曰叔同）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他们二人虽说相识得并不算很早，可一旦相遇，便意气相投、情同手足。对于此，在别人看来十分的羡慕，在夏丏尊自己看来又备感荣幸。他承认：在这所学校里，李叔同"和我相交者近十年，他的一言一行，随时都给我以启诱。"他折服于李叔同的"神力"，以为"李先生教图书、音乐，学生对图书、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做背景的缘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是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

夏丏尊虽是一位忧国忧民且具有一副古道热肠的人，但也正如他自己所以为的那样，在那个时候，他身上的少年名士气息已忏除将尽，只想在教育上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因此，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他并不热衷于政治（1920 年，毛泽东曾与夏丏尊在湖南第一师范共过事。北伐时，毛泽东也曾对朋友说："丏尊先生不了解政治"）。

他跟李叔同一样，并不愿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1912年，社会上一时盛传要进行普选。夏丏尊不愿当选，便改名叫了“丏尊”，以代替读音相近的“勉旃”，有意让选举人填写“丏”字时误写为“丐”而成废票。当然，此后并未实行所谓的普选，但他的性情则由此而流露无遗。从此，人们就叫他夏丏尊，若是尊称，则称他为“丏师”或“丏翁”了。

二

再说这位新来的李叔同先生，他是因上海的《太平洋报》停刊而被经亨颐校长邀请来校主持艺术科教学的。

《太平洋报》创刊于1912年4月1日，是同盟会于民国成立后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它的印刷设备来自光复前同盟会在上海租界马霍路办的一个秘密印刷所，由沪军都督陈英士调拨，报社的日常经费也由陈英士负责维持。然而这份报纸只出版了半年左右，终因经费困难而于同年秋天停刊。《太平洋报》的寿命虽短暂，但李叔同在那里倒也度过了一段辉煌的时期。

《太平洋报》的同仁中绝大部分是“南社”的成员。这“南社”是由高天梅、陈去病和柳亚子三位好友于1909年创立的进步作家团体，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革

命团体。“南社”的命名跟清王朝的“北廷”相对立，其宗旨是通过文学传播民主，主张推翻清王朝。故此，也有人认为“南社”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一支文学部队。李叔同是于1912年初春加入“南社”的，共同的理想使他跟《太平洋报》的朋友们相处得十分和谐，像叶楚伧、柳亚子、苏曼殊、胡朴安、胡寄尘等都是他经常交往的同仁。李叔同利用《太平洋报》这块阵地，竭力传播西洋艺术，他开辟了“西洋画法”专栏，连载写生教授法、制作广告漫画、请来北京画家陈师曾做艺术交流……几乎是风风火火地大干了一场。可想而知，《太平洋报》的停刊，这对于李叔同来讲如同失却了一块大显身手的理想天地。好在他原本就是一位干一行就能干好一行的全才，因此他应邀来到浙江两级师范后便很快就能适应新的环境。他脱下西装，换上一身布衣：灰色布长衫，黑布马褂，金边眼镜换了铜丝边的，从内心到外表迅速进入了新的角色。

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李叔同为就近参加乡试曾到过杭州，可那次他只在杭州住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这次不同了，他不仅一住就是近十年，而且他一生最大的转折就发生在这里。这种转折的因缘居然直接来自于夏丏尊。

李叔同比夏丏尊年长六岁。但他俩气味相投，加上李叔同相对于夏丏尊多少显得豁然，而夏丏尊比之于李叔同又多少显得老成，所以，他俩几乎没有什么年龄上的隔阂。有一幅《小梅花屋图》上的题跋颇能看出他俩的性

情和友谊。当时李叔同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而夏丐尊则住在城里的弯井巷。夏丐尊在那里租了几间旧房子，由于窗前有一棵梅树，遂取名叫“小梅花屋”。“小梅花屋”里有陈师曾画赠的《小梅花屋图》一幅，图上有李叔同所题《玉连环》词一首，词曰：

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

夏丐尊也有自己题写的一首《金缕曲》：

已倦吹箫矣。走江湖，饥来驱我，嗒伤吴市。租屋三间如铗小，安顿妻孥而已。笑落魄萍踪如寄。竹屋纸窗清欲绝，有梅花慰我荒凉意，自领略枯寒味。

此生但得三弓地。筑蜗居、梅花不种，也堪贫死。湖上青山青到眼，摇荡烟光眉际。只不是家乡山水。百事输人华发改，快商量别作收场计。何郁郁，久居此！

夏丐尊就是这样一位多愁善感之人。他也曾想超脱一点，曾刻一印，曰“无闷居士”。他此时才二十几岁，本不该有多少愁闷，而欲自勉“无闷”，多少说明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已是闷闷矣。李叔同倒是觉得他的这种性格颇为可爱。夏丐尊本不是诗人，而李叔同则把他誉为诗人，这里多少指的是他的气质人品了。

三

这是1913年的一天，西湖三岛之一的湖心亭里坐着一瘦一胖两位身穿长衫的人正在品茗清谈。这湖心亭，初名“振鹭”，始建于公元1552年，后改称“清喜阁”。湖心亭即是按清朝时清喜阁样式设计重建的。清代所谓“钱塘十八景”之一的“湖心平眺”指的就是这里的景色。置身于此亭中环顾，湖心碧波浩淼，群山环列如屏，而已身仿佛居于海上蓬莱之宫，真是“霞光映碧波，水色入心清”，令人心旷神怡。李叔同和夏丏尊经常在课余雇上一只小船到这里来吃茶。但这一天他俩却是为了躲避一个所谓的社会名流在学校里发表演讲。每次遇到这种场合，他俩往往是要走开的。夏丏尊似乎也觉得他们的这种行为多少有些滑稽，就对李叔同说：

“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

对于夏丏尊来讲，这话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像他这么一个对待校务和学生的任何事都要愁一愁、忧一忧的人哪能做得如此洒脱彻底呢？

在学校里，负责管理学生宿舍的舍监一职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谁都不愿意承担。而夏丏尊会自告奋勇提出兼任；一段时间，学校缺乏国文教师，又是他主动要求担当。有一次，一个学生在宿舍里丢失了一些财物，大家猜想可能是某同学偷的，可又没有证据。身为舍监

的夏丏尊自感责任在身，为此愧闷不已。他向李叔同求教，问他处理此事可有良策？岂料，李叔同的良策竟是要他自杀：

"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了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夏丏尊当然是不能这样去做的，于是就向李叔同笑谢，而李叔同自然也不会去责备他。夏丏尊知道，这样做在一般人眼里无疑太过偏激。可李叔同提出来则是真心流露，全无虚伪之意。跟李叔同比起来，夏丏尊深感自己的感化力不足。因为在他看起来，自从李叔同来校教图画、音乐以后，这两门原先不被学生看重的课一下子热门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了过去。于是他得出结论："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

1913年夏，浙江省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易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共同的教育理想，促使他俩合作写了一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歌"。这首歌由夏丏尊作词，李叔同谱曲。歌词曰：

> 人人人，代谢靡尽，先后觉新民。可能可能，陶冶精神，道德润心身。吾侪同学，负斯重任，相勉又相

亲。五载光阴，学与俱进，磐固吾根本。叶蓁蓁，木欣欣，碧梧万枝新。之江西，西湖滨，桃李一堂春。

两级师范时期也曾有过校歌。其歌词是这样的：

功如忠肃，学似文成，自古名贤数浙人。山川钟毓，代有奇英，六百同堂步后尘。文章惊海内，科学究专门，新旧中西一贯行。今日为多士，他年铸国民，教育前途定有声。

可以明显地发现，两级师范时期的校歌颇有一些"豪气"，像"自古名贤数浙人"、"他年铸国民，教育前途定有声"等都有这样的意味。相比之下，"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歌"的氛围就有几分亲情与温馨了，像"陶冶精神，道德润心身"、"相勉又相亲"、"西湖滨，桃李一堂春"等。这当然就跟李叔同、夏丏尊在当时提倡艺术教育、感情熏陶有直接的关系了。

四

这两位提倡艺术教育的好友还一起办过校友会的刊物《白阳》杂志，其创刊号封面由李叔同设计，全部文字也

由他用毛笔书写后石印。李叔同所做的《春游》三部合唱歌曲、《音乐小杂志序》、《西湖夜游记》以及《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说》、《石膏模型用法》等文章也均用“息霜”之名在刊物上发表。其中《西湖夜游记》，文采飞扬，意韵醇厚：

> 壬子七月，余重来杭州，客师范学舍。残暑未歇，庭树肇秋，高楼当风，竟夕寂坐。越六日，偕姜夏二先生游西湖。于时，晚晖落红，暮山被紫，游众星散，流萤出林。湖岸风来，轻裾致爽。乃入湖上某亭，命治茗具，又有菱芰，陈粲盈几。短童侍坐，狂客披襟，申眉高谈，乐说旧事。庄谐杂作，继以长啸，林鸟惊飞，残灯不华。起视明湖，莹然一碧，远峰苍苍，若隐若现，颇涉遐想，因忆旧游。曩岁来杭，故旧交集，文子耀斋，田子毅侯，时相过从，辄饮湖上。岁月如流，倏逾九稔。生者流难，逝者不作，坠欢莫拾，酒痕在衣。刘孝标云：“魂魄一去，将同秋草。”吾生渺茫，可唏然感矣！漏下三箭，秉烛言归。星辰在天，万籁俱寂，野火暗暗，疑似青磷；垂杨沉沉，有如酣睡。归来篝灯，斗室无寐，秋声如雨，我劳如何？目瞑意倦，濡笔记之。

清雅毓秀的西湖，给了李叔同无数艺术灵感。他做《春游》：“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如画”，《早秋》：“十里明湖一叶舟，城南烟月水西楼”，《西湖》：“大好湖山

美如此，独擅天然美”。

夏丏尊对他的才情算是折服了。以往人们很少谈到夏丏尊的诗作，但在此时，他也应和着李叔同有过两首颇有味道的小诗：

其一：

数星灯火漾疏村，四起梵钟破暮痕。

为问风流李学士，可添画意与诗魂？

其二：

远峰寒碧夕阳殷，烟翠空冥西子鬟。

欲去依依有余恋，晚江新月雾中山。

由此看来，李叔同在为夏丏尊题小梅花屋图的词中说“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又并非虚言了。他俩就是这样共同领略着教育的乐趣、享受着西湖的姿韵。

高　足

一

1914年初秋，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学的时候，在一年级新生中有一名从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市石门镇）考上来的少年。他刚满十六岁，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看上去既朴实憨厚又充满灵气。他就是丰子恺，一个在李叔同、夏丏尊精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艺术大师。

这一年的夏天，丰子恺以第一名的成绩在故乡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毕业。此后，他来到省城杭州同时报考了三所学校，结果甲种商校取第一名、第一中学取第

八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取第三名，三校同时录取。丰子恺最后下决心选择第一师范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尊重母亲的意愿，二是自感此校规模宏大，似乎更可以满足其求知的欲望。当然，就丰子恺来讲，他的这一选择实在是明智之举，因为就在这一所学校里，他遇上了李叔同、夏丏尊这两位与他结缘最深的良师。他俩一个引导丰子恺走上了艺术道路，并启迪了他那颗善良的艺术心灵；一个则直接培养并激发了丰子恺的写作兴趣。

正如上一节中所述，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有像校长经亨颐和李叔同、夏丏尊这样一大批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他们一心一意地治校办学，使该校学风纯正，民主气息浓厚；又由于李叔同等人的提倡，学校里的师生对艺术科的教学都十分重视。学校设有开天窗的专用图画教室；有四面临空，单独座落在校园花丛中，拥有两架钢琴、五六十架风琴的音乐教室。学校里的图画、音乐课在课表中虽然按规定教时进行，然而课外图画、音乐学习时间却比任何科目都多。每天下午四时以后，满校琴声悠扬，图画教室里也总有许多学生在练习绘画。其情景，宛若一所艺术专科学校。

就是在这样一所宛若艺术学校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里，丰子恺开始从师于李叔同，接受正规的音乐和绘画教育。

对于老师李叔同的最初印象，丰子恺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走向音乐教室(这教室四面临空,独立在花园里,好比一个温室),推开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骂着推开门来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或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高而削瘦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字来形容,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

李叔同上课非常严肃认真,他总是在上课之前,先在教室的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好这堂课所授内容,然后端坐在讲台前静候学生们的到来。他的这种认真精神,就连最调皮的学生也不敢散漫。每到上他的课,学生个个提前入室,从未有人迟到。丰子恺自然不会被列入顽皮学生之列,李叔同这种“温而厉”的神态举止,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二

其实，早在丰子恺的儿童时代，就曾接触过李叔同创作的歌曲。那是李叔同于1905年在上海为沪学会补习科做的一首《祖国歌》，歌词是：

>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此歌选用中国民间乐曲《老六板》填词，很合大众口味，所以它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风靡一时（一说《祖国歌》是李叔同根据《大国民》改写，存疑）。1910年，丰子恺还只有十三岁。他在故乡的小学堂里读书时，金可铸老师就教他们唱这首歌，还组织了一大批同学排着队、持着龙旗、吹着喇叭、敲起铜鼓，一面高唱《祖国歌》，一面宣传用国货。当时的丰子恺既不认识李叔同，也不知道这歌曲是谁写的，只知唱起来颇能激发

起爱国情怀。直到现在，他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方才认识李叔同，也才知道他自己儿时所唱的《祖国歌》正是眼前这位“温而厉”的李先生的作品。所以，丰子恺从一开始就对李叔同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

诚然，丰子恺在认识李叔同之初，心中的敬畏之情尚处在一种表层的直觉阶段，但很快就被因更深入的了解、频繁的接触所产生的内在价值的评判所替代了。这种价值评判一旦在丰子恺的心中确立，便决心跟着李叔同专攻艺术科，此后，他似乎变换了一种形象：“以前学期考试连列第一，此后一落千丈，有时竟考末名，幸有前两年的好成绩，平均起来，毕业成绩犹得第二十名。”（丰子恺语）

丰子恺在入学之初，原梦想自己能跟从一位“我所钦佩的博学国文先生研究古文，或进理科大学研究理化，或入教会学校研究外国文。”是什么原因使他放弃了这些念头而把兴趣转移到艺术方面的呢？当然就是李叔同的魅力。

以往，丰子恺对自然界的物象也有过思考。他闲时注视眼前的事物，例如天上的云，墙上的苔痕，桌上的器物，别人的脸孔等，他的心常常会跟着这种线条和浓淡之度而活动，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与情趣，觉得一切形状中，其线条与明暗都有很复杂的组织和条理，仔细注视而研究起来，颇有兴致。然而，这些事在当时的丰子恺看来纯粹是无关紧要的。除了有这方面的兴趣外，他想这世上大概不会有人像他这样去探究这种学问的。可是当李

叔同教他们用木炭描写石膏模型后，丰子恺“恍然悟到，这就是我平日闲看眼前事物时所经常做的玩意！”当李叔同指着石膏模型说：“你看，眉毛和眼睛是连在一块的，并不分明；鼻头须当作削成三面形，这一面最明，这一面最暗，这一面适中；头与脸孔的轮廓不是圆形，是不规则的多角形，须用直线描写，不过其不甚显著”的时候，丰子恺意识到这些不就是自己平日观察人物时所曾经注意到的情况吗？原来世间居然就有研究这些事的学问！没料到曾经是他私下的玩意，也有公开经李叔同教导的一日！

丰子恺终于体会到绘画与数理化的滋味不同。于是他对绘画之道有了兴味，竟慢慢疏远其他功课，而把头扎入木炭画之中。没过多久，他的技艺大进，环顾周围，发现其他同学没有能比得上自己的。他成了学校里绘画成绩拔尖的佼佼者。

三

由于丰子恺对李叔同教授的图画、音乐课的偏爱，成了艺术科顶尖的学生。他学会了弹钢琴、画素描，还跟着李叔同习篆刻。当时学校里有“乐石社”（后改名为“寄社”）和“桐阴画会”，都是李叔同一手倡导的。“南社”社友姚鹓雏有《乐石社记》一文刊于《南社丛刻》第十八集。

文曰："乐石社者，李子息霜（"息霜"乃李叔同出家前常用名——引者注）集其友朋弟子治金石之学者，相与探讨观摩，穷极渊微而以存古之作也。……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画、能绘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篆刻……兹来虎林（"虎林"即杭州——引者注），出其所学，以饷多士。复能于课余之暇，进以风雅，雍雍矩度，讲贯一堂，毡墨鼎彝，与山色湖光相掩映……"从这段小记之中，人们不仅可知"乐石社"在当时文化界的影响，还多少能够看到李叔同及其弟子们雅聚一堂、治印交流的景况。

李叔同的另一个学生吴梦非在《"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教育回忆片断》一文中亦透露了"乐石社"的一些具体消息："我们的课外组织有'漫画会'、'乐石社'（研究金石雕刻）等，并曾出版《木板画集》，这是自画、自刻、自己印刷的作品，其中有李叔同、夏丏尊的木刻。"这段记述很重要，因为从时间上推断，李叔同、夏丏尊当是中国近代木刻最早的作者和倡导者。

李叔同倡导的另一个课余艺术组织是"桐阴画会"（当是上文吴梦非所述之"漫画会"）。"桐阴画会"名称的来由很有意思。浙一师的校园里种有许多梧桐树。每到夏天，同学们都爱在树阴下自修学习。有一次，同学们谈及清代画家秦祖永有《桐阴论画》的著述，便提出了"桐阴"二字作画会的名称。由于丰子恺的绘画成绩最好，便被推举为画会的会务主持。

丰子恺受到李叔同器重，但这首先是因为他在李叔

同那里经受了十分严格的训练。所谓“还琴”一事多少可以说明问题。

当时，李叔同每星期给学生们上一次弹琴课。上课时，他先把新课弹一遍给学生听。在稍微指导了弹法要点后，就令学生各自回去练习。在一个星期之后，学生须练得非常纯熟再来弹给他听，这就叫作“还琴”。说起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并不是一所专业的音乐学校，“还琴”这一招并不是教务处排定在课程表内的音乐功课，但李叔同的要求高，做学生的也就只能遵循，觉得这课外的修业实际比较一切正课都艰辛而严肃——这是丰子恺的切身体会：“我每逢轮到还琴的一天，饭总是不吃饱的。我在十分钟内了结吃饭与盥洗二事，立刻挟了弹琴讲义，先到练琴室内去，抱了一下佛脚，然后心中带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而走进还琴教室去。我们的先生——他似乎是不吃饭的——早已静悄悄地等候在那里。大风琴上的谱表与音栓都已安排妥帖，显出一排雪白的键板，犹似一件怪物张着阔大的口，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而蹲踞着，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来到。”

李叔同很熟悉丰子恺弹琴的进度，每次看到丰子恺进来，都能翻出他此日应还的一课。丰子恺“还琴”之时，李叔同并不逼近他，也不正面督视他的手指，而是站立在离开他数步远的地方用眼睛不停地斜注丰子恺弹琴的手指。要是按错一个键板，他会立刻知道，有时即便是用错了一根手指，他也会急速地转过头来表示通不过。“还

琴”时遇上小错，李叔同会要求他从乐曲开始处重弹，大错则须从乐曲处重弹。要是真的过不了关，李叔同不会责骂学生，而是用平和而严肃的语调低声地说一声“下次再还”，于是学生只好起身离琴，带着心中一块沉重的大石头走出教室，再去加上刻苦练习的工夫。

四

李叔同的学生很多，日后成就卓越的也不少。但就李叔同个人而言，他在浙一所里有意重点培养的有两位，其中一位是1912年入学的刘质平，后来成了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而另一位就是丰子恺了。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因为李叔同在接纳这两个学生成为“入室弟子”的时候，都有一些传奇色彩。

刘质平来自浙江海宁农村，家境贫寒。他虽在家乡接触过民间乐器，但真正迷上音乐，则是从遇上李叔同后开始的。1912年冬的一天，刘质平创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这天适逢大雪，天寒地冻。刘质平拿着习作去向李叔同请教，但见先生细阅一过，若有所思，并且注视他良久。刘质平以为老师怪罪他急于求成，正在羞愧之中，忽听李叔同说道：“今晚八时三十五分，赴音乐教室，有话讲。”

这天晚上，雪越下越大，还不时刮着狂风。刘质平准时赴约，可他走到教室的走廊时，发现地上已有足迹，再抬头看看教室，室内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声响。刘质平以为老师还未来，就站在门外廊下等候。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忽然，教室里的电灯大亮。教室的门开了，走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先生李叔同。他手持一表，说相约时间无误，并知道刘质平在门外尝风雪之苦已久，就让他回去了。原来，这是李叔同用以考验人的一种方式。经过此事，李叔同料定刘质平是一位守信且能吃苦的学生，自是一块可以造就的好材料。

且说丰子恺在艺术上的每一个进步，李叔同都是注意到的。当时丰子恺在年级中任级长。一天晚上，他到李叔同的房间去汇报学习情况，当汇报完正要退出时，李叔同叫住了他：

"你的画进步很快！在我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

李叔同平时说话不多，可一旦说了，都是十二万分的认真。聪明的丰子恺明白了老师的意图，他认为"李先生当时兼授南京高等师范及我们第一师范两校的图画，他又是我们最敬佩的先生之一。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强烈的东风，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果然，丰子恺从此"大变方向"了。对此，丰子恺自己有一段十分神秘而又自感庆幸的谈话：

"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记得

年月日时，又不相信算命。如果记得，而又迷信算命先生的话，算起命来，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直到现在没有变志。"(丰子恺:《为青年说弘一法师》)

自从李叔同收了丰子恺这位弟子后，他开始给丰子恺开了"小灶"，从多方面提高丰子恺的艺术素质。李叔同是学西洋艺术的，那时候西洋艺术理论多从日本介绍进来。他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也耳闻目睹了日本文艺界的兴盛与活跃。于是他要求丰子恺在学习课程规定的英文外，再苦修日文，并由他亲自利用课外时间做辅导。这样，丰子恺与李叔同的接触日益频繁，其深厚弥笃、永恒持久的师生情谊从此牢固的建立起来了。

五

跟李叔同一样，夏丏尊也是学生们敬佩的一位师长。正如前面介绍的那样，夏丏尊具有多愁善感的性格，这种性格导致了他在对待学生的学习、生活上也有着跟李叔同不同的教育方式。丰子恺对这两位老师的概括十分形象，用他的话来说："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

‘妈妈的教育’。”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学校里，夏丏尊事无具细，几乎什么都要操心。他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会说：“为啥同狗为难！”放假的日子，学生们要出门，他看见后又要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即便学生走远了，他还要高声大喊：“铜钿少用些！”夏丏尊关心学生，于是学生也都信任他，遇到有向学校请愿的事情，学生们都爱去找他，若是他觉得学生的意见合理，便会当作他自己的意见，想方设法去交涉。

夏丏尊除了做舍监外，还教国文。他的教育思想是很开明进步的。那个时候，“五四”运动将近，夏丏尊顺应时代潮流，在学生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后，果断要求学生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他的具体要求很简单，那就是：“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

有一回，他布置学生写作文。一位同学写父亲客死他乡，文中说自己“星夜匍伏奔丧”。夏丏尊看后就去问这位同学：“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一句话，问得这个学生惭愧得满脸通红。又有一位同学，在文章中颇有一些消极和牢骚，说是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丏尊读后又厉声问道：“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夏丏尊就是这样一个力戒娇柔造作而提倡朴实文风的国文教师。

夏丏尊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丰子恺影响很大，因

而使他对写文章的兴趣大增。可以这么说：丰子恺的写作，是夏丏尊一手辅导，并在他的热情鼓励之下逐步走向成熟的。关于这一点，丰子恺自己最清楚。丰氏在《旧话》一文中有过这样的回忆："我在校时不会作文。我的作文全是出校后从夏先生学习的。夏先生常指示我读什么书，或拿含有好文章的书给我看，在我最感受用。他看了我的文章，有时皱着眉头叫道：'这文章有毛病呢！''这文章不是这样做的！'有时微笑点头而说道：'文章好呀……'我的文章完全是在他这种话下练习起来。"丰子恺还说过："以往我每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可见，丰子恺把他自己在文学上的发展完全归功于夏丏尊了。诚如他自己断定的那样：

"我倘不入师范，不致遇见李叔同先生，不致学画；也不致遇见夏丏尊先生，不致学文。"

这可真是一对"父母"先生，丰子恺把他俩是置于同等尊敬的地位上的。

慕　道

一

杭州自古就是一块佛土。许多历史上的名贤，诸如苏东坡、白居易、林和靖等都在这块佛地与佛教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近代的苏曼殊也是如此，每当他在生活中遇到挫折，他都会到杭州来润泽一下自己的心灵。李叔同怎样呢？且看他自己的表白："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以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作痘神祠的楼上。痘

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有意思呢！”

李叔同对出家人的生活有兴趣，可他身为教师，虽然内心与西湖的空山灵雨颇能契合，但几年来，他倒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在实际的教学之中，生活也就相对的稳定。然而，这种相对的稳定终于在1916年夏日的一天给动摇了，其客观原因，当又与夏丏尊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一天，夏丏尊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断食的修养方法》的文章。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杰出人物，如释迦、耶稣等都曾实行过断食修炼。还说断食可以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又列出了实行断食过程中的种种注意事项和方法，继而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

夏丏尊读了此文后，觉得很有趣，一时兴奋，就把它介绍给李叔同。李叔同不看倒也罢了，可这一看，便就被迷住了。在此后两人的闲谈中，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像这种话，在夏丏尊看来不过只是说说罢了，作为一种戏言，随后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可李叔同不然。他是一个凡事都认真的人，虽然无意去做释迦、耶稣那样的圣人，但既然这篇文章中说到断食有这许多好处，为何不去一试呢？李叔同自己是这样表白的：“我于日本杂志中，看到有说关于断食的方法的，谓断食可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

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

李叔同决心下了。但在学校里，他没有声张，只是私下里为此做着准备，就连夏丏尊，他也没有告诉。

二

根据日本杂志上的文章介绍，实行断食须在寒冷的冬季进行方才适宜。为此李叔同初步确定的断食的时间是在当年的农历十一月。寒露的那一天，他做了一首《题陈师曾画荷小幅》。词有小序：

> “师曾画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贻德泉先生同学。今再展玩，为缀小词。时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劭也。丙辰寒露。”
>
> 词曰：
>
> “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

断食是要有一处幽静的地方的。根据西冷印社社友叶品三先生的推荐，他选中了虎跑寺。

这虎跑寺位于西湖西南隅的大慈山下，也叫定慧寺。这里群峰环峙，丛林莽莽，溪水淙淙，空气清新，环境十分

幽雅。虎跑寺有一位大护法叫丁辅之，是叶品三的朋友。于是经介绍，李叔同就于农历十一月底，也就是学校放公历年假的时候，住进了方丈楼下的一间空房，与僧人的生活更加亲近起来。他经常看见有一位出家人从他的窗前轻轻地走过，每至此时，他都会羡慕其与世无争的超凡气象。有时他会向僧人借来佛经看，企图在经书中探觅另一种人生。

断食是道人规矩，李叔同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也在断食后自称"欣欣道人"。断食后的李叔同拍过一张照片，也写过纪念性质的书幅。其中一幅书赠朱稣典的横幅代表了他当时的第一感受。此横幅只有两个大字："灵化"，落款处写道："丙辰新嘉平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

李叔同自称断食时间是十七天，但他在虎跑寺实际住的时间则是三个星期。也就是说，自学校放年假起，他离开学校的时间已将近一个月。

三

按照李叔同的惯例，他一般是在每个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海伦路家中的日籍夫人团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回杭州。他宁可自己辛苦奔波，却从来不无故请

假。在夏丏尊看来,李叔同每个星期六都要回上海,那么年假时也必定如此了。所以这回夏丏尊以为一切如常,学校的公历年假一放,就自管回上虞县老家。可假满返校时,一惯准时归来的李叔同却没有人影。一天、两天、十天,直到两个星期后才见到李叔同一副清癯瘦削的模样回来了。直到这时,夏丏尊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仁兄是背着自己独自到大慈山虎跑寺实行断食去了。为此他惊异地问:

"为什么不告诉我?"

李叔同颇为镇定,笑答:

"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

夏丏尊一听此言,除了苦笑之外,竟也答不出一句话来。他后悔早不该介绍李叔同读那篇文章,有了这一回,还不知将来再发生什么事呢!

再说李叔同断食回来以后,食量居然大增,平时他不吃过于肥腻的肉类,现在就连大块大块的肥肉也照吃不误了。断食后的数日,李叔同回过上海一趟。此时正值他的已经毕业的学生李鸿梁去看他。李鸿梁介绍道:李叔同当时邀请他到外面去吃馆子,叫了很多菜。李鸿梁以为还将有好几位客人,就问:

"还有哪几位客?"

"就是我们两个,并没有别的客人。"

又问:

“要不了这许多菜。”

“你能喝酒的，我虽然不能喝，可是我懂得喝酒的趣味。”

于是，李叔同就向堂倌要了一斤黄酒。上菜后，他果然吃了很多菜，居然还吃了三碗饭。李鸿梁担心老师撑坏了肚子，就提出忠告。岂料李叔同如此答道：现在胃口很好，照胃口吃的话，还可以再吃两碗呢！

如果从这些外在的现象看，李叔同的这次断食倒是真的促进了他的身体健康了。然而，这不过是表面的现象。因为在他的内心里，从此对僧人的生活开始向往起来。这段时间他做的一首《归燕》歌多少表明了他此时的心迹：

几日东风过寒食，
秋来花事已阑珊。
疏林寂寂双燕飞，
低回软语语呢喃：
呢喃，呢喃，呢喃，呢喃。
雕梁春去梦如烟，
绿芜庭院罢歌弦，
乌衣门巷捐秋扇，
树杪斜阳淡如眠。
天涯芳草离亭晚，
不如归去归故山，
故山隐约苍漫漫。

呢喃，呢喃，呢喃，呢喃，
不如归去归故山。

从 佛

一

正当李叔同自感“灵化欲仙”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去拜访一个人。此人正卜居在杭州的一条陋巷里以静居读书为乐，他就是被称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理学大师马一浮。

马一浮，浙江绍兴上虞长塘乡后庄村人。乳名锡铭，幼名福田，后更名浮，字一浮，号湛翁，晚号蠲叟，或蠲戏老人，同时也用过诸如一佛、圣湖居士、圣湖野老等别号。

马一浮于1883年生于四川成都，此时其父马廷培正在四川仁寿县做知县。1888年，六岁的马一浮随父母返

回浙江原籍，在家乡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马一浮自幼聪颖过人，三岁起即在母亲膝下认字读书，五岁可以吟诗对句。他从小就憧憬田园式的生活。相传在他十岁那年，母亲指菊命诗，并跟五言麻字韵，马一浮应声即就：

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
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
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家。
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母亲听后，既喜且惊："儿将来不患无文"。次年，马家请了一位颇有声望的举人郑墨田来家里教马一浮读书。可未过多少时日，郑墨田居然请辞。马一浮的父亲以为儿子不听教诲，或是什么地方得罪了先生。但一了解，方知马一浮才智超人，郑墨田自愧不能胜任。1898年，未满十六岁的马一浮赴绍兴城参加县试。同场应试者还有鲁迅、周作人兄弟，结果，马一浮名列榜首。关于此，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有记曰："……会稽十一金，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金第三十四，豫才兄在三金第三十七。"

自从马一浮在县试得了第一，一时名声大振。乡贤汤寿潜（民国浙江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即调来马一浮的文章阅读，为之赞叹不已。兴许是慕才心切，汤寿潜即以长女许配。于是，马一浮于十七岁那年跟汤家大小姐

完婚。然而不幸的是马一浮的妻子在他们结婚后的第三年就因病去逝，马一浮终生未再续弦。

1901 年冬，马一浮曾暂别妻子赴上海同文会堂学习英文、法文（次年 7 月 15 日其妻病逝），并与马君武、谢无量等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妻子谢世后，马一浮于 1903 年 6 月应清政府驻美使馆之聘，赴美国圣路易斯留学生监督公署担任中文文牍。期间还兼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曾游历英伦三岛及德意志国。1904 年 5 月，马一浮转赴日本游学半年，从日人乌泻隆三习日文、德文，同年 11 月回国。

二

按照马一浮的经历，他原本应该是一位“西化”的人物才顺乎情理。事实上，他在与人合办的《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上就已翻译介绍了斯宾塞的小说等西方文学以及西方法律、哲学。根据马一浮的日记《北米居留记》，马一浮在美期间读过大量的西方著作，像《亚理斯多德政治学》、《拜伦诗》、《日耳曼社会主义》、《宾塞尔伦理学原理》、《赫胥黎文集》、《黑格尔论理学》、《康德传》等等，无论何种流派、何家学说他都要读。而德文原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居然也是他第一个带回中国的。

然而，尽管马一浮到过欧美日许多国家，读过大量的西方著作，但他回国后并未急着宣传西方的思想。回国以后，马一浮静居镇江焦山海西庵一年，用以进一步研究、消化西学理论和西方文艺。他像是有意要把中西文化作一番彻底的对照研究似的。从1906年起，马一浮开始把重点放在国学方面，干脆搬到杭州，寄居西湖广化寺，天天在"文澜阁"里阅读《四库全书》。他有一首题为《岁暮书怀在广化寺》的诗记述了他当时的读书境况：

故国惊心物候迴，
不堪衰痛日相催。
江城鼓咽寒潮动，
佛阁青灯夜雨哀。
天童遥怜征战苦，
边风时送雁声来。
崎岖万事凭谁问，
且草玄书泻玉醅。

马一浮这么一读，似乎读古书读出了滋味，他惊叹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按照马叙伦的话说，此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马一浮"不屑于世务"确有事实为证。民国成立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此时，蔡元培想到了他的世谊同乡马一浮，特写信邀其担任教育部秘书长。看在朋友同乡上的面子上，马一浮勉强答应，可到南京后不到三星期，即辞职返杭。他对

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马一浮这么说，当然也是有其他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主张与蔡元培相悖。对此，马一浮后来说得十分明确："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做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云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省。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书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二十年之后，必有人才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本，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实际上，马一浮此言已道出他当时思想，即复兴儒学是为了培养国本，并把西学认作辅吾儒宗的工具。

马一浮去职后，于同一年赴新加坡一游，亲眼看到当地侨民在办学中不废经学，以儒学为国教的情况，两相对照，感慨万千。于是他归国后，更埋头于钻研国学，并开始涉及佛教。他广交高僧大德，通读三藏十二部，提出了"儒佛互摄说"，以为"六艺之言，显于此土。三藏之奥，演自彼夫。法界一如，心源无二。"后来他发起在家居士成立"般若会"，杭州各大丛林的方丈也都成了他的座上客。时至此际，马一浮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了国学一宗、佛学

大师了。

三

李叔同认识马一浮当是在1902年至1903年之间。当时，李叔同正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受业于蔡元培，而马一浮此时亦在上海游学。有关他俩当时的交往情况，很少有史料可考。有人曾提到李叔同与马一浮曾在上海共同发起“天马会”。但马一浮却声明没有此事：“溯不佞与法师相识于沪上，在壬寅癸卯间(1902—1903)，其后十余年未曾得见。直至民国初法师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始复相遇从，迄于出家受具。此数年间，时接谈论。前有‘天马会’之设，不佞初未与闻。”由此可见，在1902年的时候，他俩只是初交。然而现在就不同了，他俩同居杭州，交往的机会自然增多。尤其是李叔同实行断食后，对佛道的兴趣日增，自然会更加亲近这位深居简出的佛学大师。

说起来李叔同还年长马一浮三岁，但在佛学方面，他一直把马一浮视作良师。这种敬畏之心，跟苏曼殊颇为相似。苏曼殊在1916年12月25日复刘半农的信中说过：“此间有马处士一浮，其人无书不读，不慧曾两次相见，谈论娓娓，令人忘饥也。”李叔同也对丰子恺说过：“马

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有关李叔同断食以后跟马一浮谈佛论道的形象性记述,这就要借助丰子恺的散文《陋巷》了。丰子恺是这样描述的:

"第一次我到这陋巷里,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那时我只十七八岁,正在杭州的师范学校里读书。我的艺术科教师L先生(L即指李叔同——引者注)似乎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里去断了十七天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日,他带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M先生(M即指马一浮——引者注)。我跟着L先生走进这陋巷中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应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只椅子上听他们的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断片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又有一个英语'philosophy〔哲学〕'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

丰子恺不愧是一位文学高手,他对马一浮的形象描写十分传神:"他的头圆而大,脑部特别丰隆,假如身体不是这样矮胖,一定负载不起。他的眼不像L先生的眼地纤细,圆大而炯炯发光,上眼帘弯成一条坚致有力的弧

线，切着下面的深黑的瞳子。他的须髯从左耳根缘着脸孔一直挂到右耳根，颜色与眼瞳一样深黑。”

需要一提的是，马一浮在杭州独居过的先后有宝极观巷、马所巷、延定巷等。丰子恺所谓的“陋巷”，从文献考证中可以确定为延定巷。大约从1917年起，马一浮在此巷独居了近二十个年头。

四

当然，李叔同与马一浮的交往中也并不是全谈佛学的。他俩都是书法大师，彼此间也有关于书艺的交流，甚至还都爱好古琴。马一浮后来的女弟子袁卓尔在《一代儒宗，高山仰止》一文中提到：“据说太先生有时还为他们（指马一浮的外甥、外甥女——引者注）抚弄七弦琴（太先生精通音律，他室内墙壁上挂着一张琴，却很少有人有幸听他弹琴）。”看来马一浮是不常弹琴的。但他却与李叔同有过这方面的交流。例如马一浮于1917年写给李叔同的一封信中说道：“壁上琴弊，向者足下欲取而弹之，因命工修理，久之始就。曾告徐君，便欲遣赍往。未辱其答，恐左右或如金陵。比还杭州，愿以暇日，枉过草庵，安弦审理，或犹可备君子之御耳。”当时李叔同还兼任南京高等师范教职，此信估计是写往南京的。李叔同擅长西

洋乐器，但从此信中可知，他居然也懂得古琴。

诚然，相比较而言，李叔同与马一浮的往还，更多的还在于佛学方面。他从马一浮那里请了不少经书回来阅读，并从 1917 年下半年开始发心食素，又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供起佛像来，屋内终日青烟袅袅。他对虎跑已经有了感情。年终放年假的时候，他又不回上海，再次赴虎跑寺过年。这次他仍住在方丈楼下，只觉着趣味无穷。

再说马一浮有一位名叫彭逊之的朋友。此人先是与马一浮一起研究《易经》，两人颇合得来。此时，彭逊之请马一浮介绍一个清静的寓处。因为听李叔同说起过，马一浮就陪彭逊之到了虎跑。经介绍，彭逊之就跟李叔同住到了一起。可没过几天，也就是正月初八日，这位彭逊之忽然起心，当即决定出家了。此时此景，使李叔同深受感动。他原以为自己从佛的信念已经是够坚定的了，没想到这世上居然还有像彭逊之这样即修即悟的人。

然而，李叔同当时并不知道，这位彭逊之所谓的"即修即悟"并非是因崇拜佛教所致，而是他当时推算命理，认为必须出家方可免于忧患。马一浮就对他说过，研究佛法不必一定要出家。在彭逊之出家后，马一浮仍在给他的信中说道："承示新著天命说，并以相识讲论见勉。公所谓道，虽非浮之所及知，而朋友之爱言之，可谓至笃矣。然以其不好公之道为罪，则不亦过乎。人之契理，各有所会。续凫截鹤，未可强齐。公之谆谆屡以为言者，岂不以实见有生死可出，佛道可成乎？乃若浮，则无得无

证，不见有生死可出，佛道可成，与公今日见处正别。若今执吝幻色而修，如公所示法门，此皆风力所转，终成败坏。公即所佛，浮亦甘处大阐提。岂不闻大集魔王临危不变，虽瞿昙不奈伊何。虽然如此，朋友之旧，决不因是而改。公虽尽力诃斥，浮亦决不谤公。愿泯然平怀，勿存愤怒。此于公之道无损也。"由此可见，马一浮与彭逊之的分歧相当严重，像这种因推算命理而出家为僧，他当然是反对的。

彭逊之出家后，留下一妻二子，生活无着。马一浮仍以朋友之道适时接济，直至其子就业。然而，这位彭逊之又推之命理，自沉钱塘江底，幸被人救起。鉴于他无人照料，马一浮又担负起护理之责。此后，彭氏果然还俗。对于彭逊之的这些情况，李叔同后来应该是知道的，可他当时却也被彭氏的"即修即悟"所感动。彭氏出家后，李叔同也向住在方丈楼里的弘详法师提出拜师要求。虽未决定立即出家，但先做在家居士也是可以的。这位弘详法师多少知道李叔同是一个很有名望的艺术家，一时不敢贸然答应。

皈 依

一

李叔同皈依心切，弘详法师自然应该成全才是。他自己不肯让李叔同去拜他，这就请他在杭州松木场护国寺的师父了悟法师回虎跑来接应李叔同。于是，李叔同就在1918年正月十五日这天拜了悟法师为师行了皈依礼，取法名演音，号弘一。

关于李叔同的皈依时间，以往皆说是在1917年正月。如林子青《弘一大师传》（林子青先生后在《弘一大师新谱》中有纠正）、朱经畲《李叔同（弘一法师）年谱》以及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等文献都持这种说法。其实李

叔同的皈依时间是在 1918 年的正月十五日。而提供这个依据的正是李叔同自己。首先，李叔同在口述文章《我在西湖出家之经过》里说得很明白："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是到虎跑寺里去过年了。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只觉得更有兴味了……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此外，李叔同在于 1918 年二月初九日写给学生刘质平的信中附言曰："正月十五日，已皈依三宝，法名演音字弘一。"

以往人们之所以说李叔同皈依的时间是 1917 年正月。这或许是根据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推算出来的。因夏丏尊文中虽未提到具体年代，但他在叙述了李叔同于阳历年假(1917 年)断食事件后，紧接着又说阴历年假李叔同目睹彭逊之出家，继而皈依三宝。因为此文没有说到具体年代，而夏丏尊写此文又是在 1939 年的抗战期间，所以只能认为是一篇一般性的忆旧之作，应当看作是夏丏尊记错了具体时间。

李叔同皈依后，研佛读经更勤。他的亲近佛教，除了在虎跑寺感受到佛家的兴味外，他自己却把这些归于马一浮的熏染。对此，我们可以从李叔同给刘质平的一封信中看到："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日荒。"这种"渐有所悟，世味日淡"我们还能从他这时期做的歌曲中体会出来。他做过一首《晚钟》：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

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
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
绵绵灵响彻心弦，眑眑幽思凝冥杳。
众生病苦谁扶持？尘网颠倒泥涂污。
惟神愍恤敷大德，拯吾罪过成正觉。
誓心稽首永皈依，瞑瞑入定陈虔祈。
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仿佛天门破。
庄严七宝迷氤氲，瑶华翠羽垂缤纷。
浴灵光兮朝圣真，拜手承神恩！
仰天衢兮瞻慈云，若现忽若隐。
钟声沉暮天，神恩永存在。
神之恩，大无外。

这真是一个诗化的世界了。天地万物聚合在一起，它们共同承着神—佛的恩泽。可见这便是李叔同灵魂的归宿了。

二

李叔同皈依后，打算暂以居士身份修行。他眼下要做的，则是赶紧结束课业，准备在暑假后不再续任浙一师教职，这样便可专心念佛。他当然想到了丰子恺的继续深造。于是，他把丰子恺介绍给1918年春来华的大野隆

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巳辉等日本画家；又请夏丏尊接替他承担对丰子恺的日文辅导，理由是自己没有功夫。他的个人生活，正像丰子恺所讲的那样："渐渐收缩起来"了。

看到这种情景，夏丏尊不胜寂聊，他对自己介绍李叔同读断食文章后悔不已，他甚至悔不该在当初苦留李叔同在浙一师从教。关于这件事，夏丏尊有详细的介绍。他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中痛悔自己当初的作为："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住他，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看到李叔同如此"世昧日淡"的模样，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经意就脱口说了一句愤激之言：

"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李叔同听了此言，并未介意，却是笑颜相对。可夏丏尊哪里知道，他早有这个打算了。此时，李叔同做了一件海青，又学习两堂佛家的功课。二月初那天，是他母亲的

忌日，于是他又到虎跑寺，一连三天诵《地藏经》，为他的母亲回向。到了五月底，他便提前结束学校课程，并完成学生的考试。

李叔同开始整理在家的俗物，把平生所绘油画赠给北京的美术学校，笔砚碑帖赠给书法家周承德；书法作品、金表、折扇等赠给了夏丏尊、堵申甫；衣服书籍等送给了丰子恺、刘质平；玩好小品送给了陈师曾。他还特意把一包平生收藏的篆刻封在西泠印社的壁中……

在李叔同自己看来，时值此时，他已完成了红尘中的使命。诚如他后来给侄子李圣章的信中说到的那样："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

李叔同当然是可以"私心大慰"的，无论他此时是否出家，在弘扬文艺之事上，他既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中华民族。他所教育出来的英才，不仅继承了他的艺术，同时也继承了他的人格。在这方面，丰子恺是一位杰出的代表。平时，在李叔同的案头，总放着一本明代刘宗周著的关于古来贤人嘉言懿行的《人谱》，并且还亲笔在书的封面上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上一个红圈。他经常对丰子恺讲一些书中有关做人与艺术的准则："他红着脸，吃着口（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我们听，并且说明这里的'显贵'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该解释道德高尚，人

格伟大的意思。‘先器识而后文艺’，译成现代话，大约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可见，李叔同是多么重视人格修养的培育！丰子恺说：“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

李叔同后来把《人谱》送给了丰子恺。丰子恺将其珍藏在故乡的书房内，后因抗战炮火，书与屋毁于一炬。丰子恺在逃难期间，在成都的旧书摊上又见到一册《人谱》，他当即买下，并一直保存在身边。由此可见，李叔同的艺术和人格修养，原原本本地传授给了丰子恺，使他懂得："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的人，虽然未尝描画吟诗，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光明磊落之心，而为可敬可爱之人。若反之，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心，则其人不啻一架无情的机器了。"跟老师一样，此后丰子恺以博爱、深广的心灵去看天地间的一切有情无情的物类，以艺术家的心，对世间万物均给以热诚的同情。

三

事实上，李叔同自结束学生考试后就已到虎跑去念佛了，只是还没有完全与浙一师脱离关系。

七月初的一天，李叔同带着丰子恺到玉泉去看望一位叫程中和的先生。此人原是一个军官，退伍后闲居在家，竟也生出出家之念。当时李叔同跟他谈得十分投机。可不出数日，丰子恺因陪同日本画家（李叔同的朋友）到玉泉去，又见到了程中和。可这时的程中和已成了剃了光头的僧人。丰子恺十分惊异，他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如此之快。丰子恺回到学校后，即把玉泉所见告诉李叔同，岂知李叔同亦十分认真地对他说，不久自己也将出家为僧，时间定为七月十三日（农历）。

李叔同出家的前夜，他做了一件极具传奇色彩的事情。

还是在 1917 年的春天，同事姜丹书先生的母亲因患胃病逝世。当时姜丹书就请李叔同为其母书一墓志铭。李叔同答是答应了，可迟迟没有动笔，一直到一年多后他在尘俗中的最后一天的晚上，他才点燃一枝红烛，写下了他在俗时的最后一件书法。写完之后，李叔同当即把毛笔折成了两截。翌晨，即出家为僧。就在姜丹书闻讯赶到李叔同的居室时，早已人去楼空，惟见残烛一枝，断笔两截，再有的就是端放在书桌上的《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落款为"大慈演音书"，这分明表示这是李叔同在俗时的绝笔，又是出家后的开篇了。这篇墓志铭后来被姜丹书请人模勒在石头上，制成了宽 67 公分，高 63 公分，厚 12 公分的石碑，碑中文字 549 个。有人评论其书"法乳魏碑，气度雄深雅健"，达到了"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

境界，可谓“直闯魏室”的上乘之作。

农历七月十三日这一天早晨，李叔同告别了任教六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式出家为僧。他出家的时候，夏丏尊已经回上虞的老家度假去了，当时并不知道。可暑假结束夏丏尊到虎跑寺去看他的时候，他已是身着海青、头皮光光的和尚了。李叔同仍是笑眯眯地说：

“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夏丏尊一听此言，急了：

“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直至此时，夏丏尊方才大悟，他自己的那些个不经意言行，在李叔同那里则全是认真的。要是夏丏尊当初不介绍李叔同看那篇断食文章；要是不挽留他在学校继续任教，要是不说那句“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的激愤之语……李叔同又会怎样呢？对此，李叔同在出家二三年后还对别人说：

“我的出家，大半由于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这天夏丏尊赴虎跑寺看望李叔同后，临别时就跟李叔同作约：“尽力护法，吃素一年。”而李叔同含笑回敬的是四个字：“阿弥陀佛”。

出　家

一

李叔同出家了，从此成了弘一法师。

对于他的出家，尽管丰子恺后来曾有过十分精彩的“三层楼喻”，但丰氏当时毕竟还是在校学生，又是处于艺术上大有长进的时刻，他多少会有依恋的感情。有时也到虎跑去聆听教益；夏丏尊呢？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自从他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谤毁佛法……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希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

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相比之下，马一浮就略有不同了。他显然是把弘一法师看成是与彭逊之完全不同的两类出家人。换句话说，马一浮对彭逊之的出家是不屑一顾的，而对弘一，他则是理解甚至是敬重的。所以，当他得知弘一在出家两个月后在杭州的灵隐寺受戒的消息时，亲自到灵隐寺去看望弘一，并赠送明代蕅益大师《灵峰毗尼事义集要》、清代见月律师《宝华传戒正范》各一册。弘一在后来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自叙中写道：“余于戊午七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由此可知，客观上马一浮又一次成了弘一研佛的“指路人”。

对于这样的一位“指路人”，弘一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的。这从他以及他的道友的一些书信文章中都能透露出若干信息。比如，范古农居士在《述怀》一文中写道：“1918 年，师出家后，九、十月间来嘉兴佛学会，居会约两月，杭州海潮寺，请法一禅师主七，马一浮先生招之往，遂行。”弘一回杭州后，也曾在给许幻园的信中提到：“在禾晤谈为慰。马一浮大师于是间讲《起信论》，演音亦侍末席，暂不他适。”

当然，也不是每一位朋友都理解、支持李叔同的。像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经亨颐就不能像夏丏尊那样跟着李叔同熏染上佛味。他在 1918 年 7 月 10 日的日

记里写道：

> 晴，九时赴校行终业式。反省此一年间，校务无所起色。细察学生心理，尚无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范训谕之功，因不易见，以空洞人格之尊，转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

其实经亨颐后来仍与弘一保持着交往关系，只是作为一校之长，他当时的言论是可以理解的。

二

弘一受戒以后，便没有再在杭州久居的机缘，他从此云游四方。1919 年夏，丰子恺在浙一师毕业。他与其他两位弘一当年的学生吴梦非、刘质平一起办起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丰子恺担任了美术课的教职。

丰子恺在上海专科师范任教，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到了 1921 年初，他就辞职了。个中原因，是他意识到以自己目前这些美术知识和绘画基础是难以长期胜任

教职的。随着上海研习西洋画的机构逐渐增多,人们对西洋画的认识也逐步深化。丰子恺常能在上海的日本书店里购得最新的美术杂志,从中窥见了不少最新美术理论和日本美术界的盛况,这才醒悟自己的艺术视野实在过于狭小。在这种心境中,他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只给学生作绘画标本的半生半熟的青皮橘子。于是,丰子恺下定决心,设法借了一笔款子,准备像李叔同当年一样,到日本去学一手过硬的本领回来。

1921 年早春的一天,丰子恺专程到杭州,向当时住在杭州闸口凤生寺的弘一法师告别。随后,他就东渡赴日。

丰子恺在日本东京一共住了十个月,终因资金不足而于 1921 年冬返国。丰子恺留日时间虽短,但他硬是以入宝山誓不空返的精神刻苦研习美术和音乐。按照丰子恺自己的说法:"这一去称为留学嫌太短,称为旅行嫌太长,成了三不像的东西。同时我的生活也是三不像的。我在这十个月内,前五个月是上午到洋画研究会中去习画,下午读日本文。后五个月废止了日本文,而每日下午到音乐研究会中去学提琴,晚上又去学英文。然而各科都常常请假,拿请假的时间来参观展览会,听音乐会,访图书馆,看 opera(歌剧—引者注),以及游玩名胜,钻旧书店,跑夜摊(Yomise)。因为这时候我已觉悟了各种学问的深广,我只有区区十个月的求学时间,决不济事。不如走马看花,呼吸一些东京艺术界的空气而回国吧。"(见丰

子恺《我的苦学经验》)丰子恺的这种“走马看花”、“呼吸一些东京艺术界的空气”的战术居然成功了。他在旧书店里接触到了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蕗谷虹儿的漫画，后经消化、创新，形成了他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子恺漫画”。

丰子恺于1921年冬回国后，仍在上海专科师范任美术课。不过，此时的他已站在了一个比较高的艺术起点之上，同时也并不以做一个艺术教师为终极目标，他是在为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而做着准备。

三

李叔同和丰子恺陆续离去后，夏丏尊仍以满腔热情置身于浙一师的教育事业。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浙一师接受新思想比较快，办学方式也比较开放，夏丏尊一时也成了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他与刚从日本归国来校任教的陈望道，以及刘大白、李次九共同支持新文化运动，革新语文教育，被称为学校的“四大金刚”，备受浙江教育当局的注意。

据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杭州高级中学)校史记载，“五四”运动后，学生施存统、汪寿华等先后成立了“全国书报贩卖部”与“书报贩卖团”。他们发表宣言，在校内

外推销新书刊；另一些学生则成立了第一、第二劳动团，宣传“劳动神圣”，自觉在学校里参加各种公益劳动。附属小学的教师试行“新村制”，新村中的各级干部皆由民主选举产生。浙一师的学生先后出版了铅印八开或十六开的《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浙江第一师范十日刊》、《浙江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会刊》、《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报刊。在这些报刊中，《浙江新潮》的影响最大。它由浙一师学生俞秀松、施存统、傅彬然、周伯棣等十四人与省一中学生阮毅成、查猛济及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夏衍）、汪馥泉、倪维雄等共二十多人组成的“浙江新潮社”负责编辑出版的。夏丏尊显然是这些刊物的支持者。他的同事姜丹书在《夏丏尊先生传略》一文中就说：“民国八年冬，学生自治会出刊物，每编竣，须送稿受审于先生。”

从当时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浙一师情况看，夏丏尊是会在这所学校里继续留任下去的。然而，1919 年秋冬的所谓“废孔”、“非孝”风波，使他决定辞职返乡。

以往，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举行“祭孔”活动。往年，浙江的祭孔，省长、教育厅长和省教育会会长兼浙一师校长经亨颐都是主要的陪祭人。这一年，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浙一师，尤其是浙江新潮社的学生首先表示不愿再参加祭孔活动。经亨颐支持学生，他不顾社会舆论的指责，借口到山西出席全国教育会议，毅然离开杭州。恰在这段时间，《浙江新潮》于十一月七日出版了第二期，刊

登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文章大意是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此文一发，联系到浙一师的蔑视祭孔，浙江当局以为洪水猛兽将至，当即命令教育厅查办，要求"于文到三日之内，即行切实查明核办具复"。当局知道，浙一师的学生之所以敢于"大逆不道"，这后面是有教师在作后盾的。为此，教育厅长向校长经亨颐提出了查办"四大金刚"的要求："据本厅周科长查明，贵校教员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等四人，所选国文讲义，全用白话。弃文言而不授，此乃与师范学校教授国文之要旨未尽符合。而此四人，又系不学无术之辈，所选教材，夹杂凑合，未免有思想中毒之弊，长此以往，势将使全校师生，堕入魔障。本厅责成贵校长即将此四人解职，并将学生施存统开除。"

教育厅长原以为经亨颐会执行他的命令，岂料，经亨颐答曰：

"我校教师所选文章都是从北京、上海等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选来的，如果使学生读后会产生'思想中毒''堕入魔障'之恶果，政府何以不干脆取缔京沪等地出版之刊物呢？至于教师不学无术，请教何以见得?！且学期中途，如何能随便解聘！再说，学生未教好，那是教育者未尽到职责，不能以开除了之，开除学生非为教育之本旨；学生即使言论失当，但没有犯罪，不能开除。何况，新思潮这样勃发，新出版物这样多，其感动的力量，实在大得了不得。要想法子禁止，实在是办不到的。如果空气能

排得尽,新思潮才能禁止。盼官厅明白这一点。”

经亨颐的一席话,说得教育厅长哑口无言。当局终于明白,必须首先向“领头羊”开刀。于是他们调转炮口,决定撤换校长。1920 年 2 月 17 日,新任校长金布即到任。他虽宣布原有教师一律续聘,可只有两人愿意受聘。接着学生亦群起挽留经校长,要求当局收回成命,当局竟调警察镇压,终于引发学潮。经过师生们的据理力争,再加上各地舆论的声援,教育厅被迫同意:一、立即撤退驻校军警;二、立即收回解散学校的命令;三、定期开学,原有教职员复职。

原来,学生们曾提出“留经目的不达一致牺牲”的口号。然而此时经亨颐已表示坚决不再留任的意愿。不久,经亨颐和夏丏尊等“四大金刚”即自动离校,告别了共事多年的浙一师。



中





清　凉

一

夏丏尊离开浙一师后，即应湖南第一师范之聘去了长沙。他在湖南一师的国文教学中，仍提倡发挥学生自己的思想，反对专替古人作注疏，把后一种教学方法讥为“留声机”。值得一提的是，夏丏尊在湖南一师结识了教务主任，曾在“五四”运动中蜚声全国的匡互生先生。他们的相识，为此后的合作共事奠定了友谊的基础。

再说经亨颐离开浙一师后，即返回故乡上虞。他热爱教育事业，决心在自己的家乡创办一所全国一流的中学。他把这个设想跟热心桑梓教育的乡贤陈春澜先生磋

商，结果获陈氏赞助，慨捐二十万元，以十万元建造校舍，置办设备；十万元购买上海闸北水电公司股票，以作学校固定资金。1919年12月2日，校董事会成立，1920年1月，经亨颐即被推为校长，负责筹备建校事宜。这新建的学校，就是有名的春晖中学。

春晖中学位于杭甬线的中心，校址就在距驿亭站二里许的白马湖畔。此处依山环水，田畴平旷，绿树成荫，四季风物宜人。按照目前春晖中学的校史文献，皆确定该校的创建是在1921年。但春晖中学的首届招生则是在1922年秋。同年12月12日，春晖中学举行开校典礼。经亨颐在典礼会上发言：

“近年来奔走南北，有一种感触，觉得官立国立的学校，现在实不能算好，但要怎样才会办好呢？这条件回答是很难的。我第一希望社会能同情于春晖，第二希望校董能完全负责，第三希望有安心的教员，第四希望有满意的学生。这四种是学校办好的条件。官立国立的学校或不能如此希望，春晖却是可如此希望的。”

经亨颐显然是因为浙一师的风波，对教育当局感到失望后才发心在白马湖这个“世外桃源”办私立学校的。为了不让外部势力插手学校事务，他甚至不向当时的军阀政府立案。为了办好学校，经亨颐当然不会忘记请回他的同乡、老同事、老朋友夏丏尊来帮助办学。而对于夏丏尊来讲，上虞既是自己的故乡，白马湖又是他理想中的办学环境。于是，夏丏尊遂于1921年赶回白马湖，肩负

起春晖中学许多的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他对春晖中学的感受，几乎跟经亨颐一样。夏丏尊在《春晖的使命》一文中就说过："你是一个私立的，不比官立的凡事多窒碍。当现在首都及别省官立学校穷得关门，本省官立中等学校有的为了竞争位置、风潮叠起、丑秽得不可向迩的时候，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不是你所应该做的事吗？"

夏丏尊在文化界是个德高望众的人物，果然，他先后招集了全国一流的人才云集白马湖。他们当中，有刘薰宇、章育文、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刘叔琴等等，而丰子恺则是他重点聘请的一个。

二

1922年初，丰子恺辞去了上海专科师范的教职，欣然前往白马湖。当时，夏丏尊在学校附近的山脚下有几间瓦房，题室名为"平屋"，而丰子恺的寓屋也就筑在"平屋"的边上，因墙边种有一棵小杨柳树，故命名为"小杨柳屋"。此时，这一对往日的师生，如今又成了志同道合的同事。丰子恺确也喜欢这里的生活。他写了一篇《山水间的生活》："我的家庭在山水间已生活了一月多了。我对于山水间的生活，觉得有意义……我觉得上海虽热闹，

实在寂寞，山中虽冷静，实在热闹，不觉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静的热闹。”

什么是这“清静的热闹”呢？这显然是因为这里有一群志趣相投的同事，和更多的少年学子。丰子恺在春晖中学担任的是音乐、美术课程，有时也兼任英语课。他的教学，深入浅出，教学方式也颇具艺术性。他的学生斯而中在《忆二十年代的春晖中学》中介绍说：“他教音乐课有一个特点就是先教唱，然后他盖上钢琴跑到教室大楼外面去听我们在教室内合唱，如果有什么地方唱得不齐，不合拍，或音色不好，他就回到教室里来逐一纠正，要我们重唱，总要唱到完全合乎要求才止。”再比如上美术课，学生徐伯鋆在“五十六年前几位授业老师的片断回忆”中说：“他教导我们说：‘不论画什么都要抓住其特点，比如：你们想画一张我的头像，就抓住我的前额宽，下颚尖这个特点，像个狗头似的，边说着随手就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倒置的三角形，添上几笔之后，黑板上就出现了一个丰子恺的素描。随即又把眼角嘴边修改几笔，然后对大家说：‘你们看这是因为你们画得好，丰子恺笑了。’说完重新改了几笔说：‘这是因为你们画得不好，丰子恺哭了！’”

在生动活泼的教课之余，丰子恺跟夏丏尊等同事的友好相处也是他感到“清静的热闹”的原因。朱光潜对此描述得十分生动：“同事夏丏尊朱佩弦刘薰宇诸人和我都和子恺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我们吃饭和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闹，各人到量尽为止，止则谈的

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

还有什么更比这样的情境更为诱人的呢？他们在教育事业中领取乐趣，在友情、文艺中领取乐趣。这岂是都市喧闹的环境可以媲美的？春晖中学的校歌是唐代诗人孟郊的一首《游子吟》，作曲者即是丰子恺。孟郊的诗是这样的：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每当学生唱起这首校歌时，莫不为歌词中的母子之爱所感动，莫不为老师们的循循善诱所激励。

三

正是在春晖中学，丰子恺迈出了作为漫画家的第一步。而夏丏尊则是丰子恺漫画的热情鼓励者和宣传者。

据丰子恺自己回忆，他在白马湖作漫画，缘于春晖中学的一次校务会议。在会议上，他对“那垂头拱手而伏在

议席上同事的倦怠姿态"印象颇深，回家后就用毛笔把校务会议上的印象画了出来，并贴在门后独自欣赏。此画引起了丰子恺的极大兴味，此后他就经常把平日信口低吟的古诗词句译作小画，又把对日常生活中有感的物事一一描绘出来。每次画完后，他都可以"得到和产母产子后所感到的同样的欢喜。"他开始勤奋地作画，"于是包皮纸，旧讲义纸，香烟簏的反面，都成了我的 canvas，有毛笔的地方，就都是我的 Studio 了。"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等都来欣赏他的画作，并给予热情的鼓励。尤其是夏丏尊，他对丰子恺的艺术创造更是积极支持。夏丏尊后来回忆道："记得子恺的画这类画，实由于我的怂恿……子恺年少于我，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羡子恺是幸福者！"

夏丏尊是从内心里真喜欢丰子恺的漫画。1923 年，他根据日译本，意大利亚米契斯著《爱的教育》一书译成中文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由于喜欢丰子恺的画，他就请丰子恺为此书做插图。丰子恺欣然应命，他不仅画了十幅插图，而且还精心绘制了封面。夏译《爱的教育》于 1926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此书后来风行中国二十余年，再版三十多次。

以往，人们皆以为丰子恺首次公开发表漫画是在 1924 年出版的《我们的七月》上。其实，早在 1922 年，丰子恺就在春晖中学的校刊《春晖》上面发表作品了。而《春晖》的创办与主持，则与夏丏尊直接有关。

1921年，夏丏尊来到白马湖后，就已感到创办《春晖》的重要性。鉴于“近年以来，凡是中等以上的学校，差不多都有出版物”，又由于白马湖“僻处山乡，所能与大家通气者，几乎大半要靠出刊物了。”于是，在夏丏尊、赵友三等的共同努力下，《春晖》于1922年10月31日应运而生。《春晖》是一份半月刊，发行范围以省内外中等以上学校及省内各县高小为主，也有个人定户，每期发行一千一百份。夏丏尊自任出版主任，赵友三主管发行，而丰子恺来校任教后则负责插图工作。1923年10月起，《春晖》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进一步的改进，设有“由仰山楼”、“曲院文艺”、“他山之石”、“五夜讲话”、“白马湖书录”、“课余”、“半月来的本校”等专栏。《春晖》的作者十分整齐，像经亨颐、夏丏尊、丰子恺、俞平伯、朱光潜、朱自清等，皆一代名士风流。丰子恺在这份刊物上既写文，也做画。正如夏丏尊所设想的一样，丰子恺的艺术，得益于《春晖》，开始走向全社会了。

四

再说弘一大师于1925年上半年在温州闭关，夏天则云游至宁波七塔寺。此时，夏丏尊恰好也在宁波，他得知消息后，就迫不急待地前去拜望。夏丏尊在云水堂看到

有四五十个游方僧住在里头，似乎皆睡统铺，而弘一就住在下层。老友重逢，他俩便坐在廊下的板凳上交谈起来：

“到宁波三日了，前两日是住在小旅馆里的。”

“那旅馆不十分清爽吧?”

“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

他俩又谈了一会儿，夏丏尊就邀请弘一到白马湖去住几天。由于夏丏尊的坚请，弘一也就答应了。

到了白马湖，夏丏尊把弘一安排在春社住下。只见弘一亲自把铺盖打开——这是十分简单，且用破席子裹着的铺盖。弘一将破席子珍重地铺在床上，又摊开了被子，把衣服卷了几件就充作了枕头。然后，他取出一块又黑又破的毛巾从容地走到湖边去洗脸。

夏丏尊实在不忍心了，就说：

“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

“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差不多。”

弘一一边说，一边就把毛巾展开来让夏丏尊看，好像是表明它并不十分破旧似的。

弘一到白马湖时，已过了中午。由于他严格按照戒律行事，过午即不进食。第二天，夏丏尊在没有到中午之前就早早地送去了饭菜。弘一吃饭时，夏丏尊就在他身边陪着。这菜不过是些萝卜白菜之类的家常素菜，可弘一吃起来却是那样的喜悦。尤其是当他用筷子郑重地夹起一块萝卜时的那种惜福的神情，夏丏尊见了几乎感动

地要流下泪水来。

第三天，有一位朋友送来了四样素菜，其中一碗菜非常咸。夏丏尊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这太咸了！”

岂知弘一说道：

“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此后，弘一表示不必再送饭来，说自己可以走着去吃。

“那么逢天雨仍替你送去吧。”

“不要紧！天雨，我有木屐哩！”他把“木屐”二字说得很郑重，俨然是一种了不得的法宝一般。他又补充曰：“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在弘一看来，这世间竟没有一件不好的东西，小旅馆是好的——尽管有几只臭虫，统铺是好的，破席子、破毛巾是好的，咸苦的素菜是好的，跑路也是好的……夏丏尊算是彻底折服了：

“这是何等风光啊！宗教上的话且不说，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说他是享乐。我常见他吃萝卜白菜时那种喜悦的光景，我想：萝卜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到的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

弘一这回到白马湖，遗憾的是没有见到丰子恺。从

时间上推测，此时丰子恺与夏丏尊均已不在春晖中学任教，他俩已先后到上海参予立达中学的教务。

五

丰子恺和夏丏尊之所以会离开桃源世界一般的白马湖，这与1924年秋后的一场风波有关。这场风波，从本质上讲，是开明进步的教师与学校保守专制势力的斗争；而其具体起因，则是由一位叫黄源的学生引起的。

这位黄源，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1924年暑期，他从南京的一所中学转到白马湖的春晖就读。黄源在春晖期间，校长经亨颐并不在学校(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国共合作，经氏便留在广州活动)，学校的行政实权落在保守派的手中。这年初冬，校内原已有的不协调的暗流终于演化成大浪了。

一天清晨上早操的时候，黄源头戴一顶连他自己也忘了是从哪里买来的黑色毡帽。这一举动，在同学中并未引起好奇，可体育教师看到后，即怒斥，并勒令将毡帽除去。于是，师生间便有了如下一段争执：

“戴着并不妨碍上早操。”黄源抗议道。

“我说不准戴就不准戴。”体育教师口气更加坚决。

“校章上并没有规定学生不准戴毡帽上早操。”

“不管校章有没有规定，在我的早操课上，就不准戴毡帽。”

……

这次争执的结果，是学校当局要对黄源做记过或开除处分。在这种情况下，训育主任匡互生站出来替学生说话，以为学生行为上的不慎，应该以教育为主，不能简单地用记过开除的行政压制手段。然而，学校行政决意要处分黄源，匡互生愤而辞职。此后，校园里的空气顿然紧张起来，学生罢课，教师辞职，白马湖已非昔日的白马湖，春晖也非昔日的春晖。夏丏尊、丰子恺等也是最早离开春晖的一批教师，他们先后来到上海与匡互生汇合，在虹口老靶子路租用民房，于 1925 年春办起了“立达中学”（后改名“立达学园”），后因房租太贵又迁至小西门黄家阙路。同年夏，学校在江湾觅得一块荒地新建校舍，校舍建成后即改名为“立达学园”。丰子恺在谈到“立达”二字时，解释曰：“‘立达’两字，就是取义《论语》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意思”。

立达学园成立后不久，还成立了“立达学会”。在匡互生的授意之下，朱光潜执笔撰写了一份“立达宣言”，公开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而之所以称“学园”，是表示他们的“学园”不同于一般的学校。它既能令人联想到古希腊“柏拉图学园”的自由讨论的风气，又包涵把青年当作幼苗来培育的更为切实的积极意义。由此可见，匡互生等办立达学园，目的是继续他们在白马湖的事业，是想在自

己的手中实现白马湖的理想。这种承前启后的联系，从学园的学生、教师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所新创设的学园里，有一大批从白马湖慕名而来的学生；而教师名单中，其主将仍是白马湖春晖中学的台柱：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刘薰宇……当然还有匡互生本人。从此，上海的文化教育界就出现了这样的一批“开明”派。

立 达

一

立达学园跟当初白马湖一样，汇集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匡互生、夏丏尊、丰子恺等往日白马湖同仁外，先后在校任教的还有夏衍、陈望道、陶元庆、黄涵秋、丁衍庸、许杰、周为群、陶载良等，而立达学会成立后，除学园同仁外，像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刘大白、周予同、陈之佛等亦陆续加入。立达学会创办了一份很著名的刊物《一般》，由夏丏尊主持，而丰子恺则几乎包下了全部美术装帧设计工作。可想而知，在立达学园，在江湾那简陋的校舍里，夏丰二人又有了朝

夕相处的日子。如果说，丰子恺是在白马湖迈出了作为漫画家的第一步，那么在立达，他的画名开始在社会上有了影响，且作为独具特色的著名漫画家立足于现代中国艺坛。

其时，正在主编《文学周报》的郑振铎从朱自清那里了解到丰子恺做画的情况，这便向丰氏索画，并陆续发表在《文学周报》上，郑振铎还给这些画统一冠以“漫画”的题头，从此，所谓“子恺漫画”风靡全中国。1925 年 12 月，丰子恺的第一本漫画集《子恺漫画》由《文学周报》社出版，为此画集作序撰跋的都是他的朋友，他们是：郑振铎、夏丏尊、丁衍庸、朱自清、方光焘、刘薰宇、俞平伯。其中夏丏尊的序言，除了谈及了他在宁波、白马湖与弘一大师相聚的事外，论及丰子恺的漫画。他是这么写的：

“……记得子恺画这类画，实由于我的怂恿。在这三年中，子恺着实画了不少，集中所收的不过数十分之一。其中含有两种性质，一是写古诗词名句的，一是写日常生活的断片的。古诗词名句原是古人观照的结果，子恺不过再来用画表出一次，至于写日常生活断片的部分，全是子恺自己观照的表现。前者是翻译，后者是创作了。画的好歹且不说，子恺年少于我，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羡子恺是幸福者！”

丰子恺漫画的成功无疑跟夏丏尊当初的“怂恿”有关，而在文学创作上，丰子恺的名字也与夏丏尊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诚如前述，丰子恺对文学感兴趣，得益于夏

丏尊当年在杭州第一师范时的教诲，而经过白马湖时代，中国文坛上遂无形中形成“白马湖作家群”。白马湖作家群的主将，当首推夏丏尊、丰子恺和朱自清，而此三者相较，朱自清的文路与夏、丰二人又略有区别，前者质朴中显清隽，后者质朴中见醇厚。所以，研究者们往往乐意把夏丏尊与丰子恺的散文作品置于同一个视角加以研究，以为他俩的散文同出一炉，一个偏重抒情(夏丏尊)，一个侧重说理(丰子恺)。到了“立达”的时代，他俩正好得以把白马湖的风采在《一般》上发扬光大。换一句话说，白马湖畔播种、培育出的文学幼苗在“立达学园”里开花结果了。

二

且说弘一入山以后，却也一直是挂念着夏丏尊和丰子恺。他得知夏丏尊发愿素食一年，写信曰：“居士戒除荤酒，至善至善。”当他知道夏丏尊回归白马湖故里后，又写信表示：“……知仁归卧湖上，脱屣尘劳，甚善甚善。”如今他知道夏、丰二位又在立达学园共事，便有意要跟这二位友生见上一面了。1926 年春，弘一自温州至杭州，居西湖边上的招贤寺从事《华严疏钞》的厘订、修补与校对。他给丰子恺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近从温州来

杭,承招贤老人殷勤相留,年内或不复他适。”

丰子恺与夏丏尊不同,夏于不久前见过弘一大师,而他自六年以前于赴日本的前夜在杭州跟大师告别后就没有再见过弘一的面。所以,当丰子恺见到老师的来信后,心情非常激动,几天后,他就跟夏丏尊一起乘火车赶往杭州。丰子恺在《法味》一文中如此描述他俩在火车上的情景:

> ……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几乎要行六小时。我在车中,一味回想着李叔同先生——就是现在的弘一师——教我绘画音乐那时候的事。对座的 S 先生(即夏丏尊——引者注)从他每次出门必提着的那只小篮中抽出一本小说来翻,又常常向窗外看望。车窗中最惹目的是接续奔来的深绿的桑林。

车到杭州,已是上灯时分,他俩在西湖边上的清华旅馆先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往招贤寺。刚步入正殿,招贤寺主弘伞法师就迎出来了:

“弘一师日间闭门念佛,只有送饭的人出入,下午五时才见客。”

这位弘伞法师,就是当年丰子恺在玉泉见到过的那位曾当过军官的程中和。如今他已与弘一成了师兄弟。夏丏尊和丰子恺在殿后窗下的椅子上跟弘伞法师谈了一席话后即告辞。傍晚时分,他们终于见到了弘一大师。

返沪的车上，丰子恺又如此描述了自己的心情：

……车中寂寥得很，想起十年来的心境，犹如常在驱一群无拘束的羊，才把东边的拉拢，西边的又跑开去。拉东牵西，瞻前顾后，困顿得极。不但不由自己拣一条路而前进，连体认自己的状况的余暇也没有。这次来杭，我在弘一师的明镜里约略照见了十年来的自己的影子了。我觉得这次好像是连续不断的乱梦中一个欠伸，使我得暂离梦境；拭目一想，又好像是浮生路上的一个车站，使我得到数分钟的静观。

从这些记述描绘之中，人们可见丰子恺，包括夏丏尊的心目中的弘一是何等的气象！他们一个视其为恩师，一个视其为畏友，弘一的人格，宛若明镜一般，使夏、丰二位时常对照自省。人虽走在浮生的路上，心则超度在尘俗之外。

三

丰子恺从杭州回沪后没几天，又收到弘一大师的来信，信上说："音出月拟赴江西庐山金光明会参与道场，愿手写经文三百叶分送各施主。经文须用朱书，旧有朱色不敷应用，愿仁者集道侣数人，合赠英国制水彩颜料

Vermilin[朱红]数瓶。”信末又云:“欲数人合赠者,俾多人得布施之福德也。”

丰子恺收到信后,就联合夏丏尊等七八人合买了八瓶 Windsor Newten[温泽·牛顿]制的水彩颜料,外加十张夹宣纸立即寄去。在回信中,丰子恺说:“师赴庐山,必道经上海,请预示动身日期,以便赴站相候。”而弘一则回信曰:“此次过上海,恐不逗留,秋季归来时再图叙晤。”

就在丰子恺盼望着秋风早日吹来的时候,不料,他与弘一大师见面的时间居然意外的提前了。这是暑假中的一天,丰子恺正与刚从日本回国到立达学园任教而暂寓家中的黄涵秋在翻阅着弘一在俗时的照片。忽然,一个住在隔壁的学生匆匆地跑上楼来报告:“门外有两个和尚在寻问丰先生,其中一个样子好像是照片上见过的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下楼一看,此二僧正是弘一、弘伞二法师。原来,他们在前天就已到了上海,住在大南门的灵山寺,需待江西来信,方可决定赴庐山的日期。

弘一对丰子恺就不见外了,刚在丰家坐下,他便起身走近丰子恺,低声地说:

“子恺,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吃午饭,不必多备菜,早一点好了。”

弘一是过午不食的。这天他提出要在丰家吃午饭,即令丰子恺想起一件事来。有一次,杭州有一个人在一家素食馆办盛馔请弘一午餐,可待客人到齐,已是一点钟

了，那次，弘一只吃了一点水果，使主人颇为惭愧。不过这天他们吃过午饭，时间还未到十二点。为此丰子恺颇感安慰，弘一在饭后亦颇有谈话的兴味。他们谈到了艺术，也谈到了护生。在谈到弘一当年在上海城南草堂寄居时，弘一居然兴奋起来，他对丰子恺说：

“这是很好的小说题材！我没有空来记录，你们可采作材料呢。”

弘一所说的小说题材是什么呢？丰子恺对此做了记录，全文如下：

> 他家在天津，他父亲是有点资产的。他自己说有许多母亲，他父亲生他时，年纪已经六十八岁。五岁上父亲就死了。家主新故，门户又复杂，家庭中大概不安。故他关于母亲，曾一皱眉，摇着头说，“我的母亲——生母很苦！”他非常爱慕他母亲。二十岁时陪了母亲南迁上海，住在大南门金洞桥(?)畔一所许宅的房子——即所谓城南草堂，肄业于南洋公学，读书奉母。他母亲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就死在这屋里。他自己说：“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这屋的所有主许幻园是他的义兄，他与许氏两家共居住在这屋里，朝夕相过从。这时候他很享受了些天伦之乐与俊游之趣。他讲起他母亲死的情形，似乎现在还有余哀。他说：“我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还

只四十□岁！”大家庭里的一个庶出(?)的儿子，五岁上就没有父亲，现在生母又死了，丧母后的他，自然像游丝飞絮，飘荡无根，于家庭故乡，还有什么牵挂呢？他就到日本去。

……

这段有小说色彩的记录，丰子恺录存在他的《法味》一文里。这里之所以抄录如此一大段，是因为在这段文字中，很有必要就弘一生母去世的时间问题作一番探讨。

在各种弘一大师的年谱或传记里，有关弘一生母病故的年代皆为1905年。这种表述的依据，应该就是丰子恺《法味》一文中的这段文字。弘一生于1880年，二十六岁时丧母，推算起来正是1905年。而然，最近发现了一幅弘一自书的小册页，上方用朱笔竖式恭写“庄敬”二字，下面用墨笔竖写“戊辰二月五日母亡二十八周年”，另起行亦用墨笔题写：“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果这幅册页是真迹，那么可知：戊辰年是1928年，这年是弘一生母亡故二十八周年，那说明其去逝之年应该是1900年了。这就给人们出了一个难题。丰子恺《法味》一文写于1926年，自署八月四日记于石门。丰子恺视弘一为恩师，按理在他的文章中不至于把无把握的时间概念表述出来。况且，在这段文字中，凡丰子恺没有听清楚的，皆标出“?”或“□”，表示无把握，由此可知，丰子恺写这段文字的态度是很认真严谨的。另

一方面，弘一与他自己的生母感情很好，按常理，他也不可能在这幅小册页上署错时间。于是，这个时间问题就显得更加难以确认了。人们希望能觅得第三条旁证材料，在此之前，姑且存疑。

这天弘一在丰子恺家一直谈到下午四点钟。返回灵山寺前，丰子恺和黄涵秋陪二位法师就近参观了立达学园。第二天，弘一又带丰、黄二位等到当年的城南草堂走了一走。当晚，他即与弘伞法师乘船去了庐山。

缘缘

一

1926年秋后，弘一法师终于从江西回来了。返杭州之前，他独自在丰子恺江湾永义里的家里住了下来。

丰子恺一向喜欢替自己的居室取名。比如1922至1924年间他在白马湖时为自己的居宅取名为“小杨柳屋”；后来，他在抗战期间在内地又有所谓的“星汉楼”、“沙坪小屋”；1949年后，他在上海又有“日月楼”等等。丰子恺取室名，一般是由寓所的环境、特点决定的，而这回不同，他趁了弘一法师住在自己家的机会，特意请法师为之命名。

缘份就是这样来了。这回,弘一为丰子恺指点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办法:法师让他在许多小纸片上分别写上自己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然后把每张纸片都揉成小纸团撒在释迦牟尼的供桌上,这就请丰子恺本人来抓阄。结果,丰子恺连续两次都抓到了同样的一个字:"缘",于是就取其室名叫"缘缘堂"。丰子恺很满意,立即请弘一法师写了一幅横额,装裱后挂在寓所内。当然,丰子恺在江湾永义里的房子是十分简陋的,既无"堂",亦无"厅",依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只是"缘缘堂""灵"的存在,真正给它赋形,那还是1933年春后的事情,那是由丰子恺自行设计,自费在家乡石门湾建的寓所。

有关"缘缘堂"命名的时间,以往学界颇有争议。丰华瞻《丰子恺年谱》(载《丰子恺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初版)中的1926年条目曰:"八月,弘一法师云游到上海,下榻江湾永义里丰宅。丰氏请弘一法师为其寓所命名……于是定名为'缘缘堂'"。

事实上,1926年8月间弘一赴江西经上海时并未在丰家住下,这可从丰子恺《法味》一文中看出。那么是否存在弘一未宿丰家而为其命名的可能呢?回答亦为否定。因为丰子恺自己在《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中说过:"中华民国十五年,我同弘一法师住在江湾永义里的租房子里,有一天我在小方纸上写许多我所喜欢而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可见,这一定是弘一住在丰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断定这是弘一秋后返杭州经上海时

的事。也有人以为"缘缘堂"命名的时间干脆就不是1926年，而是1927年。如殷琦在《香港文学》1985年9月号上的《关于丰子恺皈依佛教及缘缘堂命名的时间》一文就持此说。殷琦的一条重要理由是丰子恺写于1929年的《缘》一文中有这样的开头："这是前年秋日的事：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不知因了什么缘，他愿意到我的江湾的寓中来小住了……"于是殷琦以为："根据不知因了什么缘的句子所表达的口气看，这是弘一法师第一次下榻丰子恺家，不像前一年(即1926年)已经住过的样子。"为此，殷琦认为丰子恺在《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中所谓"民国十五年"可能是丰子恺记忆上的错误。

笔者以为，"缘缘堂"的命名时间还是应该定在1926年秋后。原因有二，其一，殷琦引用丰子恺《缘》的开头文字固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这段引语的省略号后面的另一句话恰恰又给了人们另一种信号。我们还是来完整地引用这段话吧：

> 这是前年秋日的事：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不知因了什么缘，他愿意到我的江湾的寓中来小住了。我在北火车站遇见他，从他手中接取了拐杖和扁担，陪他上车，来到江湾的缘缘堂，请他住在前楼，我自己和孩子住在楼下。

丰子恺在此提到了弘一来到江湾的缘缘堂，那么，我

们是否可以认为此时已有了“缘缘堂”这个名称了呢?

其二,根据不知因了什么缘的句式是可以给人弘一首次来丰宅小住的印象的,但并不能就得出此前一定没有来住过的结论。我们与其说猜想这次是弘一首次来丰家住,还不如更相信丰子恺所谓“民国十五年”给住宅命名的陈述。

二

1927年的秋天,弘一大师又一次来到上海,这回,他又住到了丰子恺的家里,而且一住就是一个月。在这样一个对丰子恺来说是极为难得而又难忘的一个月中,弘一与学生丰子恺朝夕相处,其情形,犹如丰子恺在《缘》一文中所述:

> 每天晚快天色将暮的时候我规定到楼上来同他谈话。他是过午不食的,我的夜饭吃得很迟。我们谈话的时间,正是别人的晚餐的时候。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阳的光一同睡着,一向不用电灯。所以我同他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口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衬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时候,我方才告辞,他也

就歇息。

由于丰子恺原本就是弘一的得意门生，他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早已受到弘一的人格熏染。如今他俩又晨夕一堂，弘一的言行、思想与品格以至信仰便又一次影响了他。终于，丰子恺发愿要拜弘一为师皈依佛教了。皈依的地点就在江湾缘缘堂的钢琴边，时间是1927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丰子恺二十九周岁的这一天。弘一为其取法名“婴行”。这个法名，颇值得人们玩味。因为弘一当年在杭州虎跑实行断食后，就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婴”。而就在这一年2月，丰子恺出版了他自己的第二本画集《子恺画集》，集中大多描绘儿童生活。此画集在10月份再版的时候，马一浮写来了题词，全文如下：

吾友月臂大师（即弘一——引者注）为予言丰君子恺之为人，心甚奇之，意老氏所谓专气致柔复归于婴儿。

子恺之于艺，岂其有得于此邪？若佛五行中有婴儿行，其旨深远，又非老氏所几。然艺之独绝者往往超出情识之表，乃与婴儿为近。婴儿任天而动，亦以妄想，缘气尚浅，未与世俗接耳。今观子恺之贵婴儿，其言奇恣直，似不思议境界。盖子恺目中之婴儿，乃真具大人相，而世所名大人，嵬琐忿矜，乃真失其本心者也。赵州有孩子六识话，予谓子恺之画宜名孩子五阴，试以举似。

月臂大师当以予为知言。

丁卯九月书与丰子恺教授。

蠲叟

马一浮此题词写于丁卯九月，正是丰子恺皈依佛教的这一个月。联系到丰子恺皈依后“婴行”的法名，马一浮的序当有特别的意义。

丰子恺拜弘一为师皈依佛门，这是弘一在俗时朋友、学生中唯一的一位。李叔同出家后，凡遇过去的友人、学生，大都向他们灌输佛家思想。而今丰子恺如此虔诚的皈依佛门，必然令弘一万分欣喜。加上这一年丰子恺与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由开明书店出版，其中选入弘一创作或填词的歌曲十三首。这些都使他俩的因缘不断加深。丰子恺在歌集的序言中写道：

“我们把平时所讽咏而憧憬的歌曲纂集起来，成这本册子，这册子里所集的曲，大半是西洋通俗名曲；而歌词，主要是由李叔同先生（出家杭州大慈山的弘一法师）所填写的。对于曲，我们要求旋律的正大与美丽；对于歌词，要求诗词与音乐的配合。西洋名曲所以传诵于全世界者，因为它们都有优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文才与乐才，据我所知，中国能作曲又填词的音乐家，也只有李先生一人。”

丰子恺推崇艺术家的李叔同，而作为高僧的弘一大师，他也是如此地衷心爱戴。

三

在这两三年中，由于丰子恺与弘一大师的频繁往还，别人都将其视作了弘一的影子。许多人想跟弘一见面，大凡也都通过丰子恺的安排。叶圣陶在《两法师》一文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 前此一星期，饭后去上工，劈面来三辆人力车。最先是个和尚，我并不措意。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地向我点头。我也点头，心里便闪电般想起“后面一定是他”。人力车夫跑得很快，第三辆车一霎往后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颌下有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这样想着，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的后影。
>
> 第二天，便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会见。

这次在功德林会见，丰子恺、夏丏尊约来的周予同、李石岑、叶圣陶等，他们早就想见上弘一大师一面，这天算是满足了这个愿望，并留下难忘的印象。诚如叶圣陶在《两法师》中表白的那样：“弘一法师就要回到江湾子恺先生的家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

他告别。这位带有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将使我永远怀念了。”

护　生

一

1927年秋天弘一大师住在丰子恺家里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实在非同寻常，除了前述的种种因缘之外，他俩还蕴酿了一个弘扬佛法、鼓吹仁爱、劝人从善的大计划，这就是编绘《护生画集》。

一次大战以后，欧洲曾出现过声势不小的提倡素食主义的呼声，其热闹程度虽无法跟当今的绿色和平组织媲美，但各种保护生灵的团体也活动频繁。文学界的萧伯纳也是一位极具护生思想的人。有一次一位朋友把话问到了极端："假如我不得已而必须吃动物，怎么办呢？"

萧伯纳答道："那么，你杀得快，不要使动物多受苦痛。"当时中国的情况其实也一样。声称"为东亚提倡保护动物，宣传素食主义专利"的《护生报》居然由蒋中正题报头；中国保护动物会的《护生警语》的第一条便是"保护动物，是二十世纪人类祈求和平应有的认识和觉悟"。

《护生画集》是否就是在如此素食主义大潮中孕育而生的，弘一和丰子恺均未正面提及，但二者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则是肯定的。比如，弘一在为《护生画集》中"农夫与乳母"一图配诗即曰："西方之学者，倡人道主义。不啗老牛肉，淡泊乐蔬食。卓哉此美风，可以昭百世。"所以，就《护生画集》本身而论，其宗旨亦与东西方一时兴起的素食护生思想基本一致，而作为1927年刚刚拜弘一为师皈依佛门的丰子恺，他更是把绘作护生画当成一项事业去实践的。

《护生画集》第一册出版于1929年2月（开明书店），丰子恺做画，弘一配诗文。抗战期间，丰子恺在逃难之中又绘成《续护生画集》六十幅，并寄往泉州，请弘一配文。弘一遂写信给丰氏曰："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做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做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做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做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

《护生画集》第一集的出版，是由夏丏尊介绍给章锡琛创设的美成印刷所印刷制版的。其序言则又是马一浮撰写的。马一浮的序，恰到好处的表达了护生画的宗旨：

华严家言:“心如工画师,能出一切象。”此谓心犹画也。古佛偈云:‘身纵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相。’此谓生亦画也。是故心生法生,文采彰矣;各正性命,变化见矣。智者观世间如观画。然心有通蔽,画有胜劣。忧喜仁暴,唯其所取。今天下交言艺术,思进乎美善,而杀机方炽,人怀怨害。何其与美善远也!月臂大师,与丰君子恺,李君圆净,并深解艺术,知画是心。因有《护生画集》之制,子恺制画,圆净撰集,而月臂与之书。三人者,盖夙同誓愿,假善巧以寄其恻怛;将凭兹慈力,消彼犷心。可谓缘起无碍,以画说法者矣。圣人无己,靡所不己;情与无情共一体,况同类之生乎?夫依正果报,悉由心作,其犹埏埴为器,和采在人。故品物流形,莫非生也;爱恶相攻,莫非惑也;蠕动飞沉,莫非己也;山川草木,莫非身也。以言艺术之源,孰大于此!故知生,则知画矣;知画则知生矣;知护心则知护生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水草之念空,斯人羊之报泯。然后雀巢可俯而窥,沤鸟可狎而至,兵无所容其刃,兕儿无所投其角,何复有递相吞啖之患乎?月臂书来,属缀一言,遂不辞葛藤而为之识。戊辰七月蠲叟书。

《护生画集》出版后,立即引起佛教界内外巨大反响,诸如大中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局、佛学书局等相继印行(《护生画集》鼓励翻印流传),一时就有十五种版本之多,还有英译、日译本外销,气势可谓大矣。

二

弘一大师的护生故事实在不少。在《护生画集》第一集里有《老鸭造象》一画，弘一在题诗后有一段说明文字十分精彩："戊辰十一月，余乘番舶。见有老鸭囚于樊，将赍送他乡以饷病者，谓食其肉可起沉疴。余悯鸭老而将受戮，乃乞舶主为之哀请，以三金赎老鸭归。属子恺图其形，补入画集，聊志遗念。"

夏丏尊是《护生画集》第二集的序作者。他在这篇序文中又为人们披露了一件感人至深的故事。夏丏尊写道："犹忆十年前和尚偶遇上海，向访间购请仿宋活字印经典。病其字体参差。行列不匀，因发愿特写字模一通，制成大小活字，以印佛籍。还山依字典部首逐一书写，聚精会神，日做数十字，偏正肥瘦大小稍不当意，即易之。期月后书至刀部，忽中止。问其故，则曰：刀部之字，多有杀伤意：不忍下笔耳。其悲悯恻隐，有如此者。"

时至此时，弘一出家已有十年余，他的友生感念其四处云游，遂合议醵资在白马湖畔为其筑一常住之所。1928年底，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经亨颐等七人联合发出《为弘一法师筑居募款启》，写道：

弘一法师，以世家门弟，绝世才华，发心出家，已十余年。披剃以来，刻意苦修，不就安养；云水行脚，迄无定居；卓志净行，缁素叹仰。同仁等与师素有师友之雅，常以俗眼，愍其辛劳。屡思共集资材，筑室迎养，终以未得师之允诺而止。师今年五十矣，近以因缘，乐应前请。爰拟遵循师意，就浙江上虞白马湖觅地数弓，结庐三椽，为师栖息净修之所，并供养其终生。事关福缘，法应广施。裘赖腋集，端资众擎。世不乏善男信女，及与师有缘之人，如蒙喜舍净财，共成斯善，功德无量。

1929年初夏，此宅在白马湖畔竣工。地处小山东麓，平房三间，缘数十级石阶而上。弘一遂以李义山"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句意，题名为"晚晴山房"。同年9月，弘一自温州来此小住。10月间，弘一因绍兴徐仲荪居士倡议白马湖放生还写了一篇《白马湖放生记》。如果说，前述弘一哀其老鸭命运、不忍书写刀部诸事听起来颇有悲怆之感的话，那么这次放生，弘一的兴致极高，情绪亦颇佳。此文是这样写的：

白马湖在越东驿亭乡，旧名渔浦。放生之事，前未闻也。己巳秋晚，徐居士仲荪过谈，欲买鱼介放生马湖，余为赞喜，并乞刘居士质平助之。放生既讫，质平记其梗概，余书写二纸，一赠仲荪，一与质平，以示来览焉。

时分：十八年九月廿三日五更，自驿亭步行十数里到鱼市，东方天明。

舍资者：徐仲荪；佐助者：刘质平；荷者：徐全茂。以上三人偕往。

鱼市：在百官镇；品类：虾鱼等，值资八元七毫八分。

放生所：白马湖，盛鱼具：向百官面肆假用，肆主始不许，因告为放生故彼欣然。

放生同行者：释弘一、夏丏尊、徐仲荪、刘质平、徐全茂及夏家老仆丁锦标，同乘一舟，别一舟载鱼虾等。

放生时：晨九时一刻。

随喜者：放生之时，岸上簇立而观者甚众，皆大欢喜，叹未曾有。

弘一对待护生慧业如此郑重！

三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理解护生的。柔石在1930年4月1日《萌芽》杂志一卷四期上发表了一篇《丰子恺君的飘然的态度》。文末曰："丰君自赞了他的自画的《护生画集》，我却在他的集里看出他的荒谬与浅薄。有一幅，他画着一个人提着火腿，旁边有一只猪跟着说话：'我的

腿'。听说丰君除吃素以外是吃鸡蛋的，那么丰君为什么不画一个人在吃鸡蛋，旁边有一只鸡在说话：'我的蛋'呢？这个例，就足够证明丰君的思想与行为的互骗与矛盾，并他的一切议论的价值了。"

类似这样的批评，估计丰子恺听到了不少。我们只要查阅一下此后出版的《护生画三集》丰子恺自序就知道了。此序二千余字，而其中三分之二文字是丰氏用来为护生画做辩护的。他"普劝世间读此书者，切勿拘泥字面。倘拘泥字面，而欲保护一切动植物，那么，你开水不得喝，饭也不得吃。因为用放大镜看，一滴水中有无数微生虫和细菌。……即使吃长斋，也是不彻底，也只是'眼勿见为净'，或者'掩耳盗铃'而已。然而这种'掩耳盗铃'，并不伤害我们的慈悲心……"至于他的言行是否浅薄，丰子恺又是这样认识的："在严肃的佛法理论来说，我们这种偏重人的思想，是不精深的，是浅薄的，太精深，使末劫众生难于接受之故。应该多开方便之门，多多通融，由浅入深，则宏法的效果一定可以广大起来。"

丰子恺不惜费尽口舌来为护生画辩护。然而这种辩护还是温和的，比之于他与过去的朋友曹聚仁的笔战，乃至绝交来，可谓心平气顺多了。

作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前后同学，丰子恺与曹聚仁原本是好朋友。曹聚仁对此并不讳言："离校以后，无论立达学园或开明书店，我和他时常相见，相处颇不错。虽说我对于佛学，他对于唯物史观，各不感兴趣，

但彼此谈得来,从来没有红过脸。够得上是老朋友了。”(曹聚仁《朋友与我》)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在避寇逃难途中,曹聚仁又在浙江兰溪老家接待过丰子恺并请丰氏一家吃了一顿饭。可就是在这一顿饭后,丰曹二人绝交了。原因何在?先来看看曹聚仁在同一篇文章中的记述:

“……后来,我从江西到了桂林,那时,开明书店在那儿复业,宋云彬兄把《中学生》复刊了。他邀我写稿,我就把旅途碰到了子恺兄的事,还说了他们沿途所见的日军残暴事迹,血淋淋的惨状,一一都记了下去。也说了子恺兄的愤恨之情。大概,我引伸了他的话:‘慈悲’这一种观念,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着了……哪知……子恺兄看了大为愤怒,说我歪曲了他的话,侮辱了佛家的菩萨性子。他写了一篇文章骂我,说悔不该吃我那顿晚饭。好似连朋友都不要做了。过了好久,我才转折看到这一篇文章,也曾写了一篇《一饭之?》刊在上海《社会日报》上,他一定看到的。不过,我决定非由他向我正式道歉,我决不再承认他是我的朋友了。”

既然曹聚仁“回敬”的文章是《一饭之?》,可知他指丰子恺那篇“骂”他的文章即是丰氏发表在《少年先锋》第六期(1938年5月5日)上的《一饭之恩》。

丰氏此文缘于听人说“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而发表了他对护生画的见解。他以为凡是对《护生画集》的种种曲解,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思;因而拘泥小节,不知大体的。护生画集的序文

中分明说着：'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针对当时抗战，丰氏写道："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丰子恺在写《一饭之恩》之前还写过一篇《则勿毁之已》。他说："《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说'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著其'事'。"

丰子恺与曹聚仁绝交了，初看起来，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然而细想一下，像丰子恺这样一位仁者会在这件事上跟朋友翻脸，足见其对护生画的执著信念了。

四

《护生画集》第二册即《续护生画集》是由开明书店于1940 年 11 月出版的。夏丏尊为之作序是弘一大师指定

的。夏丏尊在序言中阐明了前后两集护生画的因缘与特点：

> 弘一和尚五十岁时，子恺绘护生画五十幅，和尚亲为题词流通，即所谓护生画集者是也。今岁和尚六十之年，斯世正杀机炽盛，弱肉强食，阎浮提大半沦入劫火，子恺于颠沛流离之中，依前例续绘护生画六十幅为寿，和尚仍为书写题词，使流通人间，名曰续护生画集。二集相距十年，子恺作风，渐近自然，和尚亦人书俱老。至其内容旨趣，前后更大有不同。初集取境，多有令人触目惊心不忍卒睹者。续集则一扫凄惨罪过之场面。所表现者，皆万物自得之趣与彼我之感应同情，开卷诗趣盎然，几使阅者不信此乃劝善之书。盖初集多着眼于斥妄即戒杀，续集多着眼于显正即护生。戒杀与护生，乃一善行之两面。戒杀是方便，护生始为究竟也……

《续护生画集》之所以有如此特色，其实是按照弘一的旨意行事的。因为早在编绘《护生画集》的时候，弘一就已对第二集有了设想。他在 1928 年 8 月 21 日写给负责纂集工作的李圆净的信中曾对许多本拟编入初集的画做了删除，有的就提议编入将来的第二集。比如现在收入第二集最后一幅《杨枝净水》，就是如此。弘一信中说："《杨枝净水》，此画可用。将来编二集时，可以此画置在最后之一幅。"（初集最后一幅亦为《杨枝净水》，但诗、画

均不相同），弘一还特别提出："将来编二集时，拟多用优美柔和之作，及合于护生正面之意者。至残酷之作，依此次之删遗者，酌选三四幅已足，无须再多画也。"

丰子恺做护生画第二集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严酷的年代，他除了遵循弘一当年的指示外，多少也受到了马一浮的影响。比如，1938 年 2 月 9 日，马一浮在写给丰子恺的信中就说过："愚意此后撰述，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祸之烈，身经乱离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

此处，马一浮虽未必指护生画，但作为一种战时文艺的创作思想，无疑是站在更高的高度理解文艺。若无阔大的视野、宽广的胸襟，料想在那种年月是不敢说这样的话的。

《续护生画集》中有弘一的跋文，全文如下：

> 己卯秋晚，续护生画绩就，余以衰病，未能为之补题，勉力书写，聊存遗念可耳。
>
> 晚晴老人

五

《续护生画集》出版的时候，弘一已年迈体虚，他抱病

书写集中文字，为的当然是护生画的完满，他自知不久于人世，1941年农历六月六日给夏丏尊、李圆净联名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交待了如何协助丰子恺完成六集护生画。此信很长。其主要内容是：一、于《佛学半月刊》及《觉有情》半月刊中登广告，广征画材。其报答是弘一所书之屏幅、中堂、对联及初版印《金刚经》；二、已刊布的二集护生画，画风既有不同，以后诸集亦以风格各异为妥，甚至可以考虑用连环画形式等等；三、可以考虑由专门拟定的四位居士每人负责一册画材，以求保质按时。……弘一似乎对护生画的圆满极为看重，写此信后十天，他又单独给夏丏尊写了一封信，曰："《护生画》续编事，关系甚大。务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诚之愿力，而尽力辅助，必期其能圆满成就，感激无量。"当然，护生画后几集的编绘，由于种种原因，其任务主要还是由丰子恺承担了下来，这是后话。

再说就在弘一、丰子恺商编、出版《护生画集》第一册的时候，夏丏尊也在着手做一件事，这便是编印《李息翁临古法书》。这部书法集里的作品，均是弘一在俗时的书法，并在出家时送给夏丏尊的。如今十年过去了，夏丏尊出版这部书法集，实际上是为了纪念他俩之间的友谊。夏丏尊在跋文中说：李叔同"才华盖代，文学演剧音乐书画靡不精。而书名尤藉甚。胎息六朝，别具一格。虽片纸，人亦视如瑰宝。"作为当年在浙一师时的同事老友，夏丏尊十分清楚李叔同那时痴迷于书法的情况："居常鸡鸣而起，执笔临池。碑版过眼便能神似。所窥涉者甚广，尤

致力于《天发神谶》、《张猛龙》及魏齐诸造像，摹写皆不下百余通焉。"

弘一此时对出版他在俗时的书法作品是何态度呢？他出家以后。虽也常常作书，但一般不再涉及尘俗之内容。这回夏丏尊要他自己题序，弘一写道："居俗之日，尝好临写碑帖。积久盈尺，藏于丏尊居室小梅花屋，十数年矣。尔等居士选辑一帙，将以锓版示诸学者，请余为文冠之卷首。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戒。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矣。冀后之览者，咸会斯旨，乃不负居士倡布之善意耳。"

白马湖"晚晴山房"筑好后，弘一连续三年都去过。他显然对此地留有好感。为此他在给夏丏尊的一封信中就说："山房建筑，于美观上甚能注意，闻多出于石禅（经亨颐之别号——引者注）之计划也。石禅新居，由山房望之，不啻一幅画图。（后方之松树配置甚妙）"然而，弘一不可能永远安居在这酷似"桃源"的"仙境"之中，他要宏法，也要闭关修持，1932 年秋后，他又云游至厦门，从此在南闽长居宏法。

陋　巷

一

自从李叔同出家前曾带着丰子恺到杭州的一条陋巷里拜访过马一浮先生后，十多年来，像弘一、夏丏尊、丰子恺这些人的经历、生活处所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唯有马一浮十数年如一日，仍然静居在这条陋巷里读书、研究，孜孜不倦地献身于国学。在这十多年里，多少人踏进这条陋巷来拜访他，1921 年有梁漱溟，1929 年有熊十力……；又有多少人请他"出山"，1930 年 7 月竺可桢请其任浙江大学教职，9 月陈百年请其任教北京大学，马一浮均婉拒。1931 年清明的这一天，丰子恺踏进了这条陋巷，这

是他继1918年后第二次来到陋巷拜访马先生。

丰子恺这次造访马一浮，是受弘一之托送两块印石去的。关于此事，弘一在1930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于温州写给夏丏尊信的附言中有所交代："马居士石图章一包，前存子恺处。乞托彼便中交去，并向马居士致诀别之意。今后不再通信及晤面矣。"弘一之所以说此话，一是因为自感"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凡此皆衰老之相耳。甚愿早生西方。"二是有意专心念佛，"不久即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矣。"因此他跟夏丏尊说："以后如有出家人在家人等，向尊处或子恺处，询问余之消息，乞告以不晤客、不通信等。"弘一如此做，自有他的考量。但据日后情况而论，他实际上并未如此行事。

丰子恺这次来到陋巷，跟上回不同的是自己多了妻室和一群子女，却少了一位慈母。而马一浮则十余年如一日，长年孑然一身隐居在这里。这老屋依旧古色苍然，马一浮的音容居然也与十多年前一样："坚致有力的眼帘，炯炯发光的黑瞳，和响亮而愉快的谈笑声。"

丰子恺的母亲钟芸芳是1930年正月初五去世的。办完丧事后，他开始蓄须，以作对母亲的永念。可想而知，丧母后的丰子恺，其心绪是很颓唐而烦乱的。他说："我那时初失母亲——从我孩提时兼了父职抚育我到成人，而我未曾有涓埃的报答的母亲。痛恨之极，心中充满了对于无常的悲愤和疑惑。自己没有解除这悲和疑的能力，便堕入了颓唐的状态。"丰子恺自己没有解悲释疑的

能力，可马一浮有："他和我谈起我所做而他所序的《护生画集》，勉励我；知道我抱着风木之悲，又为我解说无常，劝慰我。其实我不须听他的话，只要望见他的颜色，已觉羞愧得无地自容了。"这天，丰子恺在马一浮的家里坐了约一个小时，心头的乱麻终于在马一浮的容颜与谈说之中解开。在马一浮送丰子恺出门的那一刻，他自感心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愉快，居然瞧见一辆黄包车，不问价钱，就跨上而去。

二

1933年元月的一天，丰子恺第三次来到陋巷之中。这一回去，是他主动前往拜访马一浮的。此时的马一浮，除了深黑的须髯已变成银灰色外，双目依旧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还是那样愉快。按照丰子恺的说法，此时自己已"不复如前之悲愤，同时我的生活也就从颓唐中爬起来，想对'无常'做长期的抵抗了。"这几年里，丰子恺经常在古诗词中读到"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六朝旧时明月，清夜满秦淮"以及"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等咏叹无常的文句，并及时把它们演绎成现代漫画。丰子恺当时曾打算，将来这些画儿画多了，可以出版一本《无常画集》。他把这个设想讲给马一浮听，马氏一方面告诉他

许多可以找这种题材的佛经和诗文集，还背诵了不少佳句；而另一方面又开导他：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的道理。丰氏一听此言，似觉马一浮一下子把他从无常的火宅中救了出来，心里顿感无限的清凉。

丰子恺后来终于还是没有出版他所说的《无常画集》。其中原因或许就是明白了“无常就是常”的哲理，既然明白了，大可不必再去执著于图其形了。

丰子恺写过一篇题为《陋巷》的文章，文中叙述他三次到“陋巷”中去拜访马一浮的情况。这三次造访，其时间的起讫是1918年至1933年。但丰子恺自始至终没有说出这“陋巷”的具体巷名。在目前所能见到的马一浮史传文章和年表中，都说马一浮在杭州主要住过三条巷，即：宝极观巷、延定巷和马所巷。但具体何年何月住在哪条巷中则没有明确地说明。根据丰子恺《陋巷》一文，可知1918年至1933年间，马一浮住的是同一条“陋巷”当中的宅屋，那么我们再依据弘一大师1928年农历六月十九日致李圆净的一封信便可得出此“陋巷”即延定巷的结论。弘一在信中说道：“仁者往访湛翁（即马一浮——引者注），乞将画稿等带去，说明其格式。彼寓延定巷旧第六号门牌内。如唤人力车，乞云：城内弼教坊银锭巷。因延定二字，常人不知也。”弘一在此处，连门牌也说清楚了。

三

前文已经介绍，弘一与丰子恺利用抓阄的方法确定了丰子恺在上海永义里的寓所为“缘缘堂”。这所谓的“缘缘堂”，在当时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名称而已，丰子恺说这是“缘缘堂”“灵”的存在，这个“灵”足足跟随他达六七年之久。

丰子恺在《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到了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春，我方才给你赋形，在我的故乡石门湾的梅纱弄里，吾家老屋的后面，建造高楼三楹，于是你就坠地。”

早在丰子恺的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家里就在故乡老屋惇德堂的后面买下了一幢平屋，房屋的面积虽小，但屋子前后均有园地。丰子恺早就想在此地基上建造一座楼房，然而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一直没有实现。

1933年春，全家人指日盼望的寓所终于落成了。这就是丰子恺所说赋了形的“缘缘堂”。这是丰子恺亲自绘图设计的一所中国式构造，近世风形式的宅院，完美地达到了丰子恺所追求的高大、宽敞、明亮，具有朴素深沉之美的要求。丰子恺把寓所布置得很协调：“因为你处在石门湾这个古风的小市镇中，所以我不给你穿洋装，而给你

穿最合理的中国装，使你与环境调和，因为你不穿洋装，所以我不给你配置摩登家具，而亲绘图样，请木工特制最合理的中国式家具，使你内外完全调和。”

丰子恺同样注意布置周围的环境。他喜欢花，便在天井南壁筑一半圆形花坛，西南角里还有一个扇形花坛。这里分别种着主人喜欢的樱桃、蔷薇、凤仙、鸡冠、牵牛、杨柳和芭蕉等花木。天井的大门上由丰子恺自题“欣及旧栖”四字。当然，丰子恺绝对不会忘记挂上“缘缘堂”的大匾额，他觉得过去弘一大师书写的横额太小，需另请高手题写，他要找的人，就是马一浮了。

丰子恺于1933年1月主动去拜访“陋巷”中的马一浮，从时间上看正是“缘缘堂”即将落成之际。按理，丰子恺这次拜访马一浮时应该会有提出题写堂名的可能。由于丰氏在《陋巷》一文中没有提及，这里只能做一个推断。但马一浮确是为“缘缘堂”题写了这三个大字，同时题了一首偈：

能缘所缘本一体，
收入鸿蒙入双眦。
画师观此悟无生，
架屋安名聊寄耳。
一色一香尽中道，
即此××非动止。
不妨彩笔绘虚空，

妙用皆从如幻起。

丰子恺用一块数十年陈旧的银杏板，请雕工把字一一镌上，制成一匾。在堂成的那一天，丰子恺在这块匾上挂了彩球，将其高高地悬在厅堂的正中央。后来，丰子恺又请弘一大师把《大智度论·十喻赞》写成一堂大屏。装裱后挂在"缘缘堂"的两旁。匾额下面，是吴昌硕所绘的老梅中堂。中堂旁边，又是弘一书写的一副大对联："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华严经》句）……整个缘缘堂内外，俨然成了一个清凉的艺术世界。丰子恺在这里，足足安居了五年。

负暄

一

丰子恺在“缘缘堂”生活期间，可以说是创作的丰收期。他利用堂内一、二万册各类藏书，在乡间安谧宁静的氛围中勤奋著述，写下了大量的散文小品、文艺论著；绘出了众多的难以计数的漫画。仅在这期间出版的漫画集、随笔集、文艺论集就有二十余部。他本人在 1934 年《艺术丛话》付印记中说：

我近来应各种杂志邀稿，写的大部分是关于美术音乐的短文、长文及译文。每期我从杂志上撕下发表

稿来，塞在一个竹篮里，向来没有工夫去回顾。最近偷闲打开竹篮来看看旧稿，发现很厚的一叠！惊讶之余，继以感慨。这些密密地排印着的铅字，一个个都是从我的右腕上一笔一笔地写出来的！

从这些话的字里行间，人们足以想见丰子恺当年在“缘缘堂”中勤奋创作的情景了。

这几年间，弘一大师仍在南闽各地宏法。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了由弘一作词，其弟子作曲的《清凉歌集》。有关这歌集的出版，夏丏尊在序言中有较详细的介绍，其中说道：“一日，刘生质平偕余往访和尚于山寺，饭罢清谈，偶及当世乐教。质平叹息于作歌者之难得，一任靡靡俗曲流行閭阎，深惜和尚入山之太蚤。和尚亦为怃然，允再作歌若干首付之，余与质平皆惊喜，此七年前事也。”这位为《清凉歌集》作序的夏丏尊这些年来又在做什么呢？他与叶圣陶合著了一部以故事体裁写关于语文知识，把抽象的道理和日常的具体事情熔为一体的读物《文心》，风靡一时；他于1936年6月被推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席。这期间，夏丏尊一直住在上海。他编刊物、写文章，参加文艺活动，以其道德文章深受文化界人士尊重。

故此，在这五六年间，弘一、夏丏尊、马一浮、丰子恺这四位君子人各一方。除了丰子恺经常往返于上海——石门湾——杭州之间外，其他人较少走动。此间他们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战争的炮火结束了丰子恺在“缘缘堂”的平静生活。正当丰子恺为是否离开故乡而犹豫不决的时候，邮局送来了丰子恺在故乡时的最后一封信。此信正是马一浮从浙江桐庐寄来的。信上说他已由杭州迁往桐庐，住迎薰坊十三号，又问石门湾近况如何，丰氏一家安否？同时寄来的还有马一浮的一首诗，题目是：《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

二

《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是马一浮在告别杭州前夕写的。诗作好后，马一浮即将作品油印出来，分别寄给他所要告别的朋友。此诗全文如下：

礼闻处灾变，大者亡邑国。奈何弃坟墓，在士亦可式。妖寇今见侵，天地为改色。遂令陶唐人，坐饱虎狼食。伊谁生厉阶，讵独异含识？竭彼衣养资，殉此机械力。铿翟竟何裨，蒙羿递相贼。生存岂无道，奚乃矜戕克？嗟哉一切智，不救天下惑。飞鸢蔽空下，遇者亡其魄。全城为之摧，万物就磔砾。海陆尚有际，不仁于此极。余生恋松楸，未敢怨逼迫。蒸黎信何辜，胡为罹锋镝？吉凶同民患，安得殊欣戚？衡门不复完，书史随荡析。落落平生交，遁处各岩穴。

我行自兹迈，回首增怆恻。临江多悲风，水石相荡激。
逝从大泽钓，忍数犬阬？登高望九州，几地犹禹域？
儒冠甘世弃，左衽伤毫及。甲兵甚终偃，腥膻如可涤。
遗诗谢故人，尚相三代直。

丰子恺读完信和诗，觉得这里面有一种伟大的力量，把他的心渐渐地从故乡拉开了距离；这信和诗，带来了一种芬芳之气，散布在将死的石门湾市空，把硫磺气，炸药气，厉气，杀气都消解了。他说："数月来不得呼吸精神的空气而窒息待毙的我，至此方得抽一口大气。我决定向空气新鲜的地方走。"无疑，丰子恺所指的"空气新鲜的地方"就是马一浮所在的地方。于是，他率全家经杭州，奔桐庐，径直投奔马一浮。

丰子恺抵达桐庐的头三天，一家人就住在马一浮的卜居之宅，三天后，他便在离桐庐二十里地的河头上觅得了"新巢"。不久，马一浮也决定迁居阳山坂的汤庄。这汤庄离河头上不过一里地，丰子恺几乎每隔一天或两天必去汤庄访马一浮。他对马一浮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他曾经把马氏寄给他的信封上的"丰子恺"三个字拍照缩小后印在自己的名片上。此次他从迎薰坊迁至河头上是乘马一浮运书船溯桐江而上的。这一路江水，山明水秀。船头上插有一面白布旗，旗上"桐庐县政府封"六个字是马一浮的亲笔（当时雇船极难，运书船由县政府代雇，若不插此旗，易被挪作它用）。丰子恺喜爱马一浮的字，尤

其喜爱这随意挥写的字。他坦白承认:“这时我很想偷了这面白布旗去珍藏起来,但终于没有这股艺术的勇气。”

这时节正值隆冬,却是风和日暖。丰子恺一般都是上午去拜访马一浮。丰子恺一到,马一浮便会拉着他和门人王星贤去负暄。丰子恺对此的描绘极具诗情画意:

> ……僮仆搬了几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壶,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这把茶壶我见惯了:圆而矮的紫沙茶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茶壶旁有一筒香烟,是请客的;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筒,和我们谈天。

这便是丰子恺终生难忘的“桐庐负暄”。

三

马一浮在负暄的时候,有时也放下水烟筒,拿起一枝香烟来抽,他那“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就在水烟换香烟,香烟换旱烟之间源源地吐出来。”丰子恺是吸烟成瘾的人,据他自己说平均一小时吸三四枝。但在与马一浮负暄之时,他却很少吸。原因何在?丰氏曰:“只因为我的心被引入高远之境,吸烟这种低级欲望

自然不会起来了。”

马一浮的神力如此之大，这是因为他无论什么问题，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即便是谈艺术，在丰子恺看来，似乎连托尔斯泰和卢那卡尔斯基等也要一齐退避三舍。马一浮的门人王星贤记下了负暄时的每一次谈话，记录中就有这样一段精彩的片断：

> 十二月七日丰君子恺来谒，先生语之曰：辜鸿铭译礼为arts，用字颇好。arts所包者广。忆足下论艺术之文，有所谓多样的统一者。善会此义，可以悟得礼乐。譬如吾人此时坐对山色，观其层峦叠嶂，宜若紊乱，而相看不厌者，以其自然有序，自然调和，即所谓多样的统一是也。又如音乐必合五音六律，抑扬往复而后成。然合之有序，自然音节谐和，铿锵悦耳。序和同时，无先后也。礼乐不可须斯去身。平时如此，急难中亦复如此。困不失亨，而不失其亨之道在于贞。致命是贞，遂志即是亨。见得此义理端的，此心自然不乱，便是礼。不忧不惧，便是乐。纵使造次颠沛，槁饿以死，仍不失其为乐也。颜子不改其乐，固是乐。乐必该礼。而其所以能如是者，则以其心三月不违仁。故仁是全德，礼乐是合德。以其于体上已自会得。故夫子于其问为邦，乃就用上告以四代之礼乐。会不得者，告之亦无用。即如此时，前方炮火震天，冲锋肉搏，可谓极乱。而吾与二三子犹能于此负暄谈义，亦可谓极治。即此一念，便见虽当极乱之时，活机

固未息灭。扩而充之,未必不为将来拨乱反正之因端也。非是漠然淡然,不关痛痒。吉凶与民同患,自然关怀。但虽在忧患,此义自不容忘。亦非故作安定人心之语。克实而言,理本如此。所谓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也。礼乐之兴,必待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吾今与子言此,所谓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善会此义而用之于艺术,亦便是最高艺术……

丰子恺慨叹:"逃难"犹如把重门深院统统打开了,那些平时深居简出的人统统出门,使平日不易见到的"杰作"都在这时出品。听到马一浮这番精彩的论述,丰子恺实在希望春天永远不再到来,以使他能在这和暖的冬阳之下长得负暄之乐。

四

在与马一浮相处的日子里,他们有时也到山里走走。一次,他们为了防万一,雇了轿子往深山里找避居的房屋。下山时,一行人曾在路亭里小坐,忽见壁上有用木炭题着的一首诗:

山上有好水,平地有好花。

好花年年有，同栈不在乎。

据猜测，此诗似乎出自农夫之手。经马一浮考证，此诗最后一句中的“同栈”应该是“铜钱”之误，于是大家赞叹作者的胸襟。接着，马一浮又把最后一句改成“铜钱何足夸”。而门人王星贤另有所见，再改成“到处可为家”。可以想见，几位学人大家，为避寇而至深山，在这长亭里品评欣赏农夫野老的诗歌当是何等的风光。当天晚上，马一浮对丰子恺说，他最近又得一诗，比《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要平和中正得多。第二天，马一浮就把诗歌写成了一横幅送给丰子恺。诗的题目是《避寇郊居述怀兼答诸友见问》，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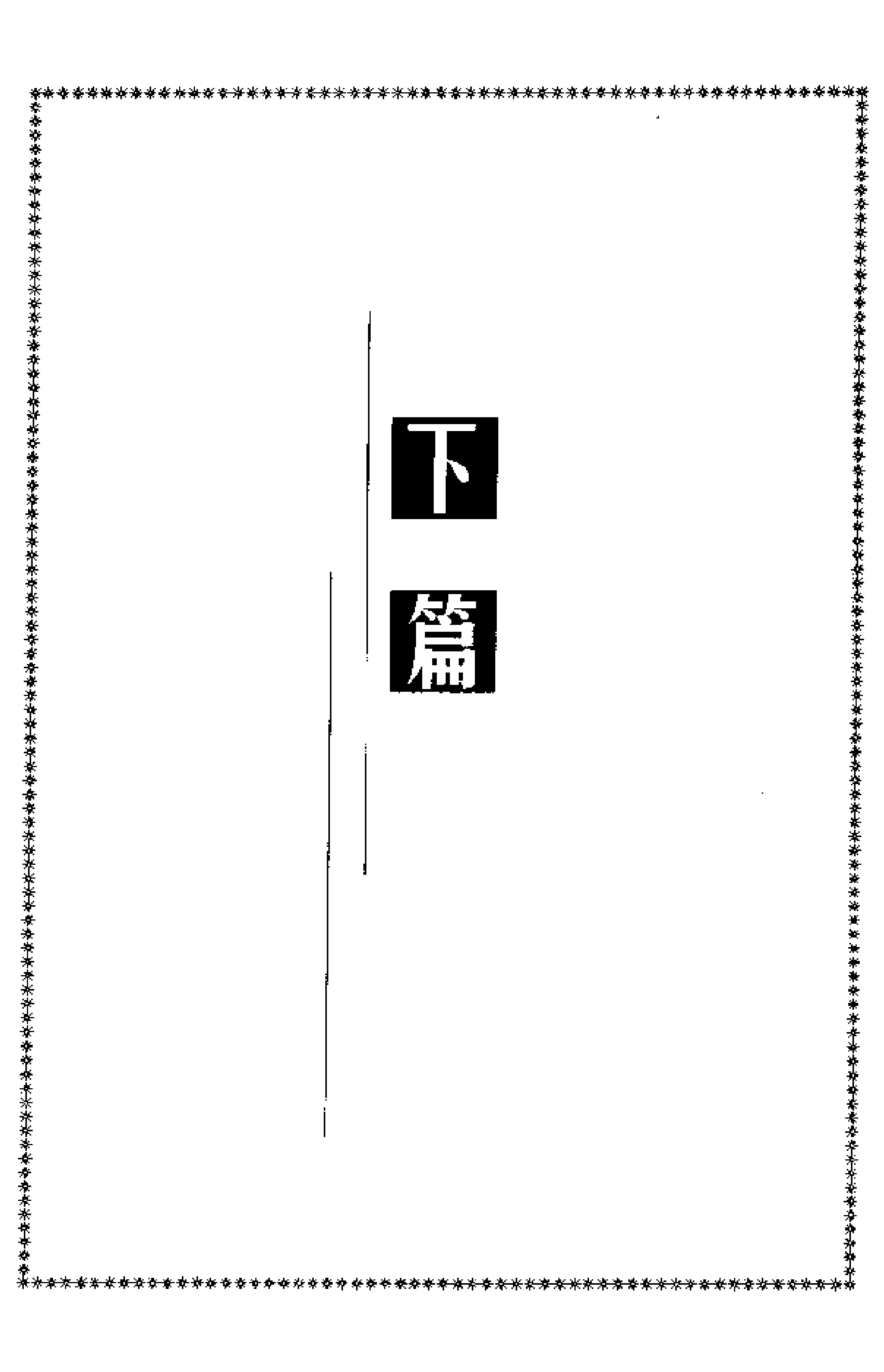
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避地将焉归，藏身亦已绰。求仁即首阳，齐物等南郭。秉此一理贯，未释群生缚。琐尾岂不伤，三界同漂泊。人灵昡都野，壹趣唯沟壑。鱼烂旋致亡，虎视犹相搏。纳阱曰予智；偭规矜改错。胜暴当以仁，安在强与弱。野旷知霜寒，林幽见日薄，尚闻战伐悲，宁敢餍藜藿。蠢彼蜂蚁伦，岂识天地博。平怀頫沧溟，寂观尽寥廓。物难会终解，病幻应与药。定乱由人兴，森然具冲漠。麟凤在胸中，豺虎宜远却。风来晴雪异，时亨鱼鸟若。亲交不我遗，持房慰离索。

马一浮此长诗中有一句“麟凤在胸中”，后来丰子恺

则干脆把这“麟凤”比作马一浮了。丰子恺做过这样一首诗：

江南春尽日西斜，血雨腥风卷落花。
我有声香携满袖，将求麟凤向天涯。

此诗鲜明地表白了他自己决意追随马一浮的愿望。然而由于日军迫近，且丰子恺又有一家老小，他终于只在桐庐住了一个月左右，在同年12月21日雇船溯江而上，重新踏上了逃难之路。不久，马一浮也迫于战争，离开桐庐去了江西。



下篇



避　寇

一

且说丰子恺一家离开桐庐以后，经衢州、常山、上饶、南昌、樟树镇，于1938年3月13日抵达长沙，居长沙天鹅塘，并时常赴汉口参加抗日文艺宣传活动。马一浮此时亦应浙江大学之聘，任“特约讲座”到了江西泰和(当时浙江大学所在地)去讲学。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段时间丰子恺与马一浮虽人分两地，但书信来往颇频。在这些书信中，两人所谈，其涉及面颇广。

1938年3月18日、4月1日，丰子恺两次写信给马一浮，并在信中附上了近作抗战诗文歌曲。马一浮在回

信中评价曰："高射炮打敌机一首，篇法甚佳，音节亦似古乐府，似较东邻有小国一首为胜。声音之道，入人最深。此类歌曲能多作，甚善。遣词虽取易晓，不欲过文，但亦不可过俚。用韵及音节尤不可忽。若能如古乐府歌辞，斐然可诵，则尤善矣。"

当时，马一浮在浙江大学为学生讲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教（即横渠四句教），颇绝此语伟大，以为其与佛氏四弘誓愿相等。马一浮知道丰子恺近来作了不少新歌，觉得这四句教亦可谱曲咏唱，就请丰子恺及学生萧而化一起考虑为之谱曲，并且详细交待了诸句的曲式要求："右四语试缓声吟咏，自成音节。第三句将声音提高拖长，第四句须放平而极和缓，乃是和平中正之音。其意义光明俊伟真先圣精神之所托，未知是否可以谱入今乐，制成歌曲，但不得增损一字。"（此曲后由萧而化谱制完成）

马一浮在给丰子恺的书信中，也谈到了护生画和弘一大师。

关于护生画，丰子恺曾把回答曹聚仁的《一饭之恩》寄给马一浮看。马一浮在1938年6月6日的回信中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在近时作家浅薄思想中，忽有此等朴实沉着文字，此真是最后胜利之福音也。续有新撰，仍盼寄示……得读佳文，便如吃冰麒麟矣。"

抗战逃难途中，丰子恺没有忘记把弘一的来信转给马一浮看。马氏读信后，知道弘一有殉教的意志，感慨万

千:“抄示弘一师来书,因此得知此老为法忘身,真有古德风范,不愧为吾老友。通信时,希代为问讯。”

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四君子的彼此交往中,唯夏丏尊与马一浮的交游资料甚少。在夏丏尊的许多文章中虽多次提到马一浮,但人们几乎很难找到他俩直接往还的记录。不过,夏丏尊却是很敬重马一浮的,料想马一浮对夏丏尊亦是如此。例如在叶圣陶的日记和书信中,就有一些侧面的记述。叶圣陶在 1939 年 4 月 27 日致夏丏尊的信中曰:“马湛翁人极好,除说些他的本行话来难免迂阔外,余均通达。”5 月 9 日的信中又曰:“翁欲得马先生小幅,已向说起,马先生言不日即书就交来,不须买纸。”5 月 24 日日记中曰:“前为丏翁索书,承书近作凌云寺一律交余。”6 月 6 日致夏丏尊函中又云:“马湛翁交来奉赠书法一纸,依嘱书其近作,亦为名贵。”由此可见,夏丏尊亦以得其一纸为乐的。

二

1938 年 6 月,丰子恺由长沙抵桂林,马一浮不久也抵达这里。是年秋,由于丰子恺先于马一浮到达,又应聘在桂林师范教书,所以他在当地已经比较熟悉了。为了让马一浮平安住下,丰子恺和友人们一起替他在城东觅

得了房屋。此事在马一浮的一首诗中有记。诗有小序曰：

“初至桂林，君武、子恺诸友，为赁屋于城东。窗槛临江，隔岸诸峰罗列，若在几案。羁怀顿豁，喜而作此。”

诗曰：

避地翻成助胜缘，
轻舟经月饱看山。
今来小阁临江住，
心与山云一味闲。

晴窗江岸对嵯峨，
千里帆樯槛下过。
宴坐浑忘羁旅恨，
逢人更喜得天多。

诗中反映了马一浮对日寇的愤恨，同时也表达了他由于得到友人们的关心而产生的欣慰之情。

在桂林期间，丰子恺经常陪同马一浮游览岩洞，畅谈古今历史。在丰子恺看来，这仿佛是桐庐负暄的重演，如果能与马一浮永远住在桂林，那将是无比快慰的事情。然而未过多久，马一浮又将随浙江大学赴宜山。丰子恺依依不舍，他在 10 月 25 日的日记中如此遗憾地写道：

“……七时梓翁来,同赴东环路送马先生离桂赴宜山。吴敬生君亦在场,匆匆话别……途中忽见桂林城中黯然无光,城外山色亦无理唐突,显然非甲天下者。盖从此刻起,桂林已是无马先生的桂林了。”

丰子恺与马一浮之间的感情是极真挚的。马一浮到宜山后,或许出于对丰子恺的思念,给尚在桂林的丰子恺寄来了一首长诗,其题目就是《赠丰子恺》。在这首长诗中,寄托了马一浮对丰子恺的称羡之情与热切的厚望。全诗如下:

昔有顾恺之,人称三绝才画痴;今有丰子恺,漫画高才惊四海。但逢井汲歌耆卿,所至儿童识姓名。人生真相画不得,眼前万物空峥嵘。“护生”画了画“无常”,缘缘堂筑御儿乡。吴楚名城一朝尽,展转流离来象群。谁言杀尽始安居,此是无常非岁运。乱峰为笔云为纸,点染虚空如妙指。晴阴昏旦异风光,万物何心着忧喜。每忆栖霞洞里游,仟灵魑魅话无休。石头何预三生业,国史犹争几世仇。吾欲因之铲叠嶂,不见神尧天下丧。书契结绳等胶漆,鸡狗比邻相谯让。琴台汉上已成灰,破垒焦原百事哀。巴蛇吞象知无厌,黄鹤西飞遂不回。豪情壮思归何处,梦中勋业风前絮。岂如华子能操戈,不信留侯能借箸。伏波山下酒初醒,一别漓江入杳冥。丹穴空洞堪送老,白龙青鸟惜零丁。若知缘起都无名,始知名言离四病。如江印月鸟飞空,幻报何妨论依正。画师示现无边身,痴

与无痴共一真。骑得虎头作龙猛，会看地狱变天人。（此诗曾用作《子恺漫画全集之一·古诗新画》代序，略有改动。原诗若干句后有注释，引录时删去。）

三

马一浮对丰子恺的思念，也并不是用心写了这一首长诗而已。他去宜山浙江大学后不久，浙江大学亦有意聘请丰子恺和正在桂林师范任教的马一浮门人王星贤去浙江大学就职。浙大的这个意向就是通过马一浮转达的。为了使丰、王二人能在宜山安居，马一浮在信中说，已在宜山城外觅得一亩地，茅屋三间，空地上还可新建房屋二处，足以供马、丰、王三家结邻而居。信上，马一浮附《水调歌头》一首，其中有一句是："著我三间茅屋，送老白云边。"

本来，丰子恺觉得自己刚在桂林师范应聘，如此匆匆离开，心里颇过意不去。但先行的王星贤于1939年1月2日给丰子恺的信中告诉他，马先生已花去二百法币把一亩地和三间茅屋买了下来。丰子恺再也不容犹豫，答应在下学期就任浙江大学艺术讲师兼训导。他在1月8日的日记中承认，此举"半由自愿，半由马先生之吸力。"然而，不巧的是，正当丰子恺于4月18日抵达宜山的时

候，马一浮已经于2月7日因赴川办复性书院而离开了。他们虽未能一起在浙江大学共事，但任艺术主讲的丰子恺几乎把马一浮的思想全盘接受下来，并灌输给学生们。

马一浮给浙江大学学生讲学，所讲内容主要是《六艺论》（后期亦讲义理名相）。他所谓的“六艺”（又称“六经”，即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从广义上来讲是六类或六个大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马一浮以为，“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包括外来学术，一切学术之源皆出于此。他说：“西方哲人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马一浮又强调：“诸生当知，六艺之道是前进的，绝不是倒退的，切勿误为开倒车；是日新的，绝不是腐旧的，切勿误为重保守；是普遍的，是平民的，绝不是独裁的，不是贵族的，切勿误为封建思想。”最后，马一浮把“六艺”放到了人类文化学术的最崇高之地位：“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惟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惟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大多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俗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只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感德大业。”

丰子恺的观点几乎跟马一浮一致。他给学生所做的

《中国文化之优越》演讲较全面的体现了这种观点。现节录数段比较之："留学不过参仿外国之所长，非欲用夷变夏。吾国物质文明虽未发达，精神文明实远胜于东西各国，艺术则尤非在东西各国所能望其项背。故以艺术界观之，五十年来，全世界号称文明之国，无不派大批留学生来华学习。特其所派者非身体，而为精神，故一般人不易见到耳。""……最近吾在此大学所任讲之'艺术教育'，据说是近世德国人首先提倡的。故德国被称为艺术教育之先驱者。……此言对中国人说，直是小巫见大巫，鲁班面前绰大斧！……'礼仪三千，威仪三百'，艺术教育之表现也。'温柔敦厚'，艺术教育之主旨也。"

丰子恺是主讲艺术的，但其观点、思想则与马一浮"六艺统摄一切东西方学术文化"是同一脉的。

四

1938年7月初，丰子恺在桂林的时候曾写了一封信给处在福建的弘一大师，希望他能够来内地跟自己一同生活，由自己供养法师。弘一收到信后，虽为丰子恺的一片诚意所感动，但仍旧决定留在闽南。他给丰子恺的回信曰：

朽人年来，已老态日增，不久即往生极乐。故于今春在泉州及惠安尽力宏法，近在漳州亦尔。犹如夕阳，殷红绚彩，瞬即西沉。吾生亦尔，世寿将尽，聊作最后纪念……”

次年，丰子恺为纪念弘一大师六十寿辰，开始绘制护生画的续集。初集既然是五十幅纪念五十岁，那么续集纪念六十岁，自然就是六十幅了。丰子恺做画完毕，由宜山寄往泉州，请弘一配文。弘一见续集绘出，非常欣慰，这就提出了前述完成六集护生画的要求。丰子恺接到弘一信中关于这六集的要求，私下就想：其时寇势凶恶，自己流亡在外，命运生死难卜。但大师既有嘱咐，又岂敢不从呢？因此，他在给弘一大师的复信中表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续护生画集》由开明书店于1940年11月出版，护生画的初集出版于1929年，按理，续集应该在1939年出版才对。之所以延迟一年，一是由于战乱，丰子恺虽在1939年已将画作好，但弘一收到时已是该年的年底了；二是当时的印刷境况不佳。为此弘一在给负责编务的李圆净居士的信中曰：“现在纸张人工皆涨价，稍迟出版无妨。”

在《续护生画集》中，丰子恺以致弘一的一封信所为跋，且完全按丰子恺的手书字迹印刷。此信写于1939年旧历九月二十日，信如下：

弘一法师座下：

今日为法师六十寿辰。弟子敬绘续《护生画集》一册计六十幅，于今日起草完竣。正在请师友批评删改，明日起用宣纸正式描绘，预计九月廿六日（即弟子生日）可以付邮寄奉，敬乞指教，并加题词，交李居士付印。先此奉禀。忆十余年前在江湾寓楼得侍左右，欣逢法师寿辰，越六日为弟子生日。于楼下披霞娜（piano）旁归依佛法，多蒙开示。情景憬然在目。十余年来，奔走衣食，德业无成。思之不胜惶悚。所幸法体康健，慈光远被，使弟子在颠沛流离之中，不失其所仿仰也。敬祝
无量寿

弟子　丰婴行顶礼
民国廿八年古历九月二十日

孤　岛

一

丰子恺函邀弘一大师来广西桂林与他自己同住，未得弘一同意。于是丰氏又于1938年12月12日给留居孤岛上海的夏丏尊寄去一封信。信中说道："……弘一法师前来函，略云福建宏法事忙，且年高怕行动，故不能来桂。前曾将原函抄奉，不知收到否？尊眷在沪安好，甚慰。……来示以敝眷人多安否为念，雅爱之诚，令人感激。"

留居在孤岛，惦念着丰子恺的夏丏尊这几年怎样呢？

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争爆发后，夏丏尊任职的

开明书店经理部和编辑部即毁于炮火。此时,夏丏尊一家从虹口区的麦加里迁居至法租界霞飞路三号,全家六口挤在楼下的一间客堂里,除了随身带上的一点衣物,此外一无所有,从此,夏丏尊一家实际上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

抗战时期夏丏尊在上海的生活状况,人们可以从他致亲友的一些信札中想见。例如他在给宁波某君的信中曰:"……惟生活威胁日重,米价已涨至千四百圆矣。……物价日日暴涨,不知如何生活得下去。"另两封信中又曰:"上海米价二万圆以上,香烟抽不起,最好戒绝。""沪寓开支浩大,薪水所入不够半数,现已戒酒。又接得翻译佛经生意,夜间工作至十二时就寝,预计如此苦干,当能过去。"

1938 年夏丏尊在给丰子恺的信中为了安慰离乱中的丰子恺还虚言"在沪安好",那么到了 1940 年 11 月 15 日他给丰子恺的信中便不得不如实写告了:"浙东不通车故,欲归不得,在上海也恐活不下去……烟已吸至平常不吸之劣牌子……"。丰子恺也在 1946 年 5 月 14 日写的《读丏师遗札》一文中回忆道:"但记得:抗战后期的一信内,夏先生说,他近来吃'扁担饭'。即每日上午吃了一餐,跑去办公,下午回来再吃一餐,一天的食事就完了。这话现在想起了备觉伤怀!"

为了活口养家,夏丏尊除了夜以继日写作、翻译外,还到南屏女中任教。他诲人不倦,风雨无阻,而他自己的

两个孙子却因经济困难不得不辍学，过早地进入钱庄充当学徒。他不是没有机会“富贵”，1943 年 12 月 15 日夜，夏丏尊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捕去。日本人出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张抗日的宣言问罪，并想利用其名望为日本人办事。可他坚贞自守，毅然拒绝，后经好友内山完造的营救，夏丏尊才得以获释。

这便是夏丏尊居留孤岛时的境况，着实体现了一个真君子的风范。

二

弘一大师曾在 1937 年 5 月应青岛湛山寺梦参法师、倓虚法师之请赴青岛宏法。而就在此年的 8 月 13 日，日军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这是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的又一次升级，至此，中国也就进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

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人们都劝弘一早日离开青岛，可他镇静自如，一直坚持到十月份宏法计划完毕。他先来到上海，居住在租界里，夏丏尊在《怀晚晴老人》一文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我接到他的信，说要回上海来再到厦门去。

那时上海正是炮火喧天，炸弹如雨，青岛还很平静。我劝他暂住青岛。并报告他我个人损失和困顿的情形。他来信似乎非回厦门不可，叫我不必替他过虑。……

在大场陷落的前几天，他果然到上海了。从新北门某寓馆打电话到开明书店找我。我不在店，雪邨先生代我先去看他。据说，他向章先生详问我的一切，逃难的情形，儿女的情形，事业和财产的情形，什么都问到，章先生逐项报告他，他听到一项就念一句佛。我赶去看他已在夜间，他却没有详细问什么。几年不见，彼此都觉得老了。他见我有愁苦的神情，笑对我说道："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句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弘一计划在上海住三天，然后乘船回厦门。第二天，夏丏尊又去看望他。弘一住的旅馆，正靠近外滩，日本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一般人住在里面，似乎每隔几分钟就要受惊一次。可弘一镇静如常，只是微动着嘴唇端坐念佛。此等风光，使夏丏尊佩服得几乎五体投地。这天中午，夏丏尊与几位朋友请弘一到觉林素食馆午餐，然后又要求他到附近的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年春天，夏丏尊把这张照片寄给丰子恺一张，附信则言："弘一师过沪时，曾留一影，检寄一张，借资供养（师最近通讯

处：泉州承天寺）。斯影摄于大场陷落前后，当时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师面上犹留笑影，然须发已较前白矣。”

夏丏尊这里所介绍的这张弘一照片，就是目前人们所常见的被用作弘一标准慈像的这张了。

三

夏丏尊也思念着避居内地的丰子恺。当他得知丰子恺的故居缘缘堂毁于炮火的消息后，十分怅惘。为了寄托他对丰子恺的思念之情，夏丏尊特地找出丰子恺的漫画《几人相忆在江楼》张之寓壁，“日夕观览，聊寄遐想，默祷平安而已。”（夏丏尊 1938 年 3 月 10 日致丰子恺函）

夏丏尊在抗战时期给丰子恺写过许多信，其中 1940 年 11 月 15 日一封格外引人注意。此信很长，专谈绘画问题：“……鄙意：中国人物画有两种，一是以人物为主的（如仕女、如钟进士、佛像等），一是以人物为副的（如山水画中之人物）……其实二者之外，尚有第三种方式，就是背景与人物并重……为君计，似以从第三种入手为宜……君于漫画已有素养，作风稍变（改成国画风），即可成像样之作品。暂时以此种画为目标如何？……由漫画初改国画，纯粹人物与纯粹山水，一时恐难成就（大幅更甚），如作人物背景并重之画，虽大幅当亦不难……”

丰子恺十分重视夏丏尊的这封信，他在发表于1946年7月《中学生》上的《读丏师遗札》中回忆当时收信时的感想："当时我极感佩。今日重读此信，觉得更有价值，可说是世界绘画倾向的一个预言。"接着，丰子恺在文章中分析了中西绘画的发展历史，得出结论曰："中国以唐代为界，划分人物画时代与风景画时代。西洋则以十九世纪中叶为界而划分。时间迟早不同，而其顺序完全一致。故世界绘画，现在都尚在风景为主的时代。"为此，丰子恺断言："夏先生所说的第三种画，我以为在将来必然出现……世界绘画渴望一个新的转机。这回转向哪里呢？唯有人物风景并重的一路了。"

丰子恺以为这第三种画在将来必然出现，其实他自己已经在实践了。溯其漫画的发展阶段，到了抗战期间，丰子恺的画风突然为之一变，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自然相"阶段，其画仍保持了"人"的趣味，同时用了很多笔墨描绘了风景，而且由简笔变为繁笔，由单色变成了彩色。这种风格上的转变，虽不能说完全因夏丏尊直接促成，但至少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至少，丰子恺对此是承认的。他在写《读丏师遗札》一文时，夏丏尊已经辞世，他在此文的结尾便是这么说的："陶渊明诗云：'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我也想遵照夏先生的遗嘱，而勉力学习。"

四

夏丏尊和丰子恺都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散文高手。作为“白马湖作家群”中的两位主将，他俩的散文都曾得益于中国古典散文的影响，笔法简洁而老练，同时又注重现代人的情感。他们的散文，前者偏重抒情，后者偏重说理，可谓各有千秋却同出一炉。丰子恺把自己走上文学之路归功于夏丏尊的指导和鼓励，而夏丏尊对这位昔日的学生在文坛上的成就也由衷地高兴。在国内，当时颇具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赵景深是这样评价丰子恺的：“他只是平易的写去，自然就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

那么在国外的情况怎样呢？1943年，夏丏尊在上海读到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新著《昨今》，其中有对中国文艺的评论，尤以对丰子恺的评价最为详细；他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也由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翻译到日本出版。谷崎润一郎是如此评价的：

“他所取的题材，原并不是什么有实用或深奥的东西，任何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端，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

吉川幸次郎则说：

“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做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人品、气骨。”

夏丏尊读到《昨今》，自然感到十分高兴。日本学者对他的这位学生、朋友有如此之高的评价，使他兴奋得立即动手把书中《读〈缘缘堂随笔〉》一章的有关文字翻译出来在《中学生》第六十七期上发表。夏丏尊的译者序言是这样记述的：

> 八一三以来，藏书尽付劫火，生活困苦，购书无资，与日本刊物更乏接触之机会。昨日友人某君以谷崎新著随笔集《昨今》见示，中有著者之中国文艺评，对胡适、丰子恺、林语堂诸氏之作品各有所论述。其中论子恺最详，于全书百余页中竟占十页，所论尚允当，故译之以示各地之知子恺者。余不见子恺倏逾六年，音讯久疏，相思颇苦。子恺已由黔入川，任教以外，赖卖画以自活。此异国人士之评论，或因余之迻译有缘得见，不知作何感想也。三十二年五月，译者，在上海。

夏丏尊的译文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后，开明书店就把刊物寄给丰子恺看，接着叶圣陶又致函请丰氏本人写一篇读后感。当时正值战争期间，丰子恺觉得为了一

个敌国人所写的文章谈感想，似乎不甚谐调。但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11日，丰子恺还是写了一篇《读〈读缘缘堂随笔〉》，除补应叶圣陶之嘱外，更为了感谢夏丏尊，他在文中说："夏先生译文的序言中说：'余不见子恺倏逾六年，音讯久疏，相思颇苦……'为答复夏先生的雅望，我更应该写些感想。"

丰子恺的这篇"感想"中有一段文字很有意味："我既然承认自己是孩子，同时又觉得吉川、谷崎二君也有点孩子气。连翻译者的夏先生、索稿子的叶先生，恐也不免有点孩子气。不然，何以注目我那些孩子气的文章呢？"

丰子恺说：

"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

殉　教

一

随着战事的日益吃紧，厦门也同样受到了威胁。四方友人再次替弘一大师担起心来，纷纷劝其撤离。然而，弘一依然坚留，他是如此表态的：

“为护法故，不怕炮弹。”

他为1937年5月的厦门市第一届运动会写了会歌：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猖狂！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

领导之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一个抗敌信念如此坚定的大法师，不止一次地表示："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

他在厦门的居室门上题额曰"殉教堂"；

他反复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加跋语："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弘一推崇的灵峰大师曾有诗云：

日轮挽作镜，海水掬作盆。
照我忠义胆，浴我法臣魂。
九死心不愧，尘劫愿尤存。
为檄虚空界，何人共此轮？

弘一显然与此诗作者有着共同的感受，抗战期间，曾多次在给弟子的信中附录过它，多少算是借此表明他自己的心志。

1937年，为祝南闽耆宿转道老和尚七秩大寿，弘一撰寿联一副：

老圃秋残，犹有黄花香晚节；

澄潭影现，仰观皓月镇中天。

这联中的“黄花香晚节”当就是弘一的自勉和绝好的写照。他把自己的余生全部投入到宏法事业中去了。

1939年对于弘一来说是难忘的一年。这年他六十初度，出家也已二十一年。各方净友为他征集诗文，以示纪念。澳门《觉音月刊》、上海《佛学半月刊》分别出了纪念专号。在这些诗文中，有夏丏尊的纪念文章《弘一法师之出家》，文中详尽叙述了弘一当年出家前后的种种因缘，有马一浮的贺寿诗，诗曰：

世寿迅如朝露，腊高不涉春秋。
宝掌千年犹驻，赵州百岁能留。
偏界何曾相隔，时寒珍重调柔。
深入慈心三昧，红莲化尽戈矛。

丰子恺则在弘一寿辰那一日，给这位恩师写去了那封用作《续护生画集》跋文的信：

在写贺诗的人中还有一位南社老友柳亚子，他的贺诗多少带有若干劝勉意味：

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
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歧。
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
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我拜马克思”句，在有的版本中作“我拜拿破仑”）

对于柳亚子的贺诗，弘一是作了答诗的，其曰：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二

在弘一大师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除了尽力宏法外，其对自己的西去是十分从容镇静的。1941 年 5 月，他曾书一古德偈句：

即今休去便休去，若欲了时无了时。

想当年，在白马湖晚晴山房刚落成的时候，弘一曾与夏丏尊谈起所谓遗书的问题。当时夏丏尊戏言曰：

“万一你有不讳，临终咧，入龛咧，荼毗咧，我是全外行，怎么办？”

弘一笑答：

“我已写好了一封遗书在这里，到必要时会交给你。

如果你在别地，我会嘱你家里发电报叫你回来。你看了遗书，一切照办就是了。”

其实，当时的弘一未必一定已把遗嘱写好，以上言语，不过是他与夏丏尊的戏谈之言罢了。然而如今他真的感到直奔西天之时已近，倒也真的给夏丏尊写下了遗书。遗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丏尊居士文席：

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

前所记月日，系依农历。又白。

1942年10月31日这一天上午，夏丏尊依例要到开明书店去办事。才坐定，有人就送来了一封信，且笑嘻嘻地对夏丏尊说：“弘一法师又有挂号信来了。”往日，凡有弘一的信来，夏丏尊都会让书店同仁一起看的，这次也未例外。可是，当他抽出信纸来读时，大家都惊呆了：“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夏丏尊怎么也想不通，“迁化”的消息怎么会由“迁化”人自己来报道的呢？再仔细一看，遗书上的“九”、“初四”三字是用红笔写的，似乎不是弘一的亲笔，像是别人填上去的。就在这时，有人在信封

中又抽出了附件，一件是泉州大开元寺性常法师的信，说弘一大师已于九月初四日下午八时生西，遗书是由他代寄的。另一件是剪下的泉州当地报纸，其中关于弘一临终经过有详细的记载。夏丏尊这时才不得不相信，这平生的挚友——弘一大师确实是圆寂了，他不禁万感交迸，为之泣然。

向夏丏尊报送弘一圆寂消息的是性常法师，那么用红笔填上“迁化”日期的又是何人呢？钱仁康先生有《弘一大师临终遗墨考》一文介绍了一些情况：

> ……1984 年 11 月 2 日，我去泉州开元寺访问了当年亲近弘一大师的妙莲法师。1942 年九月——十月间弘一大师卧病温陵养老院时，妙莲法师随侍在侧。他告诉我，弘一大师写遗书给夏、刘两先生，是在生前约半月。大师圆寂后，寿山法师来到温陵养老院帮助办理丧事。遗书中的迁化日期，是他仿照大师的笔迹用红笔填上去的。寿山和妙莲都是大师的弟子。现在寿山法师已经还俗，名叫林向荣。（弘一遗书同时也给刘质平一份，内容相同——引者注）

如此看来，其事实真相就很清楚了。

三

弘一大师圆寂于1942年10月13日，即农历九月初四午后七时三刻，地点在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终年62岁。

有关大师圆寂前后的情况，在诸种文学体弘一传中都有较详尽的描绘，其场景、情节皆比较感人。在此，笔者仅录僧睿的文章大要如左：

> 阴历八月十五十六两日，为众讲《八大人觉经》后，即感精神不振。同时为晋江中学学生写中堂百余幅。廿三日渐示微疾，然力拒医药及探问，一心念佛。廿七日完全断食，只饮开水。犹勉强为人作书（因约期已至）。廿八日下午，自写遗嘱云："余于未命终前，临命终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不得干预。"并盖私章。九月初一下午，书"悲欣交集"一纸交妙莲师。此为法师最后之墨宝。至初四晚七时三刻安详西逝。

我们再看看全权负责弘一临终前后诸事的妙莲法师在《晚晴老人生西后之种种》一文的记述：

老人于去年九月初四晚八时入寂，延至初六上午入龛。下午送龛去承天寺安座，至十一晚七时大众集会，诵普贤行愿品完，起赞佛偈念佛，至八时焚化，（遵老人过七日后焚化遗命）至十时即化毕。四众皆见有多色猛烈之火光。十二日晨拾灵骸，装满两坛。当时拾得舍利数颗，其余碎骨炭灰等，弟均将包起收藏。事后即将灵骸遵遗命送开元承天二寺供养。事毕，弟奉舍利及碎骨炭灰回开元寺自己房内，于百日内常念地藏菩萨。随于碎骨炭灰内拣选舍利，至百日拣去碎骨炭灰三分之二，得舍利一千八百余颗，舍利块五六百颗。本拟照相并做铜版，奈铜版本省无法可制。又照相代价高贵非常，无人负责，故暂时作罢。其舍利块并骨灰等暂由弟保存，俟后缘熟建塔。

弘一大师终于走完了他那多姿多彩的人生之路，去了他要去的极乐世界。

永 怀

一

弘一大师的圆寂，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尤其是他的三位挚友马一浮、夏丏尊和丰子恺，他们心中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马一浮获知噩耗后即写了二首五律挽诗：

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
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
祇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春到花枝满，天中月相圆。
一灵元不异，千圣更何传。
交淡心如水，身空火是莲。
要知末后句，应悟未生前。

夏丏尊也作挽联哀悼：

垂涅槃赋偈相诀，旧雨难忘，热情应啸溪虎；
许娑婆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

弘一大师圆寂之后，夏丏尊不顾自己体衰多病，为纪念弘一委实做了许许多多工作。他先后撰写了《怀晚晴老人》、《弘一大师的遗书》等悼念文章。1943 年 3 月，他又为《晚晴老人讲演集》做了题记；1943 年初冬，上海大雄书局出版了《弘一大师永怀录》，书中皆写文化界、佛教界人士回忆弘一大师的八十余篇文章和诗词，夏丏尊德高望众，为之做序，序中说："……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其行迹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现种种身，以种种方便而作佛事，生平不畜徒众，而摄受之范围甚广。"

1944 年秋，开明书店又出版了《晚晴山房书简》（第

一辑)。此书由夏丏尊、李芳远集稿,其中,仅弘一致夏丏尊函就有九十五件之多。夏丏尊在序言中曰:"……斯编所收,皆师出家后所作。师为一代僧宝,梵行卓绝,以身体道,不为戏论。书简即其生活之实录。举凡师之风格及待人接物之状况,可于此仿佛得之。"在弘一致夏丏尊的信中可以知道,弘一出家以后,逐渐断绝与红尘间的往来,即便必需,如给丰子恺、刘质平等的信函,也是托夏丏尊代转。这足见他们之间的缘份、情谊之特别了。

二

丰子恺获知弘一大师圆寂的消息,是大师西逝后的第五天。那是在1942年的10月18日早晨。

1942年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陈之佛邀请丰子恺到重庆该校任教。10月18日早晨,丰子恺正在遵义的住宅"星汉楼"中整理行装。这时,邮差突然送来泉州开元寺性常法师发来的电报。

丰子恺接到电报后,心中自是一阵悲恸。他下意识地走到窗前,望着长空沉默了几十分钟。然后,他发了一个愿,即决定替弘一大师画像一百尊,分寄各省信仰大师的人。11月中旬,丰子恺全家移居至重庆,连应酬加疾病,他在次年1月方才动笔绘像。他先一口气连画十张,

分别寄给福建、河南诸信士。另外九十幅，准备一面接洽索画人，一边为之绘作。对于绘弘一大师像，丰子恺认为是心最诚而情最切的。他这样解释：

> 这些画，为欲勒石，用线条描写，不许有浓淡光影，所以不容易描得像。幸而法师的线条画像，看的人都说像，大概是他的相貌不凡，特点容易捉住之故。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他在我心目中印象太深之故。我自己觉得，为他画像的时候，我的心最虔诚，我的情最热烈，远在惊惶与恸哭、发起追悼会和出版纪念刊物之上。

对于弘一大师的西逝，丰子恺始终是很理智的。他没有立即写文悼念，也没有为之发起、主持过任何形式的追悼大会。只是在 1943 年 3 月写了一篇《为青年说弘一法师》。在这篇文章中，丰子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了这般解答：

> 弘一法师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如此说来，我岂不太冷淡了么？但我自以为不是。我敬爱弘一法师，希望他在这世间久住，但我确定弘一法师必有死的一日，因为他是"人"，不过死的时日迟早不得而知。我时时刻刻防他死，同时时刻刻防我自己死一样。他的死是我意料中事，并不出于意料之外，所以我接到他死的电告，并不惊惶，并不恸

哭。老实说，我的惊惶与恸哭，在确定他必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地做过了。

弘一大师圆寂后，丰子恺也曾想到要替先师写一个传。他以为替弘一大师这样的伟人作传必须是同样的伟人才对，才适合。为此，他想到了马一浮，以为只有马一浮才是最佳人选。他去拜访马一浮，请求替先师作传。然而不知什么原因，马一浮终于也没有写，或许因为忙，亦或许马一浮也以为自己不适合替弘一立传。对于像弘一、马一浮这样的智者，我们做此种推断似乎有其合理性。

三

又是四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丰子恺仍然没有就弘一大师再写过什么文字。一直到1947年，福建的刘绵松居士编辑《弘一大师全集》时，丰子恺才因其词意非常诚恳而写了一篇不到千字的小序。按理，为弘一全集作序，总该详细谈他与弘一大师的因缘，或阐述他对弘一大师的评价了。然而，丰子恺仍然不愿详谈，他踌躇了很久，方才动笔，勉强来赞一词：

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做人，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里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至于怎样十分像“人”，有这全集表明，不须我再多费词了。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所以对于弘一法师这样崇高伟大的人格，实在不敢赞一词……

丰子恺的这番话看似抽象笼统，然而细细想来，确实至情至理。文中所体现的正是丰子恺对这位最崇仰的弘一大师一种无以言喻的崇拜。丰子恺所谓十分像人的人，是一种具有不趋炎附势的，对理想、事业始终如一且有一种清高至洁、温柔敦厚的品性的人。在这方面，弘一大师是最好的典范，或许他还有更多无可形容的超人品格与脱俗非凡之处。这种品格，甚至令丰子恺这位极善行文遣词的文章高手也难以明言。这才使他干脆免去一切多余的解释，以一个最像“人”的人来涵括一切了。

然而，丰子恺与弘一大师的因缘毕竟太深厚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对弘一的评价。自从弘一圆寂以后，他一直没有机会去闽南凭吊。他曾在弘一健在时画了两

册《护生画集》，1948年秋，丰子恺在游览了台湾后，便于11月份抵达厦门。他凭吊了弘一大师讲律遗址，并到泉州访了开元寺。次年，这恰是弘一七十诞辰，丰子恺便在厦门觅得一处居室，闭门三月，终于绘成了第三册护生画，共七十幅。

1948年11月在厦门的时候，他曾应邀为厦门佛学会做过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在这次的演讲中，丰子恺终于谈了他自己对弘一的理解，这便是有名的"三层楼喻"，内容如下：

> 他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

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求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然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地走上去的。

迄今为止，仍有许多论者执著于探寻弘一大师出家的原因，人们提出了种种设想，可谓众说纷纭，然而在罗列了一大堆材料之后，同时又逐个自我否定，成了一桩桩徒劳无功的赘言。其实，就其客观性而言，丰子恺的“三层楼喻”的说法无疑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尤其是就弘一这一特定的个体而言，又无疑是十分精当的。

四

弘一大师圆寂以后，夏丏尊的身体亦日复一日的衰

弱(当然,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尤其是 1943 年底夏丏尊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捕去后,肺病复发,健康状况更为恶化。1945 年,夏丏尊又患肋膜炎,到了 1946 年的春天,他的肺病终于加剧而危及生命了。

夏丏尊生命最后两天的情景,叶圣陶曾有《从此不再听见他的声音》一文记述:"4 月 22 日上午,去看丏翁。他朝里侧睡,连声呻吟。医生还没来,昨日医生说他心脏转弱,开了强心剂给他服下,又吩咐预备葡萄糖,将给他注射……将近十一点,我要走了,朝他说明天再来。他望我一眼,勉力说出以下的话:'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虽然舌头有些木强,声音还听得清楚。那凄苦的眼神带着他平生的悲悯,使我永不能忘……我走了。从此不再听见他的声音。23 日午后又去看他,他已经闭了眼睛,只剩抽气了。就在那天下午 9 时 45 分,他离开了我们的世界。"

丰子恺得悉夏丏尊逝世的消息是在重庆。当时丰氏刚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三年多以前,他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到老师弘一大师往生的消息,而今天,另一位老师夏丏尊又离他而去,消息都在他行旅倥偬的情况之下传到。

想当年,也就是 1937 年,丰子恺从南京回故乡,中途在上海下车,曾赴梧州路去看望夏丏尊先生。时值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夏丏尊每说一句话,就叹一口气。临别之时,丰子恺说:"夏先生再见。"而夏丏尊则答曰:"不晓

得能不能再见!”果然,这就是师生俩的最后一面。闻悉夏丏尊逝世的噩耗之后,丰子恺很快写了一篇《悼丏师》的长文,他觉得,类似夏丏尊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尊师”这些话别人都已说得够多了,于是,他便着重追忆了他与夏丏尊的师生情缘,读来也格外令人亲切,其哀悼之情也特别深挚。在谈及他受弘一、夏丏尊的影响时,丰子恺以为:“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对象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丰子恺最了解夏丏尊的为人处世:“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最后,丰子恺自己也悲愤起来:“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斛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夏丏尊的追悼会于1946年6月2日下午在上海玉佛寺举行。根据夏丏尊的遗愿,谢绝赙赠。治丧委员会推选几人组成夏丏尊先生纪念委员会,募集纪念基金,专

赠于任职十年以上，成绩卓著，或在语文教学上获得创见的中学国文教师。“启事”上是如此说的：“先生泉下有知，必将谓善道不孤，惠同身受，而受之者亦可以得所慰藉，益加奋勉”。此基金颁发过一次，受奖者为姚韵漪女士。后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而未能坚持下去。

回　归

一

弘一大师出家以后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而夏丏尊则又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仁者。积劳生疾，积忧成病，他俩的早逝，与其行为性情有着客观上的联系。这样说，不等于马一浮、丰子恺不为国愁、不为民忧，相对而言，马、丰二位的性情要来得超脱。如此说来，后者虽经历避寇逃难生活的折磨，但他俩在生活上总比弘一来得讲究，心情上也比夏丏尊来得平和，时值抗战胜利，他俩总算没有什么疾恙而要胜利返乡了。

1942年11月，丰子恺因任国立艺专教职来到重庆

定居。次年正月里，他专程赴乐山访马一浮先生。在乐山期间，丰子恺似乎再次领受到了当年在桐庐时的负暄之乐。他做诗曰：

蜀道原无阻，灵山信不遥。
草堂春寂寂，茶灶夜迢迢。
麟凤胸中藏，龙蛇壁上骄。
近邻谁得住，大佛百寻高。

丰子恺自己说过，“麟凤”指的是马一浮先生，那么由此可见，他是时时刻刻把马一浮作为重要的精神寄托的。

丰子恺另有一首题为《1943年，赴乐山访马一浮先生，回沙坪坝记录》的诗（此诗题又作《乐山访濠上草堂呈马一浮先生》）。诗是这样的：

人间到处是修罗，天地依然喜气多。
昨夜月明江水碧，今朝日暖鸟声和。

风鹤声中赴远游，满江冰雪满身愁。
如今却喜安然返，三首新诗一叶舟。

尚有空名在国中，新朋到处喜相逢。
酒酣欲把唐诗改，天下何人不识丰。

乱世微躯幸苟全，随身况有满串钱。

归家应置千盅酒，先祝回春后过年。

时穷犹不辍弦歌，学子莘莘菜色多。
中有盈盈娇女子，乱头粗服像村婆。

锦屏山下客流连，蒸馍油茶胜绮筵。
他日五湖访范蠡，夜船剪烛话当年。

此诗有必要说明几句的是，诗中有“酒酣欲把唐诗改，天下何人不识丰？”之句。此句应缘于1939年1月丰子恺辞桂林师范教职，赴浙江大学任教时，同执教于桂林师范的好友傅彬然先生曾集唐人诗为之送别，送别诗中就有一句：“天下何人不识君”。由此可知，丰子恺此处当与傅彬然之诗有关。

马一浮在这一二年中也有不少诗是写给丰子恺的。其中有一首诗写于1942年的春分。马一浮写此诗，是因了观看在乐山举办的一次丰子恺画展后颇有感慨：

卧游壁观可同时，万法生心即画师。
每怪倪迂耽竹石，恰如郑侠写流离。
洞霄九锁人归远，云海千重鸟去迟。
屏上春山蕉下梦，未妨收入一囊诗。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这两位多年漂泊在外的高士居然也都格外地怀念起家乡来。1944年中秋节的次日

清晨，丰子恺趁着梦意，在枕边上填了一阕《贺新郎》，其中写道："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后。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齐摇手。"

马一浮在这一年也写了两首诗送给丰子恺，居然也都是思念故土的。其一：

> 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
> 清河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

另一首是：

> 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
> 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

很显然，马、丰二位的思乡之情均已十分炽烈了。果然不出一年，抗战全面胜利，他们终于如愿以尝，踏上了归乡之路。

二

1946年5月20日，马一浮径直从重庆乘飞机至上

海，然后回到杭州，借里西湖的葛荫山庄为复性书院的临时院舍。刚回到湖山依旧而人事全非的杭州，他做《湖上寄怀巴中送别诸子》以寄感怀：

飞花语燕送归舟，回首巴山几日留。
旧蚀虫书将灭字，新栽堤柳已先秋。
倦来壁上看云起，梦入林间秉独游。
胜有西湖湖水碧，照人行路不胜愁。

刚回到杭州，马一浮只得以刻书卖字来维持书院残局。到 1947 年 9 月 1 日，他甚至登出了《蠲戏斋鬻字启事》。丰子恺是 1947 年 3 月到杭州的，居静江路八十五号平屋，此地距葛荫山庄很近。跟马一浮一样，初到杭州的丰子恺，也只能靠卖画来维持生计。对于丰子恺的画，马一浮曾有过为之赞誉的长诗，然而，马一浮也认为有不足之处。他曾在观看丰子恺的画展之后说过：“丰画笔墨痕迹太重，亦是未臻超脱，未能空灵。名家杰作，令人望去几乎不知是画，此乃空灵之妙也。”马一浮对漫画也有他自己的见解：“漫画重现实，艺术则从美为归宿。现实不必尽美，故漫画不足以言艺术。现实有美，亦有丑恶，艺术家须是独具只眼，加以别择。美者存之，丑者去之，乃能成其为名世之业、不朽之作。漫画则重在题记，意托讽刺，可以谋生而不可以传世者也。”我们没有看到丰子恺对马一浮这些见解的表态。至于他自己，丰子恺不会

因为马一浮有了这种意见而改变他自己的艺术之路。因为丰子恺对自己的漫画创作有着独特的追求，而在事实上，他的许多漫画作品亦已成了不朽之作。

丰子恺在静江路上的住宅面对孤山北麓的林和靖放鹤亭，背靠宝石山的葛岭，傍依弘一当年住过的招贤寺。为此，他和朋友一起合撰了一副门对，叫作："居邻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马一浮以为还不够概括，也赠一副篆字对联，上联为"天清"，下联叫"地宁"。马一浮给丰子恺居舍题对联并不是第一次，抗战时丰子恺住在重庆沙坪小屋时，他就题赠过这样一副对联："藏胸邱壑知无尽，过眼云烟是等闲。"丰子恺每一处较为长住的寓所，几乎都有马一浮的题额，或对联或书法。这多少表明丰子恺对马一浮的敬重和追随，此不言而喻。

马一浮和丰子恺在西湖之滨约莫相处了近两年的时间。1948年秋，丰子恺赴台湾游览并举办画展，同年初冬至厦门，次年春又赴香港。1949年4月底，他从香港直飞上海，从此就定居在那里。至于马一浮，他也曾有心在杭州恢复复性书院，后因币值下跌，加上他年迈身疲，只得做结束书院的准备。1948年秋，马一浮正式结束书院，并于同年初就离开葛荫山庄，寄居于杭州的亲戚家中，直至1950年春，他应弟子蒋苏庵之请，从此定居西湖花港的蒋庄。

日　月

一

丰子恺于1948年底在厦门南普陀寺参谒弘一大师居处时，百感交集地做过一幅画《今日我来师已去，摩娑杨柳立多时》。1949年新年刚过，他赴泉州谒弘一圆寂之地，受到泉州佛教界的热情迎接。有一位居士拿出一封信给丰子恺看，此信恰是当年丰子恺寄给弘一大师的，信上“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八个字顿时跳至他的眼前。这便激发了丰子恺尽快完成绘作《护生画三集》意念。1月14日，他在厦门赁居古城西路四十三号二楼，闭门三月，终于绘成。4月初，丰子恺携画赴港，请叶恭绰先生

题字。到了4月底，丰子恺又飞抵上海，将画稿交大法轮书局。1950年2月，《护生画三集》正式出版。

丰子恺到上海后，短时间暂住闸北西宝兴路汉兴里的学生张逸心家，不久在同一弄内觅得一屋落脚。7月4日，他应万叶书店主人钱君匋之请又迁至南昌路。1950年初，他住进福州路671弄7号开明书店章锡琛先生旧宅。他在此宅一住就是四年半，一直到1954年9月1日，丰家迁居陕西南路长乐村的一幢西班牙式的寓所，直至终老。

丰子恺回到上海的这几年里，他一直在为一件事而努力着，这，便是在杭州建弘一大师纪念塔。按照丰子恺的本意，若能在杭州建一座弘一大师纪念馆，那便是再好不过的。为此，他也曾跟杭州的有关部门联系，后终因种种原因而改变计划。要立碑建塔，这原本也是早就应做的事，可因弘一生前嘱咐不得为身后事募化，因此佛教界内部亦不便违逆弘一之愿而自行募款建塔立碑。基于这种种情况，丰子恺下决心独力立碑。消息传开后，金石书画家钱君匋、出版家章锡琛、教育家叶圣陶、浙一师时的同学黄鸣祥、厦门友人蔡吉堂等纷纷支持，终于合力于1953年9月在杭州虎跑后山为弘一大师筑舍利塔。1954年1月10日，舍利塔落成，马一浮为塔身题写了“弘一大师之塔”六个篆字。纪念塔落成这一天，马一浮、丰子恺等数十人冒雨上山参加典礼。马一浮为此做了《虎跑礼塔》诗一首。诗有小序：“虎跑弘一律主塔成，子

恺约往观礼。苏庵有诗，余亦继作。”

诗云：

扶律谈常尽一生，涅槃无相更无名。
昔年亲见披衣地，今日空余绕塔行。
石上流泉皆法乳，岩前雨滴是希声。
老夫共饱伊蒲馔，多愧人天献食情。

二

丰子恺上海陕西南路的这幢西班牙式房子很有特点：二楼有一个室内小阳台，阳台中部有一个梯形的突口，东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还有天窗。丰子恺就选择了这个室内阳台作为自己的书房。人坐在室内，可以从天窗上看到日月运转。根据这个特点，丰子恺又给自己的新居取名为“日月楼”。前面提到，丰子恺的居舍内往往少不了马一浮的题联或题字，这回也是如此。丰子恺为居舍取名后，曾顺口诵出“日月楼中日月长。”之句，正好是一副对联的下联。下联征上联，浙江大学教授郑晓沧先生为拟上联为：“琴诗影里琴诗转”，而马一浮则拟了“星河界里星河转”，并书写后送给了丰子恺。这即是一直挂在日月楼中，陪伴着丰子恺晚年一切写作活动的

名联：

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

丰子恺同样没有忘记在寓所里挂上马一浮的其它书法作品。这回他挂在壁上的是马一浮自书的一首诗，其诗味十分甘美：

三月心斋学坐忘，不知行路长春芳。
绿荫几日深如许，尚有幽花冉冉香。

从1954年至1966年，丰子恺过了十二年的安定生活。在这些年中，他几乎每年春秋都会赴杭州一次，他也经常去蒋庄拜访马一浮先生。在这些年中，他为了纪念弘一大师，于1957年编了《李叔同歌曲集》，交北京音乐出版社于次年1月出版。1957年，又值弘一大师逝世十五周年，新加坡广洽法师辑集有关弘一在家时热心文教工作之论著在星洲出版《弘一大师纪念册》，丰子恺为之作序。1956年至1957年间，他又连续写下了《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先器识而后文艺》、《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等缅怀弘一大师的文章。1962年，由新加坡广洽法师捐款，丰子恺编《弘一大师遗墨》在上海印行，作非卖品行世。1964年，丰子恺又整理当年夏丏尊编《李息翁临古法书》作为《弘一大师

遗墨》的续集由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募印发行。

当然，丰子恺在这些年间也没有忘记一件事。那便是绘作护生画的第四、第五集。《护生画四集》(八十幅)于1961年初在新加坡出版。相对护生画前三集，《护生画四集》的印刷较为精美。丰子恺写信告诉负责出版的广洽法师："弟赠送苏慧纯居士、戎传耀居士，及北京叶恭绰先生、杭州马一浮先生等，见者均赞叹印刷之讲究，可使读者心生欢喜。"

《护生画四集》出版后不久，广洽法师以及丰氏其他友人均建议丰子恺提前绘作第五集护生画。丰子恺也有此意。他说："第五集照理须在弘一大师九十冥寿时出版。但人世无常，弟倘辜负此愿离去娑婆，则成一大憾事。因此，弟私心亦极想如此。"第五集护生画后终于在1965年8月下旬全部完成，9月即由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出版。

三

这位协助丰子恺出版《护生画四集》、《护生画五集》的广洽法师于1900年生于福建南安县，二十一岁时出家，抗战时赴新加坡，曾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1994年2月24日在新加坡圆寂。

广洽法师与弘一大师相识于1929年，成了弘一亲近的几位法师之一。1948年11月，广洽与丰子恺在厦门南普陀寺首次见面，此后他俩共同为纪念弘一大师做了许多善事。

1965年，广洽法师回国观光，丰子恺陪同他游览了苏州、杭州等地。而在杭州时，丰子恺特意安排了他与马一浮的会面。

早先，通过丰子恺的介绍，广洽法师就与马一浮频频通信，多次向马一浮索求墨宝。1961年，马一浮患了白内障，但凡广洽法师之请，他总是乐意书写，并由丰子恺寄往新加坡，而广洽法师也多次以钱物供养。为此，马一浮曾风趣地说："和尚是吃十方的，我连和尚的东西都吃到，可说是吃十一方了。"1964年，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出版了由丰子恺写序的马一浮手书弥陀经。此后，他又在1987年马一浮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再次出版了马一浮所赠的禅宗语录《僧璨大师信心铭》、《石头迁禅师参同契》和《云岩宝镜三昧》。广洽法师说："禅宗语录，本已可贵，何况出自书法名家学者之手笔，可谓字字诛玑。如此珍品，不宜私藏，今公诸同好，使诸信善及书法艺术爱好者皆得以学习欣赏，此乃衲之夙愿。"

这次两人在杭州相见，马一浮又书赠广洽法师对联一副：

心香普熏众生安乐

时雨润物百卉滋荣

对联中嵌入的“普”、“润”二字正是弘一大师当年给广洽法师取的号。此次面晤，马、丰及广洽三人又一同合影留念。岂知，这次便是丰子恺与马一浮的最后一次见面。

四

马一浮是于 1950 年 4 月开始移居西湖蒋庄的。1953 年春任浙江省文史馆长。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马一浮同样没有逃脱由此而来的厄运。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接着被赶出蒋庄。他毕生所收藏的古书古画被当众焚烧。据说，马一浮被限期搬出蒋庄的那天晚上，他身着单衣，在临湖的围槛边上独立良久，时而仰观星空长叹，时而凝视西湖短嘘。他的精神上的折磨导致了他身体情况的迅速恶化。临终前，他用攲斜的笔迹，写下了平生最后一首诗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1967年6月2日，马一浮与世长辞，终年84岁。

马一浮逝世的时候，丰子恺也正在上海被当作“黑画家”批斗。他的罪名比马一浮还要多，计有：“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最后又被列为上海市级十大重点批斗对象。1970年，丰子恺因在乡下劳动受了风寒，不久患中毒性肺炎住院治疗，病愈后又染上肺结核。这场大病“救”了丰子恺，因为他可以在家休养了。1972年底，他得到上海中国画院的通知，说对他的“审查”已经结束，结论是：“不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

丰子恺的这一“解放”，他立即于1973年3月作了杭州之行。陪同他赴杭州的是弟子胡治均。他有意让丰子恺到蒋庄凭吊马一浮的故居。然而，他们刚走到花港观鱼的御碑旁，丰子恺忽然停步不前，他对胡治均说：“我不去了，你去看一看就来，我在这里等你。”随后，他自言自语道：“人已不在了，看看又有何益。”当胡治均看完蒋庄回到丰子恺身边的时候，丰子恺为胡治均讲了这样一件逸事，此也可看作是对马一浮生平的一段“补白”吧：“马先生出身书香门第，祖上都是精研程朱之学的。岳父汤进士，曾在浙江做过大官，也是一个讲究封建礼法的人。马先生与汤氏夫人新婚燕尔，十分恩爱。不久，家中死了长辈，就在这守孝期间，新娘子腹中有喜。这一喜可惹出

弥天大祸来了。在这看重封建礼教的家庭里，如果让孩子生了出来，就会被视为非礼之行，大逆不道。马先生和新夫人焦急万分，出于无奈，只得偷偷地访得打胎之药，胡乱服下，亦怪那时科学不昌，药石乱投，以致胎没打下，新夫人却中毒身亡。马先生在极度痛楚之中，感到万分内疚，矢志不再续弦，以报爱妻，从此马先生孑然一身，研究理学、佛学，终其一生。”

最后，丰子恺说：“汤氏夫人被封建礼教所杀，真是可怜！马先生矢志不娶，对爱情如此专一，弥足可敬！但这毕竟是一场悲剧。”

需要说明的是，如今出版的《马一浮评传》中对马妻之死的原因未作详细说明。丰子恺是马一浮的挚交，他的说法，当为人们重视。

五

丰子恺在险恶的环境里终于没有忘记续作护生画。第五集已于 1965 年提前出版，剩下的只有第六集了。丰子恺预感到自己活不到 1980 年，这就私下里动手画起来了。

丰子恺作护生画第六集，外界人无法知道。而他在 1973 年完成定稿之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无法寄交给新

加坡的广洽法师，于是就交给题字者朱幼兰居士保管。愈二年，丰子恺病情加重，终于在1975年9月15日于上海病逝，终年78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洽法师于1978年秋再度回国。当他得知丰子恺在艰难的处境中已完成了第六集护生画后，大受感动。按广洽法师自己的话说：丰子恺"不受环境的挫折而停顿，不受病魔的侵患而退馁，以护生则护心，永远保持这颗赤裸裸对待人的良心善念，生死以之，义无反顾。"于是广洽法师又将画稿带回新加坡，"决心由第一集至第五集托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陈国华先生代为再版，每集各印一千册；而第六集之出版，则多印二千册，使全部同时流布，借以完成子恺居士纪念弘一大师未了之夙愿。"

行文至此，笔者所谓"四君子"的交游实录已全部"录"完。本拟再写一章论述性的"四君子现象"，然而，不必了！像如此至善至仁的四位君子岂是我可以随便妄评的呢？笔者已用尽可能少的思辨，以资料对"四君子"的交游及事迹作了存录，那就请读者自己从中去领悟些许值得领悟的东西吧。

附录:四君子交游年表

年　代	交　　游	文化大事记略
一八八〇年	农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生于天津。	八月十九日,李鸿章奏请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 十月,天津电报学堂设立。杭州重建文澜阁藏书楼。
一八八三年	农历二月二十五日,马一浮生于四川成都。	中国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在香港刊行。 十二月,中法战争爆发。
一八八六年	农历五月十四日,夏丏尊生于浙江上虞。	四月,英国规矩会会友在上海设立西童小学。 清政府第三次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二十四人出洋。
一八九八年	农历九月二十六日,丰子恺生于浙江崇德(今属桐乡市)。	一月五日,康有为在北京成立粤学会。二十九日,康氏上《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变法纲领。二月严复上《上今上皇帝万言书》。
一九〇二年	李叔同与马一浮在上海相识。	一月四日,张元济等在上海创办《外交报》。 二月八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新民丛报》。 四月二十七日,蔡元培、蒋智由、黄炎培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

年　代	交　　游	文化大事记略
一九〇八年	夏丏尊应聘为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	五月二十三日，慈禧召见劳乃宣，劳氏建议推广“简字”，即汉语拼音字母。八月十日，劳氏进呈《简字谱录》。
一九一二年	李叔同于本年秋赴浙江两级师范任教，遂于夏丏尊成为同事。浙江两级师范于一九一三年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一月一日，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二月十日，蔡元培发表《新教育意见》。 三月，陆镜若、欧阳予倩等在上海成立新剧同志会。
一九一四年	秋，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为李叔同、夏丏尊的学生。	四月二十一日，教育部举办全国儿童艺术展览。 八月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九一五年	李叔同、夏丏尊同时加入西泠印社	一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 九月十五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

年　代	交　　游	文化大事记略
一九一六年	夏丏尊在日本杂志上读到关于断食的文章，介绍给李叔同阅读。李叔同决心一试。	十一月十二日，议员百余人在北京成立国教维持会，主张尊孔。 马相伯、雍剑秋发起"信教自由会"，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一九一七年	新旧年之交，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实行断食。断食后与马一浮交往颇频。 丰子恺代替李叔同接待三宅克己等日本画家。	五月十四日，宪法审议会否决将孔教定为国教之提案。 八月十九日，汤孝佶承先父汤寿潜（即马一浮之岳父）遗命，向浙江教育当局捐银二十万元作教育经费。 本年太虚法师等在上海成立"觉社"，出版《觉社丛书》，后改名为《海潮音》。

年　代	交　　游	文化大事记略
一九一八年	春节期间，李叔同在虎跑听法习静，马一浮亦陪朋友彭逊之来寺。正月十五日，李叔同皈依了悟和尚为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 李叔同皈依后，即做出家准备，陆续将平生画作、衣物、书籍、古玩等赠送夏丏尊、丰子恺等人。出家前曾带丰子恺访马一浮，自此，丰马相识。 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在虎跑寺出家。 九月，由马一浮护送至灵隐寺受比丘戒。	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十二月一日，《春柳》月刊创刊，由李涛痕主编。主要刊载文明戏、戏曲剧本与评论。 五月二日，苏曼殊在上海病逝。

年 代	交 游	文化大事记略
一九一九年	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告别夏丏尊赴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西洋画。	五月四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史称“五四”运动。 梅兰芳赴日演出，此为京剧首次出国。
一九二〇年	六月，李叔同赴浙江新城贝山闭关。临行前，书“珍重”二字赠夏丏尊。马一浮做诗赞喜。 夏丏尊离开浙一师赴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任教。	胡适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一九二一年	早春，丰子恺赴日游学。临行前，曾到杭州闸口凤生寺向弘一大师告别。 夏丏尊返上虞老家，在经亨颐主持的春晖中学任教。	一月四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提倡为人生的文学。 七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

年　代	交　　游	文化大事记略
一九二二年	夏丏尊介绍丰子恺至春晖中学任教。丰子恺的“小扬柳屋”，与夏丏尊“平屋”毗邻。	佛教学者欧阳竟无在南京创设支那内学院。 杭州城隍山常寂寺和尚在上海创办功德林素菜馆。
一九二三年	夏丏尊译《爱的教育》，在《东方杂志》连载，后由开明书店出单行本。丰子恺为此书做插图。	泰戈尔应中国文化界之请访问中国。 十二月，文学团体新月社在北京成立。
一九二四年	春晖中学连续发生风潮。丰子恺、夏丏尊先后辞职。后同在上海立达学园任教。	太虚法师在庐山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
一九二五年	弘一大师在宁波七塔寺挂单，夏丏尊前往拜会，并邀至白马湖小住。	闽南佛学院在厦门南普陀寺成立。 文学艺术团体南国社成立。

年　代	交　　游	文化大事记略
一九二六年	春，弘一大师居西湖招贤寺。丰子恺、夏丏尊专程赴杭探望。 八月，弘一赴江西经上海，丰子恺陪同弘一访城南草堂。初冬，弘一返杭州再经上海，居丰子恺家。为丰宅取名为“缘缘堂”。	五月十六日，世界佛教居士林在上海开幕。 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合资开办开明书店。
一九二七年	秋，弘一大师赴上海，居丰子恺家。丰子恺于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拜弘一为师皈依佛门。两人商编《护生画集》。 马一浮为丰子恺做《漫画儿童相书后》。	二月十三日，太虚法师在上海开展新僧运动，创立法苑。 国立音乐学院在上海成立。 王国维自沉于北京昆明湖。

年代	交游	文化大事记略
一九二八年	十一月，夏丏尊、丰子恺等发起集资为弘一大师在白马湖筑舍。 马一浮为《护生画集》作序。	二月二十一日，国民政府大学院训令废止春秋祭孔旧典。 国立杭州艺术院成立。 上海玉佛禅寺建成。
一九二九年	《护生画集》于二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夏初，白马湖弘一住所竣工。深秋，夏丏尊陪弘一在白马湖放生。 夏丏尊编《李息翁临古法书》由开明书店出版。	中国佛学会于南京成立，太虚法师为会长。 梅兰芳赴美国演出。
一九三〇年	六月十日（农历五月十四日），夏丏尊四十五生辰，约经亨颐、弘一食素宴。	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
一九三一年	丰子恺赴杭州延定巷访马一浮。	亚洲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 “九一八事变”发生。

年　代	交　　游	文化大事记略
一九三三年	春，丰子恺在故乡石门湾自建的缘缘堂落成。马一浮题写堂额。 一月，丰子恺再访延定巷中的马一浮。	二月，上海世界语协会成立。 周口店山顶洞古人类文化遗址开始发掘。
一九三七年	十月，弘一自青岛至上海，夏丏尊前往旅舍探望。 马一浮避寇南迁，至浙江桐庐。丰子恺投奔马一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
一九三八年	秋，丰子恺与马一浮再次于逃难途中在桂林相聚。	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 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于年底在重庆成立。
一九四〇年	《续护生画集》由开明书店出版。夏丏尊作序。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保障作家生活"运动。 中国佛教学院建立。
一九四二年	十月十三日，弘一大师圆寂。	中国艺术剧社于重庆成立。中国美术学院于重庆成立。

年　代	交　　游	文化大事记略
一九四三年	春，丰子恺赴乐山访马一浮，请其为弘一大师作传。 夏丏尊翻译谷崎润一郎《昨今》中有关丰子恺部分发表。	三月，中国历史学会在重庆成立。
一九四六年	四月二十三日，夏丏尊逝世于上海。 五月一日，丰子恺做《悼丏师》一文。 五月二十日，马一浮返回杭州。九月十五日，丰子恺抵上海。	一月十一日，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复会。
一九四七年	三月，丰子恺移居杭州静江路八十五号。此与马一浮所在的葛荫山庄邻近。二人时常往来。	太虚法师圆寂。

年　代	交　　游	文化大事记略
一九五〇年	二月，《护生画三集》由上海大法轮书局出版。 四月，马一浮移居西湖蒋庄。 丰子恺卜居上海福州路。	电影《武训传》受到批判。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首届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举行。
一九五三年	九月，丰子恺等发起在杭州虎跑筑弘一大师舍利塔。 马一浮赴上海访丰子恺。	胡风文艺思想开始受到批判。 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六日，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年　代	交　　游	文化大事记略
一九五四年	一月十日，杭州虎跑弘一大师舍利塔建成，举行落成仪式。丰子恺、马一浮等绕塔顶礼。 九月一日，丰子恺移居上海陕西南路三十九弄九十三号。取舍名“日月楼”，马一浮撰联奉赠。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方法受到批评。 四月二十三日成吉思汗七二七周年大祭和成吉思汗新陵园奠基典礼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举行。
一九六一年	《护生画四集》由新加坡薝蔔院出版。	三月十七日，北京学术界人士集会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六月七日，佛教协会举行佛牙迎送法会，将中国供奉的佛牙舍利交给锡兰迎奉佛牙代表团。
一九六五年	九月，《护生画五集》由新加坡薝蔔院出版。 十一月，新加坡广洽法师回国观光。丰子恺陪同前往杭州拜会马一浮。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受到批判。 九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第二届会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年　代	交　　　游	文化大事记略
一九六七年	六月二日，马一浮在杭州逝世。	文化大革命期间。
一九七五年	九月十五日，丰子恺在上海逝世。 （一九七九年十月，《护生画六集》在香港出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